



引用格式:朱荣英. 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早期探索[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1-10.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01-10

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早期探索

Marx's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its essence of practice

朱荣英

ZHU Rongying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青年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状态,认为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批判可以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进而在社会性劳动中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占有,使每个人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实践性理解,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马克思早期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探索,虽然仍然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已对其做了实践性的重构,不再是什么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人本学。

关键词:

马克思;
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本质

[收稿日期]2019-01-07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H:2018-1-01)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在早期就对之进行了探讨。这里的“早期”是指从马克思大学毕业到《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这一段时间。马克思早期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状态,并通过实践批判而力图实现人的本质的还原,从人的历史形态出发指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1],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占有。对于马克思早期所阐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探索其根本旨趣。从个人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们有目的、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共同操控和利用社会资源与文明成果,消除因自发性与盲目性而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负效应,促使人在实践中达到劳动与享受一致、存在与发展统一,使其天赋与潜能、兴趣与才能、个性与自由均达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就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一个社会的全面革新、全面开放、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二者共同统一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与其片面发展相对立的。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都会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当、终极目标能否实现,这些都会对人能否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今天,分析马克思早期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践本质,弄清其基本内涵、实践维度、价值原则,有助于激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元动力,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2]。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既体现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

大生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也体现为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生态整合规律的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更体现为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建设的现代性的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做到社会理想与艰苦实践相统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契合、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人与社会的发展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尽管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与历史曲折的过程,但其发展的总趋势与历史走向将不会改变,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本质的当然要求。

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金融化浪潮,既在推动历史变革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又极易使人类陷入受“丛林法则”支配的狼群撕咬状态,从而招致人类精神世界的堕落和自我毁灭,这就需要反思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那么,怎样才能从资本逻辑普遍统治的金融化世界及其背反性和负效应中解脱出来、搭建一种把人民主体性、社会进步性和政党的先进性集于一体的制度框架,从而“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4]?对此,西方现代人学思想与后现代的人学体系,对资本逻辑下人的这种现代生存悖谬与发展困局,只是诉诸抽象的幻想或非理性的体验,试图依靠什么“人性觉醒”“爱欲解放”“总体革命”来消解“多余的压抑”,以实现所谓的自由发展等,这不但不能触及资本逻辑的畸形发展与人的片面

发展的本质,反而会消除马克思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人学真义。为了科学阐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真谛及其阶级立场,积极回应西方人学思想的挑战,本文拟从思想源头上探析青年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实践本质,以使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划清界限。

一、青年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及其本质的初步探索

青年马克思受学校与家庭进步思想的影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自觉地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立场上与专制势力进行斗争,立志为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终生。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一生一世要为全人类的普遍发展和人民幸福、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志向而奋斗:“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5]17}在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中,马克思反对脱离人民大众的虚幻的幸福期许和自由意志,反对将“应有”与“现有”对立起来,认为必须从现实社会矛盾及其自我展开中,“在自身求得自身的统一”^{[5]11},必须“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务”^{[5]62},并把“应有”与“现有”自觉地统一于现实的自由斗争中。这些论述初步表达了马克思试图通过与封建专制的斗争而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思想。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分析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在自然哲学上的区别与联系为切入口,分析了原子偏斜运动所蕴含的对机械决定论和盲目必然性及其破解的人学意义,为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就像原子偏离直线一样,人

的自由既在于思想自由,更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获得现实自由,因而不同意将人的自由看作是摆脱外在必然性的心灵宁静。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内在于同一,人民需要的不是什么心灵上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人民不只是需要自由的权力,更需要在民主政治上保障人民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奋斗。马克思认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6]75} 而人应该在某种抽象性的概念化活动中才能达到自由,唯有克服个别性而实现普遍性,精神自由才能在自我意识的解放中摆脱限制获得独立。人的自由只有在自我解放中才能实现,在纯粹的观念中人不能够实现什么真正的发展,“而事实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他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对立的”^{[6]237}。这里,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分析似乎很令人费解,但是,只要认真品味还是能够领悟到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解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不可能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获得全面发展,恰恰相反,人需要借助自然与社会实现对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来支配自然与社会,反而要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制约,从而失去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一些哲学家幻想在自我意识中实现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纯粹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并强调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跳出了过于专业化、技术化、纯粹化的思维窠臼,摆脱了研究的小众化和只在小圈子中秘密传递的书生气,开始投身到为广大无产阶级争取现实利益的火热

斗争中,通过批判当时的书报检查令而把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统治,认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实现出版自由才能在言论上代表人民的自由呼声,彰显人民大众的自由意志和神圣权利,而反对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违背了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和法的自由本性,唯有废除这一封建专制制度才能还人民以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的机会。不可否认,此时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把自由理解成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类本性,“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6]37},但他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自由与政治等级相对立的事实,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人民”个人的战斗而是“人民”整个等级的战斗。在此时写成的其他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物质方面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公开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那些在政治上、社会上备受迫害的劳苦群众的权益进行辩护,尖锐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对人民利益的侵害。国家和法本来应该是自由精神、自由意志的最高体现,理应维护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却践踏了这种自由精神的类本质,将之变成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把人的发展问题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必须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对准现存的政治制度本身。此时,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强调了真正的哲学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哲学对人民、对时代具有根本的依赖性,哲学是时代性的、人民性的智慧,是时代精神之精华、社会文明之活的灵魂,人民群众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思想精髓都集中在自己时代的哲学思想里,任何有社会良知的哲学家,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6]219},哲学是推动世界前进的理性精神和伟大动力,它随时随地要与自己的时代和

人民的需要相联系,与人民和时代相脱离的哲学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总之,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由于接触到了不平等的事实和矛盾以及阶级冲突,特别是随着对经济利益的发展、物质利益的满足对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意义极大的认识的提高,虽然从黑格尔普遍理性的善的本质出发,力图用理性的普遍法则战胜私人利益,但私人利益还是处处占据首要地位,这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抽象理性感到不满,并在随后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开始与黑格尔哲学决裂。另外,马克思也觉察到普鲁士国家与法的实质不是捍卫普遍理性,而是成为欺压人民、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君主政体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在压制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7],使世界不成其为世界。而法国大革命才是真正的能够“使人复活”的革命,其目的是“实现民主的人类世界”,要建立真正的属于人民的国家制度,就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因为唯有“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8]72},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哲学,一方面认识到了到处寻找普遍逻辑的努力是徒劳的,重要的是“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殊逻辑”;另一方面又受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负面影响,在谈论国家、市民社会等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8]51},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由此将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开始转向了对现存国家制度本身的批判上,由此踏上了历史唯物主义人学道路,开始唯物辩证地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出发,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认为自己的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唯有把理论批判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探索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路径。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把人的发展问题神学化或宗教化,是人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而创造了自己的宗教,而不是上帝依据神意而创造了人,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¹¹。正是这种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才产生了颠倒的世界意识;也正是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才把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希望与幸福寄托于幻想的世界。因此,要克服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与人学思想,就必须首先推翻造成这种颠倒的世俗基础。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只是本阶级的解放,它所推动的人的自由和发展仅仅限于本阶级,所以它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推翻私有制这种制度基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特质与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而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阶级解放和全面发展,即“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0]¹⁵。而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批判,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物质批判。哲学唯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使人真正“解放成为人”。这种对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性理解,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科学理解,距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本质已经很近了。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人的真正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10]¹⁶

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阐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使私有财产和一切异化都能够获得积极扬弃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从人的终极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最大意义上的人本学或人道主义。因此,共产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恰恰是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的自我异化、自我矛盾、自我生存悖论实现积极扬弃的人学体系。共产主义运动与纯粹的思想活动不同,它完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并且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对人的全部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就是人通过自己的阶级解放运动而向人自身全面本性的真正复归,也是人向社会意义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真正复归,而且人所实现的这种双重意义上的复归,是在完全的、自觉的活动中实现的,是作为内在目的和规律,时时处处起着决定性引导作用的。这种在全面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本质复归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是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社会形态,当然也是人与社会相统一的真正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全面发展的自然主义与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的真正结合,“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¹²⁰。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并以此来说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明克服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实际上是力图把人的发展问题归结为实践的发展问题,把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作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异化并消除异化的历史辩证运动,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历史辩证法以实践性的本质,赋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实践性的意涵。当然,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谈到了要将人的发展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未能指出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未能指出实践活动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一基本事实,未能指出实践活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和终极性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活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意涵理解得还很不完备、很不全面,把人的实践发展和人的实践本质看作一种一成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认为是某种抽象性的人性在支配着人的发展,抽象的人性既是人的原初的类本质,又是历史预设中的乌托邦幻想。这些局限性马克思后来都认识到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一一克服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实践活动,本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是人发展自我、确证自己类本质的“生命的活动”,是“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重要手段,是人的类生活。但是,这种活动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相异化。作为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本来是人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确证并表现着自己的本质和类特性。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与人相脱离,甚至与人相对立,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越丰富,自己就越贫穷、越廉价,就越受制于它,“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0]51},劳动的现实化即劳动产品表现的仅仅是物的现实化,是资本家资本积聚的实现,而非工人自身价值

的实现。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工人被自己的劳动对象无情地占有、工人阶级的人性的全面丧失、工人完全受自己的劳动对象奴役和支配,工人对物的占有和改造恰恰表现为工人被自己创造的物所异化或外化。而且,劳动的非人化、异己化竟发展到如此的严重地步,以至于工人创造了一切财富,却养活不起自己;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竟表现为人在对象化中的全面丧失,以至于工人连必要的生活对象都被剥夺一空;工人对对象的占有,竟表现为人与人的异化,以至于工人生产得愈多自己占有的就愈少,自己受自己生产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就愈强烈、愈明显。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竟然成了支配工人的异己物、一个束缚工人自由发展的锁链。这样一来,人非但不能在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发展,恰恰相反,却在自己的劳动中创造了一种制约乃至否定自己的异己力量。

一是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0]53}劳动产品之所以能够与工人相异化,原因就在于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劳动对人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它显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活,是肯定自我、发展自我的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通过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各种能力与素质而满足自己各种不同的需要,这种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属于人自己的劳动。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对人来说却成了制约自己全面发展的异己力量,不是全面地肯定自己而是彻底地否定自己,不是使自己感到幸福而是使自己感到不幸,不是全面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使自己的身心备受异己力量的严重摧残。异化劳动使工人唯有在劳动之余才感到真正的自在与思想舒畅,而在奴役般的异化劳动中却丧失了一切,艰苦的劳动不是什么积极的享受而

是极不情愿的被迫劳作,不是在劳动中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是成为满足劳动之外的那些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结果,工人总是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种非人的、自我折磨的、牺牲自己的外在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不仅不能发展自己反而导致了自身的丧失,其结果是:人徒然发展了自己的动物的机能(吃、喝、生殖等),并被视作是人的最后的唯一的目的,而属于人的机能——劳动的机能,却异化成为与人相对立的东西。总之,在资本的驱使下,人完全地自我异化了。

二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人的劳动相异化,也使得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纯粹外在性的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仅仅维持个人生存的外在手段,从而使类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异化,本来作为表现人的生命本质的合理性的实践活动,现在却变成了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只具有片面生存意义的动物性活动。正是由于人从事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类生活,才显现了人的类本质,反过来也一样。这是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本身相异化、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10]58},当一个人同自身相异化、相对立时,也就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发生了矛盾和对立。因为,人同自身的全面性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人的彼此关联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性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人与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类本质相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既是人同他人相异化,也是人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相异化,从而使他全面丧失了人的本质和类生活。导致这一切的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对自己造成不幸和痛苦,而给主宰自己的他人——那些非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快乐;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之所以会变成异己

性的敌对关系,那是因为有一个主宰自己的他人存在,使得自己的劳动成为不自由的强迫劳动,劳动的获得感丧失,“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0]59-60}。对人来说是异己性的对象,对他人来说却是自己的成果,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了畸形发展的个体而且还生产出了畸形发展的社会关系。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了站在劳动之外却能够支配这种劳动及其产品的人——资本家。

劳动的对象化并不直接表现为异化,也不必然就导致异化,相反,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导致了劳动的异化,要消除异化及其消极后果,就必须首先消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是实践的,消除异化必须诉诸革命性的实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8]294},正是自我异化的发展为消除自我异化铺平了道路。而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也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复归,它自觉地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辩证的发展。从对象化到异化再到异化的扬弃,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也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这唯有在完全消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全面实现。共产主义是全部历史运动的产物,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现实,“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11]140}。共产主义既要扬弃私有制及其所导致的异化,又要承继以往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不是退回到野蛮的原始状态,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

所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的对自己各方面能力与本质的历史回复,是人的自然史与社会史的高度整合与辩证统一,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12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会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意涵,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本质。

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人的发展及其本质的批判考察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批判者”们的学说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行了批判考察,认为他们通过采用神秘的、诡辩的方法,将主观的概念变成了主宰人的上帝,并把它视作一切感性事物包括人本身实现自身发展的原动力。“神圣家族”中的批判者将概念实体化、主体化,变成创造并支配一切的神圣力量,变成现实事物发生、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变成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目的与归宿。这样,自我意识就成为了世界万物的本原、自然和人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所谓自然史和人类史,也就成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以此看来,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人的一切发展、人的所有价值,就是自我意识的“批判的批判”的思维活动,“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12]。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异化和灾难都存在于工人的头脑中,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消除资本、雇佣劳动、剥削等观念,就能够医治好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病,工人们不必苛求什么在资本面前的平等发展,只要有了平等发展的观念,具有了自我的批判意识,也就“得着了一切”,就可以实现人人公平发展、人人求得

全福的“全面享有”了。照此而言,自我意识就是推动人与世界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除了显现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人的存在与发展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在显现而已,或者说,就是主观意识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世界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在物质领域的全面发展,不是什么物质生产的全面化和文明成果的全面化,而是自我意识及其批判力的极致化、全面化了;在自我意识中就能实现人谋求发展的一切方面,在思想领域而不是在现实的生产领域就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了。“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3]191},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化恰恰就是自我意识的神圣化和纯粹化。

相反,如果排除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和现实关系、剔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对人的发展的实际影响,不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方式入手去研究人,那么对人的发展问题就不能获得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把握。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真正来源,那么唯有从生产方式出发才能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而要正确认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就必须研究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正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关系即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相互关系。在物质生产中产生的社会财富,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本身。换言之,人存在于、发展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之中。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益总是与国家利益内在统一,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的不是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而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市民社会和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国家和法不过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资产阶级不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13]158},他们谋求实现的不是什么普遍的人权,因而也不可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社会基础。

《神圣家族》所针对的“批判者”们把人的发展理解为自我意识和精神实体的对立与统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人的发展归结为精神主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及其消除的过程,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或者群众,而是自我意识及其批判者的批判。例如,在布·鲍威尔看来,历史上的很多伟大活动之所以归于失败并陷于悲惨的结局,关键原因就在于引起了群众的真正关心。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堆消极无用的沙石,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只能导致社会的严重混乱与倒退,他们什么也不能创造,简直是一无所用、一无所有。而自我意识及其批判才是积极的、能动的、主导的因素,人的一切历史及其所实现的任何发展都是由它引发的。自我意识实现了社会改造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是所谓批评者的思维活动——自我意识批判,才是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张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端与实现人的发展的基础,由此而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3]22}。历史活动说到底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深入,必然是人民群众队伍的不断扩大和活动质量的不断提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还深刻分析了阶

级斗争、社会革命、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辩证关系,认为人的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陷入一种“表面的热情”或者一时的热闹,不是因为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而是由于旧的革命没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将革命的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13]104}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早就由其历史地位与生存状况决定了,早就由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将自己推向灭亡,当然,这必须依靠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斗争。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全面把握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那种社会形态的规律与趋势,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14],这实则也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做历史解读、实践解读的目的之所在。

四、结语

在论及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与使命问题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二者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针对私有制,资产者的保守与无产者的破坏之间的矛盾。离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仅仅依靠“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13]21},是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行灭亡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被颠覆、被消灭,靠

的不是“批判者”进行意识领域中的观念革命,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自酿苦酒——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把自己推向灭亡”^{[13]44}。当然,唯有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并逐渐成熟起来之后,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明确了自己要争取人类解放并最终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它才能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力量——革命的阶级——而完成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就是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提升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转变,视作人类解放和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步骤,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革命阶级,唯有把人类解放和自身的解放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15],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不断推进人类解放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上分析可见,马克思实践人学思想一以贯之,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实践性理解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并没有出现阿尔都塞所说的什么“认识论断裂”^[16],虽然此时马克思仍然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已对其做了实践性的重构,不再是什么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人本学。作为现代人学形态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之所以拥有“活在今天的过去”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对资本逻辑与现代科技内在联姻的现代性依据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批判,从而能深入到人的发展的历史性维度中去把握人的生活的实践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规律,这也是马克思实践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原则区别。

参考文献:

- [1] 孙正聿. 选择与标准: 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5(6): 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14.
- [3] 王伦光. 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78.
- [4] 张雄. 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 3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16.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8.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14] 叶险明.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性及实践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4): 4.
- [15]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37.
- [16] 安启念. 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认识论断裂说”批判[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18.



引用格式:刘金鹏. 习近平对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坚持和发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11-18.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11-08

习近平对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坚持和发展

XI Jinping's adh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critical inheritance theory

刘金鹏

LIU Jinpeng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 毛泽东、习近平相继提出了批判继承论和双创论,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从理论旨趣上看, 双创论和批判继承论都是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根本目的。从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上看, 双创论不仅与批判继承论一脉相承, 更是对它的创新发展。具体来说, 双创论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分析、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 进而, 明确主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科学回答了传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基础上提出的双创论, 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关键词:

习近平;
毛泽东;
双创论;
批判继承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 2019-01-0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金项目(CSY1806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8YJA720006); 中南民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CST19008)

[作者简介] 刘金鹏(1977—), 男, 河南省新野县人,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博士,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哲学。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批判继承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形成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论(简称“双创论”),深刻回答了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从批判继承论到双创论

辩证分析、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根本方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论及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遗产时首次阐明了这一立场观点。他说:“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恩格斯以黑格尔哲学为例,明确指出: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采取科学扬弃的辩证态度,而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做法。其理由在于,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必将导向文化上的传统主义或历史复古主义;而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则会导致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就此而言,坚持以辩证分析、科学扬弃的态度来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批判继承论,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1938年,毛泽东同志郑重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3-534}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2]707-708}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清理和选择性的汲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也非全盘否定。可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采取辩证分析、科学扬弃的基本态度,是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精髓。据此,毛泽东同志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划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根据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3]156}同年11月在山东曲阜考察时,他强调指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4]这就是说,只有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采取辩证分析、科学扬弃、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态度,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对批判继承论进行了创新发展,提出了双创论,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2013年12月30日,在谈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双创论。他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3]160-161}在这段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的具体问题虽然是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但他所阐述的思想已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遗产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方针,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双创论,从根本上来讲是要回答新时代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随后把“双创”的具体对象从中华传统美德扩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2014年2月24日,他又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164}在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双创论的对象明确界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阐明了双创论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重心。具体来说,双创论所聚焦的问题意识是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从方法、理由、宗旨和目的等方面阐述了双创论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5]11}同年10月15日,他又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29}在此,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双创论的主要内涵: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指导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科学扬弃是基本前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基本原则,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是基本立场,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是基本方向,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根本目的。简言之,双创论是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其侧重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批判继承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创论,阐明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前后虽相隔大半个世纪,但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作了精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

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吸取其中积极的养分。”^{[5]13}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科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确保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永续相传。

二、双创论与批判继承论的异同

由于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不同,毛泽东和习近平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始终坚持批判继承、科学扬弃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自觉担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身处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决定了他在阐述批判继承论时较为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革命,强调要继承那些富于革命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文化内容。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2]708}以人民性和革命性为划分根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两种态度,赞扬革命性、人民性的文化,否定乃至批判统治阶级的反动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强烈的革命取向。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的

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623}围绕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毛泽东强调要以革命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严厉批判那些带有奴性、压迫性与封建性的文化糟粕,表现出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和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2]695}因此,在开展革命战争、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2]708}。他深刻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2]708}基于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革命,对一切反动的、保守的文化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利于推进革命的深入展开并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比较强调先批评改造、后继承发扬。这就决定了,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毛泽东比较强调先批判改造、后继承发扬。换言之,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理论重心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清理、鉴别和改造工作,进而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继承发扬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不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至此,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划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文化问题上的思想界限。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自觉担负起领

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明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进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从本质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虽有着内在联系,但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着精华与糟粕的复杂统一体,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统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部分的总结和提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得到的智慧结晶。从内容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一切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文明进步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内容的总称,并不仅限于民主性、革命性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17}即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具体内涵,包括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方面。这意味着,可以从汲取哲学智慧、加强精神修养、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等多个方面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高度、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5]11}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所要传承和

弘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紧紧围绕着发展现代文化而展开,努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贯通,从而将文化的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古今融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创造出的灿烂成果,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太适应的地方。尤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治理等还存在着亟待协调、转化适应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5]11}。换句话说,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能照抄照搬、直接套用,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充分发扬创造创新精神,从内容到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7]18}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出双创论,正是为了科学回答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进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总体上看,习近平与毛泽东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方面有着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关联,贯穿其中的是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遵循着辩证分

析、批判继承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毛泽东提出了批判继承论,从总结和批判中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加以深化拓展和创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并主张要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治国理政、以文化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把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创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传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大问题,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导。

三、双创论对批判继承论的深化发展

从根本目的上讲,习近平提出双创论是为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指出:“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8]13}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勇于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体到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方面,从批判继承论到双创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传承民族文化血脉、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历史重任。

早在194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2]663}自此,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把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自由富强文明的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国家,这就突出了文化建设对新中国的重大作用,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是为了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9]337}。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立了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据此,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即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3]156}随后,他多次重申要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不断创造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0]41}面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不断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他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0]44}据此,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文化使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奋斗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1月正式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次年8月,他就提出了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大命题,并把它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这就意味着,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5-6}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0]40-41}由此可见,文化复兴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精神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文化复兴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必然要求。至此,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阐明了中华文化复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指明了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统一性。

由此可知,所谓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其精神实质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据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对此,陈先达先生解释说:“中国共产党负有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它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11]180}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有其特定的内涵,决不是笼统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复兴儒家思想。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她肩负着双重文化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0]44}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要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中华文化复兴有其独特而明确的内涵。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进一步讲,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绝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心目中的复兴传统文化,更不是某些西方学者眼中的“华夏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在如何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问题上,我们既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华夏中心论”,主张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以利于促进本民族文化

化的丰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2]¹⁷在此,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双创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创新发展,让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四、结语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命题,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新的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9.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习近平.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EB/OL].(2013-11-26)[2018-11-19].<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26/c64094-23661987.html>.
- [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6]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8]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引用格式:陈松. 继承与创新:张岱年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19-25.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19-07

继承与创新: 张岱年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Zhang Dainian's view on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陈松

CHEN Song

1. 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2.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作为知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本质规定和研究对象出发去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域,到从基本论域和理论问题入手去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再到从思想建构和范式转化去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致思方向,张岱年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与中国哲学的前途关联在一起,又将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联在一起,从而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中国的复古派和自由派想要让“新唯物论”边缘化的企图。历经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张岱年用独立而彻底的态度开启了一条选择“新唯物论”、评介“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道路,并由此形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化理解。

关键词:

张岱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哲学精神重建

[收稿日期] 2018-12-0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102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X004); 黄冈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201827903)

[作者简介] 陈松(1987—),男,湖北省恩施市人,黄冈师范学院讲师,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在大多数人看来,张岱年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著作中留下了关于本民族古典思想的精湛思考。然而,不只如此,张岱年同时还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从《关于新唯物论》到《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从《天人新论》到《晚思集》,历经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张岱年以其独立而彻底的态度开启了一条选择“新唯物论”、评介“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道路,并由此形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理解。在张岱年哲学中,“新唯物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属于“讲坛哲学”的张岱年哲学在该议题的阐发上还存在着覆盖面不全、时效性较弱等缺陷,但是其以重建中国哲学精神为切入点的思考路径的确有着独特的理论风貌。本文拟从定义域的澄清、问题域的反思和致思方向的展望三个方面,来全面呈现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理解。

一、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域

张岱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首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国化,它以“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以“新唯物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为对象、以形成有中国气派的“新唯物论”学说为目标,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以民族化的进程。这种理解并非空洞的说教与抽象的思辨,而是以其大半生的哲学探索为支撑的真切体会。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

继承,也体现了其对时代问题之独立而彻底的思考。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由毛泽东正式提出的。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只有诉诸民族化的形式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真正地显示出来。若撇开中国的特点而只是用一种理论静观的方式来对待它,其结果只能是收获一种“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随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之实践的不断深入,思想界日益共识性地将该命题的内涵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总的来看,上述理解构成了张岱年坚持“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理论背景。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正确执行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3]267-268},并认为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将“新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际统一起来的典范^{[4]369},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代表^{[4]433}。这些思想体系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的展开和推进。基于这种理解,张岱年强调自己对“新唯物论”之民族化的推进是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之中的。他所关心的中国哲学精神重建问题也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获得前提性的理解。因此,张岱年一生的哲学活动与他晚年基于毛泽东思想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契合。这虽然是一种带有借鉴性的事后反思,但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精神共鸣。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围绕着重建中国哲学精神这一思想议题,张岱年选择从本质规定和研

究对象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解读。

从本质规定上来说,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是因为:其一,哲学是张岱年的专业,他只能从自己的所学所思出发来分析和考察“新唯物论”的民族化问题。其二,张岱年把哲学看成是“庙里的神”,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前导,哲学乃是“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5]237}。其三,张岱年于1930年代初登上学术舞台,此时正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点从唯物史观转向辩证唯物论,又从对唯物辩证法的评介深入到对其实质进行探讨的关键时期。这时候,辩证唯物论已不再仅仅被定性为一门知性科学,而已经是在“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意义上充当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6]。张岱年对“新唯物论”之民族化的思考便是自觉立足于这一定位而展开的。其四,对教条主义者和旧唯物论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深入而持续的批判,是张岱年坚持“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起点。这些决定了他势必要以反思的方式去同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作斗争、跟实证化马克思主义的打算作区别^[7]。从澄清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前提到划定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界限,张岱年之批判的、反思的、哲学的工作方式三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总之,张岱年在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所以如此,是由理论背景、时代环境和思想主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新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在张岱年看来,“新唯物论”是普遍性的真理,它因为具有批判性而成为

“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又因为具有革命性而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4]157}。其次,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具体实际”,作为一个概念则比较复杂,它至少可以被区别为政治上的“实际”与学术上的“实际”。政治上的“实际”指向争取民族独立与推进社会改造的现实运动,而学术上的“实际”一方面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本民族人文精神的重塑。如此一来,“中国的具体实际”就在性质上被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亦被划分为“当前的中国现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两个维度。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只是出于思想上的辨析,其在实际中则具有整体性的特点。由此出发,既然张岱年将自己的理论事业聚焦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重建,那么他显然会更侧重于考察“具体实际”中的理论层面,并进而将重心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部分。诚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国家的实际不限于政治、经济的实际,也应包括思想传统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解剖,从而加以鉴别和抉择,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3]267}最后,二者的结合之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之路。这要求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去运用“新唯物论”,并使之在追寻“中国思想的位置”的过程中表现出必须有的民族化特征。不难发现,张岱年并不是在“拼接”或者“叠加”的意义上理解“结合”的,而是将其把握为一种思想上的会通和理论上的创造。他认为,正是对“民族独立何以可能”“社会改造何以可能”“民族精神重建何以可能”等问题的共同关注,二者的结合才得以在其推进过程中表现出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维度。因此,结合之道是在超越于中国经验而又内在于中国经验的意义上展开的,它既是思想互动的逻辑,也是文明互释的逻辑,更是人类自由与解放互助的逻辑。

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

在张岱年看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定义域的分析必然要深入到对其问题域的思考。如果说定义域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与研究对象问题,那么问题域则要对该命题的基本论域和理论议题作出回答。事实上,当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握为“新唯物论”之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论域和问题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要以“新唯物论”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为讨论范围,另一方面又要提炼出这一范围所涉及到的、本质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前者包括阐发“新唯物论”的性质和内涵、以“新唯物论”来重释中国传统哲学和以“新唯物论”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三个部分;后者则在反思中将前者所讨论的要点提炼为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问题。这样,张岱年就从根本论域和理论问题的统一出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具体性和丰富性的内涵。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前提的,它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把握其理论性质和领会其理论内涵的要求。众所周知,距今一个世纪之前,彼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让国人开始站在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的视域中来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之答案。这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相同又有些许契合之处的进化论思潮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相继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考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理论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唯物论”扎根中国作了铺垫。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等人就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等做过介

绍。但是,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此种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学说才真正得到重视。^[8]张岱年认为,“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性质和内涵进行宣传 and 评介,从而让国人知道并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去认可它、信仰它。由此出发,张岱年指出,“新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总体上是顺利的,它已经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的“新世界观”^{[3]263}。不仅如此,政治上的需要与学术上的契合也必定会将这种传播活动继续引向深入。这无疑会更加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唯物论”的理论实质进行探究。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以反思的形式去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张岱年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和“当代最伟大的哲学”的结论,它以方法论的决定论和过程论的决定论来凸显自身的现实性,又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能动论来彰显自身的理想性。张岱年认为,正是在这双重的思想逻辑中,“新唯物论”达到了既克服虚妄的道德乌托邦主义又超越琐碎的经验实证主义的高度,并进而以嵌入社会现实的方式开启了一种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可能。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重建本民族的哲学精神视为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思考“新唯物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径问题。张岱年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世界观的显著特点和本质规定。这意味着:一方面,张岱年并不是站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上来理解“新唯物论”的。对他来说,不能把原本旨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抽象化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这样只会以貌似拔高马克思主义之普遍性的方式而扼杀掉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张岱年反对将理论的目光完全拘泥于当前的事实层

面,认为不仅要对其经验做出解释,而且要对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进行把握,这无疑是要将分析的普遍性与问题的特殊性统一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既不只是从“新唯物论”出发,也不单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是从二者相结合的关系出发。因此,“结合”的过程就是对两种要素之关系的反思过程,而“结合”的目标就是去探寻两种要素怎样实现有机统一。张岱年将此工作进一步具体化为两个层面:一是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会通之道,即用“新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本民族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二是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当前实际的结合之路,也就是如何以“新唯物论”为指导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前者试图在“继往”的意义上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意蕴,并在致知论与人生论相统一的意义上回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后者则是在“开来”的意义上探索能与中国经济建设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些工作都是围绕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展开的,它们虽然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却能够以阶梯和支撑点的形式构成“新唯物论”实现深度民族化的内在环节。

其三,张岱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问题归结为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议题,强调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理论议题而展开的。在张岱年看来,“新唯物论”的民族化进程既表达着中国人对“解放何以可能”的探求,也表征着人类对“智慧何以可能”的追寻。所以,在求解放与求智慧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隔膜,二者反倒可以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动态平衡而达到包含差异性的统一。那么,如何把握这种统一呢?张岱年认为这乃是哲学的任务。他特别重视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服从于同样的规律”^[9]的说

法,并由此认为哲学不是概念演绎的形式学,而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有理信念之学”^[10]。这表明:反思的学问以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为前提,从而让属我的人生理想和非我的客观世界在不可完全归结的意义上充分地显露出来。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运用理论思维把外部世界转化为理智规定,即以观念的形态来构成思维中的客观世界。但是,这种转化和构成并非依赖于概念自身的生成与外化,而是坚持把思想的反思活动视作是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与此相应,张岱年强调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天听自我民听”“天使自我民视”等观念内含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分离。可“天人交相胜”的二元结构又最终需要被纳入到天人合一的视域之中,而克服天人相分、促成物我相融的不是神秘莫测的天意和一厢情愿的遐思,而是建筑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上的知行合一过程。

由此出发,张岱年强调“新唯物论”作为一种哲学,其在实现民族化的进程中也要遭遇到如何认识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这一难题。而行之有效的解答方式既不是从客观世界入手,也不是从人生理想着眼,而是把反思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直“在场”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自觉地克服差异,即要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实践活动中正视古今之别和中西之差,继而在真实的社会改造中来慢慢地加以消解。总之,张岱年在双重逻辑或复调线索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和艰难。在他看来,“新唯物论”的民族化进度有赖于对“同一个规律”的发现程度,而对“同一个规律”的发现程度又取决于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交会程度。因此,只有诉诸复兴中华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真诚思考,才能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上不断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致思方向

争取民族独立与推行社会改造是张岱年以理论思维所把握到的时代课题。在他看来,要对此作出创造性的回答,除需要国家加强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外,还必须为其奠定一个思想文化基础。所以,在由于特殊际遇而无法直接投身武装革命之后,张岱年便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探索“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即力图以学术救国的方式来为处在存亡绝续之交的国人提供一个独立的文化和实践的前导。通过对中国的当前现实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张岱年清醒地意识到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差的真实存在,这让他的理论工作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化的主体向度或客体向度,而把焦点集中于人生理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无论是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是外来的思想资源,都难以真正成为“有变革现实力量之哲学”。这意味着:要破解主客之谜、要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一条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康庄大道,就必须诉诸“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5]262}。而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论”为理解人生理想与客观现实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最为切实有效的概念框架,“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5]263}的研究路径,就成为张岱年重建中国哲学精神之路的基本致思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致思方向的探讨,其实质是这一进程的理论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张岱年强调:从该命题所设定的前景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建设有本民族风格和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实现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思想愿景。在张岱年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复兴,而中国哲学的复兴又取决

于能否以面向社会现实的方式来创建起新的、伟大的哲学理论。具体地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否定了全盘退回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努力,这意味着所谓的“新孔学”或“新墨学”均无法承担起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任。所以,应将“返本开新”的设想置换成“综合创新”的道路,即追寻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底色,并兼有中国传统哲学之精义与西方哲学之优长的新哲学。这种哲学的新颖之处不仅表现为有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而且展示为有反思性的问题意识。就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而言,新哲学是“一个新的学说”,它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5]274};就反思性的问题意识来说,新哲学又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它要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知行之合一、理论与实践之统一”^{[5]265}。显然,这样的任务无法由持文化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的哲学家来承担,而只能交付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唯有他们才会在改变世界的层面上将哲学的创造议题与民族的前途问题关联在一起进行考察。鉴于此,张岱年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新世界观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故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顺着新唯物论的创造者们之趋向,而更有所扩充”^{[5]278}。这条路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方向,也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颇具现实性的理论规划呢?张岱年的建构路径大致可概括如下:一是运用理论思维辨别、澄清“新唯物论”中的核心概念,并由此去深入解读这一理论的性质和内涵;二是坚守“新唯物论”的原则、掌握“新唯物论”的方法,进而以此作为概念框架去分析中国的新情况与新变化;三是吸收其他哲学流派中的合理因素,对中国传统哲学里的“活的”东西进行继承和发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指南。这一过程表现为正视差

异的综合、诉诸对话的综合、漫长艰难的综合与有限统一的综合,它把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着的思想传统作为理论的源头活水,并永远在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双重视域中保持着对“同一个规律”的追求。

以上就是张岱年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目标的基本思想。在他看来,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新唯物论”不仅需要“有血有肉”的研究内容,而且需要“有情有理”的研究原则,它既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科学”,也是范导个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心理学”^[11]。从对“新唯物论”的明觉精察到创立“天人新论”的哲学体系,再到晚年以价值问题为导向的文化问题研究,张岱年始终是围绕这一致思方向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借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说,他似乎不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或内容来研究,而且还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把它理解成一种中国理论研究都应该遵从的原则与范式。以此为基础,张岱年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与中国哲学的前途关联在一起,又将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联在一起,从而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中国的复古派和自由派想要让“新唯物论”边缘化的企图。可以说,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理解是深刻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晋代的今天,张岱年的上述观点必将为我们重建

本民族精神家园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2] 汪信砚.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 [3]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4]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5]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7] 陈松.哲学或实证科学:论张岱年与叶青的“新唯物论”性质之争[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5):123.
- [8] 王南湜.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4-97.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2.
- [10]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532.
- [11] 陈松.解蔽与重建:论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J].湖北社会科学,2016(12):5.



引用格式:李新安,李慧.基于节能减排的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26-35.

中图分类号:F8;F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26-10

基于节能减排的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carbon finance market from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erspective

李新安^{1,2}, 李慧²

LI Xin'an, LI Hui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省区域产业创新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实施节能减排和产业清洁生产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碳金融市场作为控制碳排放的市场化手段,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与推进节能减排等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基于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系统剖析碳排放控制与碳金融市场产生的内在逻辑,在研究探讨碳金融市场节能减排传导机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应在我国碳金融市场试点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完善碳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市场激励、推进碳金融产品创新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节能减排;
碳金融市场;
环境金融;
碳排放

[收稿日期]2019-04-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215、U170413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790050);河南省软科学计划项目(182400410020);河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8A790003,2016-zd-075,2017-ZZJH-026)

[作者简介]李新安(1967—),男,河南省济源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区域产业创新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创新;李慧(1995—),女,河南省济源市人,河南省区域产业创新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人员,英国女王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学。

在世界面临能源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节能减排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一直是全球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排放”)国家,减排压力不断增加。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将导致经济增长逼近甚至超越生态边界,不顾生态边界条件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人类社会至今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发展模式^[1]。以节约能源和降低碳排放为核心的绿色发展被誉为解决能源问题 and 环境污染的重要革命。碳金融市场作为控制碳减排的市场化手段,已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强调能源的低碳化发展。而中共十九大则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美丽中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目前节能减排、生态中国建设已作为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二三十亿吨碳排放量的市场规模^[2],将为构建以绿色碳金融市场为标志的清洁生产、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等关联产业的碳金融服务体系带来重大机遇。为此,国家于2017年12月以发电行业为试点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索。例如,赵昕等^[3]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碳金融市场发展中政府的角色选择问题;郑大宇等^[4]基于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配额分配、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经验,提出我国需从碳配额比例分配、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构建全国碳金融市场;姜睿^[5]、余孝云等^[6]则通过对国内外碳金融市场交易状况与发展的对比研究,得出应

着力解决我国碳金融市场在排放权交易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全国统一的碳金融市场的构建;李丽等^[7]通过分析欧盟碳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得出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助于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结论;李炫榆^[8]在分析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市场结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从中介机构培育、碳交易外部服务、政府与市场协调等方面构建全国碳金融市场。这些研究对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如何根据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研究国外与国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走向,借鉴国际碳金融市场运作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合理高效的碳金融市场运行模式,以逐步形成碳减排和更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基于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系统剖析碳排放控制与碳金融市场产生的内在逻辑,研究探讨碳金融市场节能减排的传导机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节能减排内在需求与碳金融市场的产生

1. 高碳模式的不可持续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低碳要求

自18世纪产业革命发生以来,全球碳排放量一直呈快速上涨态势。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加大和传统发展模式的能源高消耗、二氧化碳高排放,在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能源、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9]。该报告显示,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由工业化以前的280ppm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为65万年来最高;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长率也在持续增长,

1995—2005年平均每年增长1.9ppm,而1960—2005年平均每年增长1.44ppm。1970—2005年,碳排放量大约增加了80%。全球气候危机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均不可能再继续走高碳排放的发展模式。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倡导各缔约国自愿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协定书》(以下简称《京都协定书》)规定,各缔约国应遵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通过三种灵活的交易机制,完成量化的减排目标。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在《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了“低碳发展”这一概念,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带来更多的经济产出,制定了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在1990年承诺目标的基础上再减少60%的总体目标。2006年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呼吁全球发展低碳经济,重点提到全球每年仅需贡献GDP的1%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可避免5%~20%的GDP损失。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对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与减排额度做出了具体规定。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在维护《京都协定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的共识。同年我国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于2020年达到单位GDP的碳排放量降低50%左右的低碳发展目标。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低碳循环发展,使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显示了我国对碳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重视。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

以内,并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近年来,各国在应对气候危机过程中,积极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低碳发展战略,使碳排放量的增速有所减缓。联合国国际能源署(IEA)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碳排放量达300多亿吨(见图1,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官网数据收集整理)。近三年,全球碳排放量几乎持平,同时世界各国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保持在3%。但据相关部门预测,未来全球碳排放量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到2030年将达到450亿吨,而且在能源使用结构中煤炭仍将保持一定的快速增长(见图2,资料来源:《世界能源展望2011》)。

2. 节能减排与发展模式转变的低碳化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能忽视的是,高速发展曾依托的高能耗、高排放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发达国家依靠高排放、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实现了现代化,但对于以新兴人口大国为代表的数倍于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过去2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地球资源环境约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自2006年我国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后,碳排放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我国目前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每年消耗煤炭约37亿吨,排放二氧化碳近100亿吨,占全球碳排放的27%左右^[10]。由于我国经济体规模大且正在快速发展,无论是当前的排放总量还是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均在迅速增加,中国没有足够的碳排放空间来复制发达国家过去的高排放工业化模式,我国实施节能减排向产业低碳化转型刻不容缓。从长期来看,碳减排关系到经济转型和未来新技术制高点之争^[11],但从短期来看,碳减排又不可避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没有经济的发展

也谈不上低碳^[12]。相关研究发现,治理空气污染在短期内可以同时减少部分碳排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减排要求更加严格时,协同效应将越来越有限^[13],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结构优化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学者们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例如,顾阿伦等^[14]认为,结构因素是影响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而且决定着能耗强度的高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原嫒等^[15]基于多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业份额对碳排放的影响强度恒为正值,而服务业对其影响强度逐步降低。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发展目前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积极推进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能源结构优化等节能减排政策和行动,并取得显著效果。“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提前达到峰值,尔后逐渐下降。为此,国家将对钢铁、电力、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碳排放实施主动有效控制,到“十三五”期末实现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累计降低18%。这样的发展目标是基于我国的发展基础、能源结构和产业发展做出的科学规划。从能源效率来看,我国单位GDP能耗整体呈下降态势,201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约3.7%,比2012年累计降低20.9%,年均下降4.6%,5年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折合约10.3亿吨标准煤^[10],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从能源结构来看,我国近年来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并逐步向多元化、清洁化的新能源转变。2011—2017年,我国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从70.2%

降至60.4%。而天然气、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2011—2017年,天然气占比从4.6%增至5.4%,核能等占比从8.4%增至12%。目前在我国,煤炭仍是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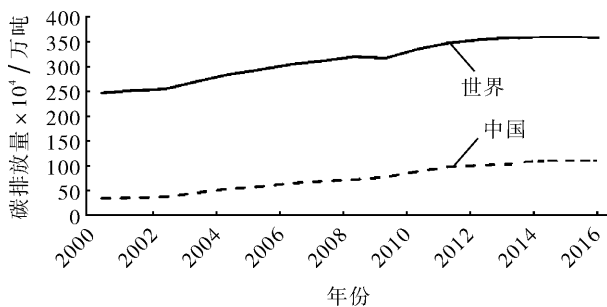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与全球碳排放的总体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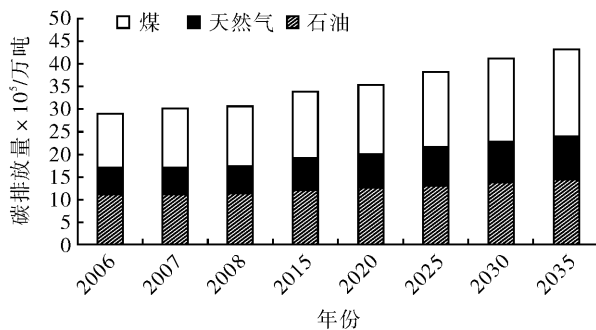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趋势与结构预测

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量减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为稳定;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2003—2017年从46.4%降至40.5%,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有助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量的消减;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呈稳步上升趋势,2003—2017年从41%增至51.6%,这将非常有助于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为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低碳发展目标,急需通过构建合理高效的碳金融市场运行模式,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推动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逐步形成碳减排和更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 碳金融市场的产生及其对节能减排的传导机制

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碳金融,而碳金融发展的基础则是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碳金融发展的关键。碳金融和碳金融市场的出现,源于《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大国际公约的签署通过。为促进各缔约国完成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各缔约国的减排责任,制定了三种灵活的碳配额交易机制,由此推动了碳金融市场的产生与发展。由于碳金融市场初期的主要交易标的为温室气体排放权,因此又可将其称之为排放权交易市场。但由于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国际上通常将其他温室气体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来计算最终的减排量,因此国际上习惯将排放权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或碳金融市场。世界银行指出,碳金融是通过购买减排量的方式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应对气候危机、达到碳减排目标的金融创新机制。作为环境金融的分支,从狭义来看,碳金融仅指碳交易;从广义来看,碳金融是指与碳减排相关的金融制度和交易活动^[16]。碳金融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存在着交易碳配额和碳抵消(碳中和)交易市场;其二,存在投资者从事清洁能源投融资活动;其三,评估企业碳风险与收

益^[17]。碳金融市场通过不同碳金融产品组合,利用市场机制,在降低减排成本的同时可以降低环境风险^[18]。简略地说,碳金融就是与碳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可称为碳融资^[19]。综上所述,碳金融是指因《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为低碳技术、低碳项目、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信贷等提供服务的金融活动。

碳金融市场的出现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平台,从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市场化的交易手段。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碳减排计划的落实,对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碳金融市场作为一切与碳交易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以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为交易标的,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日益推动着节能减排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虽然行政手段在一定时期可发挥较大作用,但根本驱动力仍是市场激励。碳金融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手段诱导能源技术和制度创新,使减排和环保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其实质是在减少碳排放和生态保护目标设计上引入市场化机制,通过市场手段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境违法企业的资金支持,引导资金流向二氧化碳减量化的节源技术、环境代价最小化的生态产业等领域,以金融杠杆调配经济社会资源促进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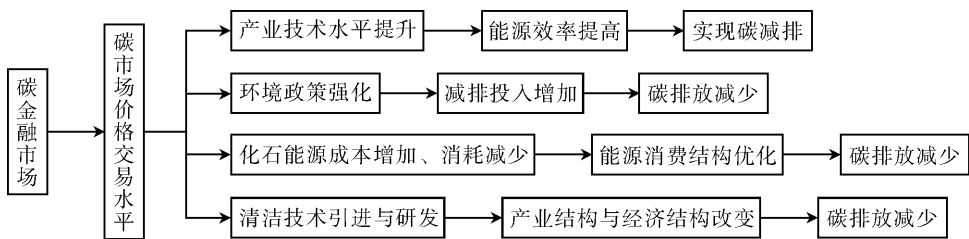


图3 碳金融市场诱导节能减排的传导机制

区域清洁发展、开发低碳产品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碳金融市场诱导节能减排的传导机制如图3所示。

气候变化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累积所衍生的环境效应,而不论温室气体是何时何地产生的。这一特性使得可以通过碳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直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协同效益方面,引入碳价将直接导致一部分大气碳排放量的减少。图4显示了在碳金融市场推进情景下引入碳价格上涨后的碳排放量与基准情景的对比与预测。

二、国外碳金融市场运行情况与经验

1. 国外碳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碳金融市场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碳交易提供了市场化的交易场所。目前较多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投入运行,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的排放份额呈明显上扬态势。2005年随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为 2.096×10^5 万吨;而在2010年随着新西兰碳金融市场、区域温室气体倡议和日本东京总量限制交易体系的启动,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达 2.3×10^5 万吨;到2015年,随着日本埼玉、美国加利福尼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魁北克、瑞士、我国7个试点省市、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纷纷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达 4.613×10^5 万吨。截至2017年2月,随着我国福建和加拿大魁北克碳金融市场的正式运行,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高达 7.425×10^5 万吨。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市场规模将高达3.5万亿美元。2017年全球各主要碳金融市场的相对覆盖率如表1所示(根据《ICAP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

2017》收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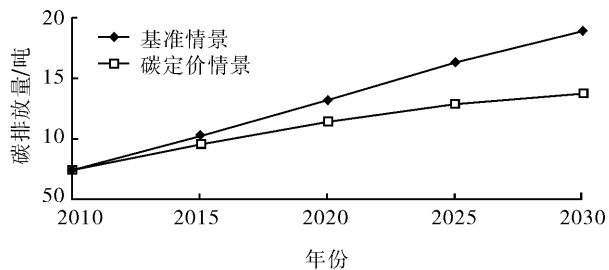


图4 碳金融市场碳定价情景对排放量的影响与预测

表1 2017年全球各主要碳金融市场的相对覆盖率

体系名称	相对覆盖率	体系名称	相对覆盖率
欧盟	45	加州-魁北克	85
新西兰	51	瑞士	11
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20	韩国	68
东京	20	安大略	85
埼玉	17		

全球碳金融市场覆盖排放份额的增加带动了配额交易的增加。截至2017年12月,全球各主要碳交易体系的配额拍卖收入高达300亿美元。其中,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自2012—2017年的配额拍卖收入为196亿美元;区域温室气体倡议在2009—2017年的配额拍卖收入为26亿美元;美国加利福尼亚碳金融市场在2012—2017年的配额拍卖收入达到44亿美元;加拿大魁北克碳金融市场在2013—2017年的配额拍卖收入约为11亿美元。

不同的碳金融市场,碳价有所不同,价格在3~18美元间波动。2016年碳金融市场的碳价呈上升态势的主要有:新西兰碳金融市场的碳价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波动区间为5~14美元;韩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价总体呈上升趋势,碳价围绕15美元上下波动;加州-魁北克碳排放交易体系碳价稳定,基本维持在13.57美元。

* 资料来源:LI M, SELIN N E, KARPLUS V J, et al. Presentation effects of China's energy policy on future air quality in China and the U. S. [C]. Th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014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2014。到2030年,若碳价格上涨至38美元/吨,相当于每年减少4%的碳排放量。

2. 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机制与经验

(1) 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机制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四大类,即需求方、供给方、中间商和监管机构,各参与主体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其中,需求方大多为有减排义务的经济实体,为达到监管机构的目标和要求,它们大多通过碳金融市场购买碳配额或减排量,落实碳减排计划;供给方大多为拥有可转让配额的经济实体;中间商大多为碳排放权交易所、碳基金、投资银行等,主要负责碳减排项目的设计申报和实际碳排放的核实等;监管机构大多为各国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审核碳减排项目,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内容,监管碳金融市场的运转。

为帮助各缔约国完成碳减排预期目标,《京都议定书》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设计了三种市场交易机制:其一,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缩写为IET)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IET允许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剩余排放配额,但是必须同时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其二,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缩写为JI)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项目级合作。JI允许发达国家用在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碳减排项目获得的减排信用抵消自己的减排义务。通过项目级合作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单位也可用于相互转让,但是必须同时从转让方的分配数量配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蒙特利尔高层会议于2005年成立了JI监督局,负责对JI项目活动进行监控。其三,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缩写为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项目级合作,也是唯一一个让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这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项目级合作。通

过该项目级合作实现的经核证减排量(CER),发达国家可用于抵消减排义务。但是需要说明的是,CDM项目必须经过由《框架公约》下的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指定的经营实体”(CDE)的审定和核证。

(2) 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经验

第一,健全的碳金融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全球碳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转离不开各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对气候变化、碳减排、碳交易等方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为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如欧盟先后于2005年和2007年通过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和《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20],澳大利亚于2007年出台的《碳主张与交易实践法》,美国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通过的《清洁能源和安全议案》和《美国电力法案》,都极大地推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二,日趋完善的碳金融市场规则和碳排放交易体系。许多国家或地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为实现节能减排、经济结构升级等目标,纷纷依据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断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促进碳金融市场发展。根据交易基础,目前碳金融市场已形成以配额交易为基础的配额市场和以项目交易为基础的项目市场。配额市场的关键在于限量,即规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按照配额进行分配,分配的配额可用于交易,配额市场在两类法律框架下包括四个交易层次,即多国(区)合作市场、区域性市场、国家级市场和零售市场(见图5)。而项目市场的核心在于对具体的排放源制定排放基准,已核证的减排单位可用于流通买卖。项目市场主要包括联合履行机制(JI)下的减排单位(ERU)和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可通过能源使

用效率、能源结构转型、发展模式升级等目标的实现情况来反映。就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各主要碳金融市场碳排放覆盖范围广、市场流动性强、交易主体活跃,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碳排放交易体系日益成熟。

第三,丰富多样的碳金融市场产品结构。在交易过程中,碳金融市场不断推出新的碳金融产品,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基金、碳保险、碳信托等。碳金融市场的主要交易标的为碳排放配额和核证碳减排量。以此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品创新纷纷出现,如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新型碳金融产品的出现,丰富了碳金融市场的产品结构,满足了各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为碳金融市场注入了生机活力,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市场流动性。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及政策建议

1. 我国碳金融市场试点运行状况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我国面临着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我国进行了多方面的碳减排实践探索,如各地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和地方性碳交易所,开展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工作,研发创新低碳技术,促进能源体系转型,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大力推进全国碳金融市场构建等。目前我国一些省市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试点工作已取得良好进展。

截至2017年初,我国8个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1.6×10^4 万吨,成交额达25亿元。其中,广东碳金融市场成交量最大,为2334.05万吨,占总成交量的14.5%;而北京碳金融市场成交额最大,达4.74亿元,占总成交额的18.96%。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的交易标的主要有排放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从2017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排放配额为各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的主要标的,而用于抵消的CCER交易量较少,价格也较低,表现出供过于求的状况。试点省市在碳金融市场发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以下从碳排放相对覆盖率、行业覆盖范围和碳价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截至2017年12月,我国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碳排放的相对覆盖率超过35%(见表2,资料来源:根据《ICAP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2017》收集整理)。其中,广东和福建的碳金融市场表现良好,相对覆盖率均达到60%,上海达到57%,湖北最少,仅有35%。

从行业覆盖范围来看,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覆盖范围较少,工业和电力行业8个试点碳金融市场均有覆盖(见表3,资料来源:根据《ICAP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2017》收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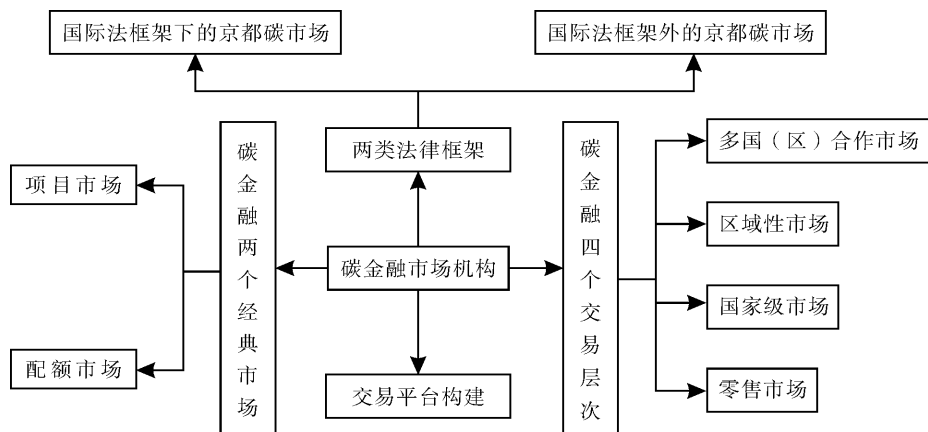


图5 碳金融市场结构示意图

表2 2017年我国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

碳排放相对覆盖率 %

试点省市	相对覆盖率	试点省市	相对覆盖率
北京	45	天津	55
广东	60	重庆	40
深圳	40	湖北	35
上海	57	福建	60

此外,广东、上海和福建覆盖了航空业,而且上海还覆盖了建筑业;北京和深圳则均覆盖了建筑业和交通业。

各试点省市2017年碳金融市场的二级碳价亦有所不同,价格1~8美元不等。北京和上海碳金融市场的碳价总体呈上升趋势,波动区间为4.5~8美元。广东碳金融市场的碳价总体趋于稳定,波动区间为1~3美元。深圳、天津和湖北碳金融市场的碳价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波动区间为2~5美元。重庆碳金融市场碳价波动巨大,波动区间为1~6美元。

表3 各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覆盖行业	北京	广东	深圳	上海	天津	重庆	湖北	福建
工业	√	√	√	√	√	√	√	√
电力	√	√	√	√	√	√	√	√
建筑	√		√					
交通	√		√					
废弃物								
航空		√		√				√
林业								

总之,试点省市的碳金融市场历经几年来的试点运行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成交额和成交量上均有所突破。目前,全国范围的碳金融市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配额分配方案等核心要素已得到国务院批准。2017年5月9日,全国碳市场电力、水泥和电解铝行业配额分配方案(讨论稿)公布,但要建立全国的碳金融市场,仍面临许多难题。

2. 政策建议

实施节能减排作为促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强度与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开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快形成向绿色发展转向的倒逼机制,以碳金融市场和绿色金融工具促进产业清洁生产势在必行。尽管我国碳金融市场得到一定发展,各试点碳金融市场整体表现良好,但所面临的碳金融市场发展支持政策的完善、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碳金融产品创新、参与主体活跃度提升、覆盖行业扩展等问题亟待解决。为更好地推动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尚需从以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1)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碳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部门规章形式于2014年12月发布,并对全国碳金融市场的配额管理、排放交易、核查与配额清缴、监督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尽管2016年7月国家已在《办法》基础上完成《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的起草工作,但《办法》仅作为一份框架性文件,目前依然是我国碳金融市场运行和管理的主要依据。该《办法》缺乏可操作的相关配套法规,具体的实施细则与内容尚待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从全球主要碳金融市场和我国各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仅靠部门规章的约束是不够的,必须从立法层面对碳金融市场的各个环节进行规定约束,使碳金融市场的运行和监管有法可依。

(2)推进全国碳排放交易的强大市场激励机制的形成。碳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成熟完善的碳排放市场交易体系。目前我国各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存在参与主体不活跃、交易产品单一、覆盖行业少、市场透明度不强等问题。促进节能减排的根本动力是市场驱动,而交易的无序化与不规范,区域间的交易壁垒,以及市场信息公开的滞后性和不透明性,都极大阻碍了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因此,构建多层次、高效率、透明公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3) 加大促进节能减排的碳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与全球主要碳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各试点省市碳金融市场的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种(即排放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碳金融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交易价格偏低,交易量较少。因此,应加大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融入节能减排的绿色发展内涵与技术特征等要素,开发碳金融衍生品,如碳远期、碳权质押贷款、碳期货、碳期权、掉期等,以丰富我国碳金融市场产品结构,吸引市场主体进入交易,为提升能源效率和推动产业清洁化生产注入生机活力。

(4) 加强碳金融市场国际合作,为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碳金融市场虽经历了几年的试点工作,但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相应的技术和经验支撑仍较缺乏,难以充分发挥促进碳减排的巨大市场规模效应。通过强化国际间碳排放权交易的合作,既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碳金融市场的成功经验,为全国碳金融市场的构建提供有效指导;又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助力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构建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周绍杰.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1):14.

[2] 蔡宇涵. 国内碳交易市场现状及问题研究[J]. 中国商论, 2017(7):5.

[3] 赵昕,朱连磊,丁黎黎.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演化博弈均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8(3):76.

[4] 郑大字,郑林琳. 欧盟碳交易运行机制及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J]. 低碳建筑技术, 2017(3):118.

[5] 姜睿. 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及发展策略[J]. 石油石化绿色低碳, 2017(1):13.

[6] 余孝云,何斯征,姚烨彬,等. 中国碳金融市场

现状[J]. 能源与环境, 2017(1):50.

[7] 李丽,董必俊,李玉坤. 碳金融市场发展与产业升级关系实证分析——基于欧盟碳交易市场[J]. 商业经济研究, 2018(13):179.

[8] 李炫榆.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福建金融, 2017(2):8.

[9] IPCC. Climate change: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996-1022.

[10] 王伟. 我国能源向低碳转型时不我待[N]. 国家电网报, 2019-01-03(02)

[11] 林伯强,李江龙. 环境治理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转变——基于煤炭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84.

[12] 钟世川,毛艳华.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分解——基于要素分配参数的讨论[J]. 统计研究, 2016(9):22.

[13] NAM K M, WAUGH C J, PALTSEV S, et al. Climate co-benefits of tighter SO₂ and NO_x regulations in China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6).

[14] 顾阿伦,吕志强. 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3):37.

[15] 原嫒,席强敏,李国平. 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多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 地理研究, 2016(1):82.

[16] 李静. 碳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及监管制度改进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11):94.

[17] ALBERTO M, FRANS P. Carbon trading thickness and market efficiency[J]. Energy Economics, 2010(32):1331.

[18] HAN Y J, HAN X.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an economic analysis [J]. Energy Procedia, 2011(5):2278.

[19] 鲁政委,汤维祺. 碳金融衍生品的意义和发展条件[J]. 金融发展评论, 2017(1):42.

[20] 王冰. 国内外碳交易机制构建的比较分析及经验借鉴[J]. 对外经贸实务, 2016(10):39.



引用格式:李寒娜. 基于利益协同的我国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36-42.

中图分类号:C939;F06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36-07

基于利益协同的 我国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Research 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based on interest cooperation

李寒娜

LI Hanna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基于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利益最大化会导致不同主体在参与环境协同治理时产生利益分配的矛盾,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多方的合作及其连续性,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实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构建基于夏普利值法的区域协同治理利益分配模型,得出当地政府、环境敏感型企业、社会公众作为不同主体在进行环境治理时需承担之费用的比例分别为47%、41%和12%。为确保协同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建立信息共享主体互信机制、平等开放的参与执行机制、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与监管机制、多维长效的利益共享补偿机制,以保障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切实取得实效。

关键词:
利益协同;
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

[收稿日期]2019-04-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JJ072)

[作者简介]李寒娜(1986—),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环境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1]。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外部性和空间溢出性,因此,跨区域协同治理是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关系,由此而产生多元的利益主体,每个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协作的过程中也许会做出不利于其他合作主体或整体生态环境的行动。如何将利益在各主体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保证多元主体参与的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稳定有序地运行,是保障我国生态环境跨区域协同治理取得成效的核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于水等^[2]、司林波等^[3]通过分析指出,在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上,应将国家、社会与市场的相关力量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杨华锋^[4]针对各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演变规律,认为要通过政府在相关制度上的有针对性地引导,促使企业主体通过贯彻自身企业文化来实现生态环境治理。黄德林等^[5]将治理主体分为政府、社区、对环境要求较高的企业和社会中形成的环境保护组织四类,李叔君等^[6]认为这些治理主体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协同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其中社区的参与发挥着重要作用。J. Westerink 等^[7]综合考虑了环境责任的划分、技术水平、文化理念,进一步证实了在环境问题治理过程中协同所带来的好处,其中公众的参与度、一国民众发展的程度与权力的集中,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研究都强调并证实了生态环境的治理需要各主体之间的协作,那么谁在各主体之间发挥主导作用呢?针对这个问题,Carroll^[8]、乔花云等^[9]指出,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主导作

用的应该是地方政府,其作用有没有充分发挥,关系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效果。但是地方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影响社会环保组织的参与度,使得环境治理效率低下。唐任伍等^[10]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明确各主体的权责。王品等^[11]指出,由于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很难实现个人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如出现偏颇,会导致协同治理失败。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因此,协调好各方利益,是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得以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鉴于此,本文拟从博弈的视角分析各主体利益最大化下的选择策略,找出各主体合理的费用承担比例,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地方政府、环境敏感型企业和社会大众作为不同的主体,在参与环境协同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策略选择。为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不同的策略选择对环境治理的效果也会不同。下面从博弈的视角,详细分析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博弈过程与机制。

主体的策略选择有污染或治理、惩罚或不惩罚,而不同的策略选择会给主体带来不同的利益。基于此,博弈模型假设为:(1)各主体之间的博弈分三个方面:公众与公众、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当地政府;(2)因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各主体之间不清楚彼此所选择的策略;(3)每个主体面对风险都是中立的。

1. 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博弈

公众 M 和 N 在生活过程中面对环境问题

有治理或污染两种选择策略,如果选择污染策略,他们的收益分别是 P_1 和 P_2 ;如果二人发现选择污染会带来各种坏的结果,而选择治理策略,得到的收益是 Q_1 和 Q_2 。据此可得出两人的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根据收益矩阵,可得出双方最优策略,即两人都选择治理,也就是选择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减少非环保用品的使用、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用电等,提升整体环境质量,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选择治理得到 Q_1 和 Q_2 收益这个策略组合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对于 M 和 N 来说,选择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的成本要高,从短期来看,其个人收益会受到损失。环境的投资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并且可能导致短期的利益被损害,因此,通常 $P_1 > Q_1, P_2 > Q_2$ 。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于 M 来说,其最优策略为污染;同理,对于 N 来说其最优策略也为污染。这样就会出现“囚徒困境”的局面,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改善。

表 1 公众 M 与 N 博弈的收益矩阵

M	N	
	污染	治理
污染	P_1, P_2	P_1, Q_2
治理	Q_1, P_2	Q_1, Q_2

2.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

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有些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假设存在两个企业 E 和 F,二者均为环境敏感型企业。对于企业来说,其生产的目的是减少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对于一个非环境敏感型企业来说,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获得了正常利润 S ;对于环境敏感型企业来说,出于保护环境的压力,其生产经营中还需要额外的费用来购买排污或净化装置,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假如自身不购买排污或净化装置,而是直接将污染物偷偷进行排放,则会带来一部分额

外的利益 S_0 ,二者选择策略的支付矩阵如表 2 所示。如果企业偷偷排放污染物但并不会受到惩罚,对于企业 E 和 F 来说,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会选择污染这一策略。但是从整体社会效益来说,企业选择污染策略后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大众承担了这一负的外部性,继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就转化为大众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大众会与企业进行谈判或者向企业施加压力,但是由于大众行动缺乏激励机制,且谈判带来的收益具有外部性,存在很多人“搭便车”的行为,所以谈判往往不会成功或者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寄希望于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干预。

表 2 企业 E 与 F 博弈的利益矩阵

E	F	
	污染	治理
污染	$S + S_0, S + S_0$	$S + S_0, S$
治理	$S, S + S_0$	S, S

3. 环境敏感型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以 GDP 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政策驱使下,只要能带来经济增长,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就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鉴于此,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进行分析。

(1) 基于当地政府监管不担责的利益博弈

面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当地政府有监管或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而且如果监管不力也不会受到惩罚。对于企业来说,面对政府的监管,有治理或不治理两种策略选择。如果政府选择监管策略,需要为此投入一定的成本,假设花费为 H ,进行监管的概率为 a 。企业选择不治理策略时,可能会被发现,也可能不被发现,假设发现的概率为 P ,且 $0 \leq P \leq 1$,此时受到的罚款为 Y 。假如企业选择治理策略,所花

费的成本是 T_1 , 概率为 β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选择不治理策略被发现时, 企业的名声也会因此受到损害, 带来的成本为 T_2 , 且 $T_2 = PY$ 。基于此, 二者形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博弈利益矩阵如表 3 所示。当 $PY > H$ 时, 仅存在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 若 $H > PY$, 对于政府来说, 进行监管需要付出的成本过大, 不监管、不治理就成了唯一存在的纳什均衡。这个均衡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的要求不一致, 所以要使 PY 的值增高, H 的值减小, 从而达到 $PY > H$ 。基于此, 二者的期望收益函数则分别为:

$$\pi_g(\alpha, \beta) = \alpha[-\beta H + (1 - \beta)(PY - H)]$$

$$\pi_e(\beta, \alpha) = \beta[-\alpha T_+ + (1 - \alpha) T_1] + (1 - \beta)[- \alpha PY]$$

对二者进行一阶求导, 得 $\alpha^* = T_1/PY, \beta^* = 1 - H/PY$, 即混合策略博弈的纳什均衡。

当 $\alpha \in (T_1/PY, 1]$ 时, 对于企业来说, 其最优的策略选择为治理污染排放。

当 $\alpha \in (0, T_1/PY)$ 时, 对于企业来说, 其最优的策略选择为不治理污染排放。

当 $\beta \in (1 - H/PY, 1]$ 时, 对于政府来说, 其最优的策略选择为放任不管。

当 $\beta \in (0, 1 - H/PY)$ 时, 对于政府来说, 其最优的策略选择为监管。

当 $\alpha = \alpha^* = T_1/PY, \beta = \beta^* = 1 - H/PY$ 时, 政府与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博弈实现了均衡。

表 3 政府监管不承担下的政府与企业
博弈利益矩阵

政府	企业	
	治理 β	不治理 $1 - \beta$
监管 α	$-H, -T_1$	$PY - H, -PY$
不监管 $1 - \alpha$	$0, -T_1$	$0, 0$

通常来讲, 如果企业选择进行污染治理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越低, 那么一旦不治理被发现后, 其所受到的罚款就会越多, 政府进行监管的效率就会越高, 企业选择治理的概率就越大; 对

于政府来说, 如果政府选择监管所需花费的成本越高, 企业选择不治理的概率就越大。由此可以得出, 激励企业选择治理污染的策略,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协助企业减少其进行污染治理的成本; 提高污染惩罚的金额; 减少监管成本; 提升监管效率。

(2) 基于当地政府监管担责的利益博弈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当地政府选择监管但监管不力并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形。如果监管不力需要接受相应惩罚的话, 那么治理的成本会发生部分转移, 即从企业转移到当地政府, 若当地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成本是 T_1 , 那么二者之间的博弈利益矩阵会发生变化, 如表 4 所示。基于此所得纳什均衡为:

$$\alpha^{**} = T_1/P(Y + T_1), \beta^{**} = 1 - H/P(Y + T_1)$$

通过比较可得, $\alpha^{**} < \alpha, \beta^{**} > \beta^*$ 。基于此可以得出, 如果政府监管不力时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会使得企业进行治理的概率增大。从另一方面来看, 政府采取监管策略的概率也会相应变大, 从 $[\alpha^*, 1]$ 变为 $[\alpha^{**}, 1]$, 此时如果企业不采取治理污染被发现的概率将会变大, 这样会促使企业选择排污治理。

表 4 政府监管不力担责下的政府与企业
博弈利益矩阵

政府	企业	
	治理 β	不治理 $1 - \beta$
监管 α	$-H, -T_1$	$PY - H - (1 - P)T_1, -P(T_1 + Y)$
不监管 $1 - \alpha$	$0, -T_1$	$-T_1, 0$

三、基于夏普利值法的环境协同治理利益分配模型

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我们发现, 不同的主体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选择自己所采取的策略, 针对所选的策略获得与之相对应的收益, 其所承担的责任越大, 承受的风险也越

高,参与利益分配时应得的利益也越多。对于政府、企业或公众来说,承受的风险会影响其工作的努力程度,进而决定了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获得的总收益。通过夏普利值法(Shapely)计算出不同主体承担费用的比例,从而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其相互合作协同形成统一的系统,既可实现不同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又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效率,从而达到实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目标。

夏普利值法是由 L. S. Shapely 创建的用数学来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合作时对策选择的一种方法。具体可描述为:假设存在一个集合 $I = \{1, 2, 3, \Lambda\}$, 针对集合 I 的每一个子集 S 都存在着函数,且 $V(s)$ 符合下列条件: $V(\phi) = 0$ 且 $V(S_1 \cup S_2) \geq V(s_1) + V(s_2)$; $S_1 \cap S_2 = \phi, S_1 \subseteq I, S_2 \subseteq I$ 。此时 $[I, V]$ 是第 i 个主体的合作间博弈, S 是所选择的对策, $V(s)$ 是所选对策的特征函数, V_i 代表当某个成员 i 不参与时他能够从社会总收益中获得的利益, $\phi_i[V]$ 是合作博弈 $[i, V]$ 的向量函数,表示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中第 i 个主体获得的分配函数表达形式。基于此,每个主体所能够分得的利益为 $\phi_i[V] = \sum \frac{(|s| - 1)!(n - |s|)!}{n!} [V(s) - V(s - i)]$, 此即为夏普利值的计算公式。其中, s_i 代表第 i 个主体在总集合 I 中的子集,其所包含的不同元素的个数为 $|s|$,整体所能得到的利益用 $V(s)$ 表示; $V(s - i)$ 代表总收益中减去主体 i 后的利益; $V(s) - V(s - i)$ 代表第 i 个主体在社会总利益值中的贡献值; $\frac{(|s| - 1)!(n - |s|)!}{n!}$ 代表其因子的加权值。

我们在衡量不同主体和社会总体的收益时,由于变量具有主观性,很多时候无法直接进行衡量,且人的主观意识在不断改变,基于此,采用函数成本法计算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值。在

这里,将当地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对环境的跨区域协同治理看成三个不同的分项目来进行衡量。在这三个分项目中,当地政府负责工程项目 A ,企业负责工程项目 B ,社会环境保护组织负责工程项目 C 。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一方面可以选择合作的策略,另一面可以选择自己独自完成的策略。各主体在相互协作进行环境保护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如表 5 所示。

表 5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不同主体

相互合作的成本	亿元
不同主体合作的集合	成本
当地政府	450
敏感企业	400
社会公众	150
当地政府 + 敏感企业	800
当地政府 + 社会公众	540
敏感企业 + 社会公众	480
当地政府 + 敏感企业 + 社会公众	870

由 Shapely 值法计算公式可计算出当地政府、敏感企业和环保组织协作进行环境治理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分别为:

$$\begin{aligned} \phi_1[V] &= \frac{450}{3 \times 1} + \frac{(800 - 400) + (540 - 150)}{3 \times 2} \\ &+ \frac{(870 - 480)}{3 \times 1} = 411.7(\text{亿}) \\ \phi_2[V] &= \frac{400}{3 \times 1} + \frac{(800 - 400) + (480 - 150)}{3 \times 2} \\ &+ \frac{(870 - 540)}{3 \times 1} = 365(\text{亿}) \\ \phi_3[V] &= \frac{150}{3 \times 1} + \frac{(540 - 450) + (480 - 400)}{3 \times 2} \\ &+ \frac{(870 - 800)}{3 \times 1} = 101.6(\text{亿}) \end{aligned}$$

根据上式可得出不同主体分别承担的费用比例为:

$$\begin{aligned} \text{当地政府: } & \frac{\phi_1[v]}{\phi_1[v] + \phi_2[v] + \phi_3[v]} = \\ & \frac{411.7}{411.7 + 365 + 101.6} = 46.87\% \end{aligned}$$

$$\text{敏感企业: } \frac{\varphi_2[v]}{\varphi_1[v] + \varphi_2[v] + \varphi_3[v]} = \frac{365}{411.7 + 365 + 101.6} = 41.56\%$$

$$\text{环保组织: } \frac{\varphi_3[v]}{\varphi_1[v] + \varphi_2[v] + \varphi_3[v]} = \frac{101.6}{411.7 + 365 + 101.6} = 11.57\%$$

各主体在进行最后利益分配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这符合付出与收益成正比的一般规律,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分配效率,让区域生态环境各治理主体满意。

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措施设计

多元协同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种理论建构,既需要刚性制度的保驾护航,更需要系统的机制设计来加以保障,科学地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协作性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前文的博弈分析与利益分配,笔者认为多元协同治理的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信息共享主体互信机制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不同主体在进行利益博弈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选择的策略最终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一部分人会选择“搭便车”享受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但并不付出成本参与环境治理。所以,应利用网络环境,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公布环境质量检查情况与标准、被问责的主体,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不同主体之间信息透明、公开。此外,应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政策体系,激发各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2. 建立平等开放的参与执行机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保证过程的公平公开并进行有效监

督,包括加强社会大众的监督、拓宽不同主体选择参与的渠道、培养公众“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思想意识。首先,应形成各主体平等参与的完善的监督体系,为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协同治理的高效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其次,应加强环境公共平台建设,更好地连接政府与公众,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选择不妥或错误,拓宽不同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最后,应促进主体由被动治理转向主动治理,树立代内与代际之间公平的理念,加强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3. 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与监管机制

认知的差异性和利益博弈的短期性,使得政府在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上,特别是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产生不协调的内耗行为。为提高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建立绿色的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加强污染治理与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监管。

4. 建立多维长效的利益共享补偿机制

应针对不同主体,构建利益共享的补偿机制,解决针对各主体如何补偿、怎样补偿、拿什么补偿的问题。一方面,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特点,设置具有弹性的利益补偿参照标准,明确获得补偿的具体条件,从而实现补偿资金的最大化、最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协调解决在利益共享补偿中出现的问题,保障补偿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于一体的利益协同体系,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实效。此外,应针对企业进行税费改革,如增设环境税、资源税等,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环境治理,从根本上保障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实施,以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1.
- [2] 于水,李波.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J].中州学刊,2016(4):80.
- [3] 司林波,聂晓云,孟卫东.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成因及路径选择[J].生态经济,2018(1):171.
- [4] 杨华峰.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协同治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9.
- [5] 黄德林,陈宏波,李晓琼.协同治理:创新节能减排参与机制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2(1):30.
- [6] 李叔君,李明华.社区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机制探析——以浙江安吉县为例[J].前沿,2011(8):188.
- [7] WESTERINK J, JONENEEL R, POLMAN N, et 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to deliver spatially coordinated agri-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 Land Use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Land Use, 2018(67):176.
- [8] CARROLL, ARCHIE B. A commentary and an overview of key question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J]. Business & Society, 2000(4):466.
- [9] 乔花云,司林波,彭建交,等.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生态经济,2017(6):151.
- [10] 唐任伍,李澄.元治理视域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18.
- [11] 王品,周凌一.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基于体制机制视角的探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7):68.



引用格式:徐明霞. 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43-48.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43-06

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erprise behavior, market power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essing perspective

徐明霞

XU Mingxia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创新时代背景下,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议题。从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是:制造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正是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的过程;制造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形成的市场力量,正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是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来实现。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强化其创新能力。

关键词:

企业行为;
市场力量;
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JJ086)

[作者简介]徐明霞(1981—),女,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创新能力已是新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据产业经济学的“S—C—P”分析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范式的简称,其中,S指结构,C指行为,P指绩效),企业的战略行为可以改变行业结构,提升自身的市场力量,进而提升其创新能力。近年来,产业经济学领域围绕着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多,以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为热点问题,主要研究了制造产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与市场力量、创新能力的关系^[1],以及制造产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与市场力量、创新能力的关系^[2]。在以知识产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国家战略引导下,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被重视,知识产权是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对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S—C—P”是产业经济学和战略管理领域用来解释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绩效关系的理论范式。本文拟运用“S—C—P”范式,从知识产权过程化的新视角来诠释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实践上指导制造企业通过自身战略行为的选择提升其创新能力。

一、文献综述

1. 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

“知识产权”的概念最先是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于17世纪中叶提出的。“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英文原意是“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也曾被翻译为“智力成果权”,意思是该权利是由创造性智力活动形成的、受法律保护智力资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1967年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将知识产权归结为8种权利。后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将知识产权的范畴进一步细化,前者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

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商业秘密;后者将知识产权分为创作性成果权与识别性标记权两大类。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了所有的智力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主要是指三类智力成果,即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

理论界对知识产权的学术性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多是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界定,直接运用知识产权的概念,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在进行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时,须将知识产权进行分类,界定知识产权的范围^[3]。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界定有四种观点^[4],分别是知识产权类型化、知识产权过程化、知识产权层次化和知识产权要素化,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知识产权过程化,学者们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维度^[5-6]。

知识产权过程化的研究,是以过程化的视角对知识产权进行研究: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护、运营,对企业创新、创业、成长的影响。其一,用过程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例如,朱清平^[7]认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需要围绕知识产权的产生、运用、维护展开,包括知识产权成果的创造、权利的取得、成果的转化与利用、保护与维权以及行政管理等。其二,用过程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学者们认为,知识产权能力包括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等^[8],可分为获取能力、维护能力和运营能力三个维度^[4]。其三,用过程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例如,池仁勇等^[9]、刘婧等^[10]研究了知识产权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2.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1) 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市

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根据《产业组织手册》第一卷第四章中的界定,纵向一体化行为指企业具有两种单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两个生产过程属于上下游关系,当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时,可以称之为纵向一体化行为:一是上游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被用作下游生产过程部分或全部中间投入品;二是下游生产过程的某种投入的全部需要量由上游生产过程全部或部分产出构成。纵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垄断势力,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市场力量^[11]。制造产业的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的实现方式有自建和并购两种途径。

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在形成自身市场力量的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制造产业内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的效益,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例如,张伟等^[2]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效率,使企业提升研发投入水平,有利于创新产出;周霄雪^[12]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又有利于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2) 制造产业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横向一体化行为是指同类企业之间的合并。横向一体化行为泛指同一产业内或行业内企业间的并购行为,或者是产品在同一市场的企业间的并购行为^[13]。企业实施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提高企业所在产业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市场力量。战略管理者认为,横向一体化行为能够使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资源,增强企业对市场和产业链上下游的控制力,形成市场力量。

制造产业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形成市场力量,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约瑟夫

·熊彼特曾提出,市场力量形成的垄断有利于创新,垄断性大企业可以承担起创新的高额研发费用,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14]。后来经济学家基于熊彼特的观点提出了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假说,并有学者证实了横向一体化行为的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间具有正相关关系^[15]。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如图1所示,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形成市场力量,而市场力量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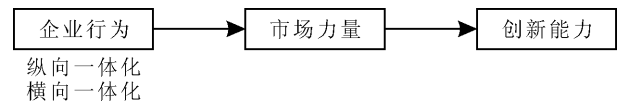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二、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知识产权过程化即知识产权获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管理的过程。从知识产权过程化的视角来看,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的过程,因为企业通过自建或并购可直接运用或获取知识产权。制造产业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形成市场力量,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垄断力量,因为知识产权本身也具有垄断性。制造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是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从知识产权过程化的视角分析,可得出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如图2所示。企业为了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如研发技术、技术专利、品牌、制造工艺等,会通过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行为(自建或并购)来实现;在知识产权获取后和运用的过程中,企业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并通过产权保护的法律手段增强自身

的市场力量;最后,企业在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会激发更多的知识产权创造,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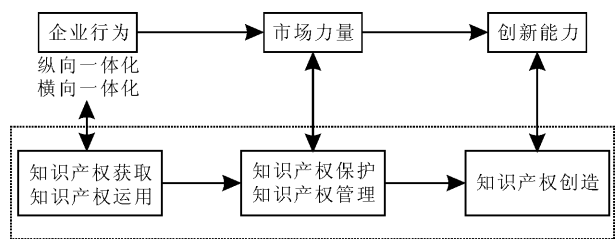


图2 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关系

1.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的关系

其一,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产业经济学认为,制造产业的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获得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资产^[16]。知识产权是企业的重要竞争性战略资产,围绕制造业的产业链环节,制造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获得上游研发环节的各种资产和产权,如研发专利、发明专利、设计专利等知识产权,也可以获取中间制造环节的核心制造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获取下游营销服务环节的服务专利、品牌产权、营销渠道等知识产权。从知识产权运用来分析,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可以使已有的知识产权在生产领域、销售领域实现共享,以延伸知识产权的使用广度和深度。

其二,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实现。战略管理者认为,企业横、纵向一体化行为的主要动机表现为战略资产的获取,尤其是知识资产的获取^[17]。为了获取重要的知识资产,特别是产业链上的知识产权,制造企业会通过并购的模式弥补自身的知识产权短板。为了实现转型升级和获取较高的产品附加值,

中国制造产业内的OEM企业多数是通过并购上游企业的研发专利、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等,或者是并购下游企业的服务专利、品牌产权、营销渠道等,以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力的。此外,制造产业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也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实现对其知识产权的运用。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产权获取与运用的关系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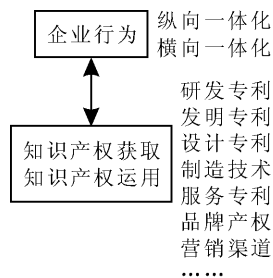


图3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产权获取与运用的关系

2.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

其一,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有利于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制造产业的企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直接表现为市场地位的提高或是形成市场垄断。制造企业的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形成的市场地位和形成市场垄断,使得自身的知识产权纳入企业的控制范围之内,在企业内部的市场范围和产业链范围内无障碍流动使用,形成组织边界内的强有力保护^[11],构成了与法律上知识产权保护相呼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当企业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时,不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形成保护,还可以更好地通过内部机制进行知识产权评估、交易等管理。

其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有利于巩固自身的市场力量。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属于企业对重要竞争性资源的运用,能够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高企业

的市场地位、形成市场垄断。这是因为,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有利于巩固企业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中涉及的产权要素投入、产权价值和产权交易带来的利润,也有利于巩固企业的市场力量。企业可以将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要素投入到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利用知识产权的资本属性获取垄断利润^[18],提高企业的市场力量。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属于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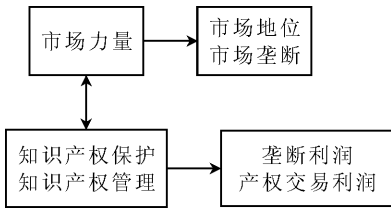


图4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
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

3.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与 知识产权创造的关系

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创造密切相关^[19],创新能力是知识产权创造的前提,而知识产权创造保障了企业的创新收益,两者相辅相成。

其一,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制造产业的企业创新能力越强,意味着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较高,创新资源的投入可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制造企业在研发设计环节的投入越高,其产品研发和设计能力越强,产生的研发专利和专利设计就会越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创新投入越高,其产品创新能力越强,产生的产品专利和技术专利就会越多;在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的创新投入较高,其市场创新能力越强,产生的品牌商标和服务专利就会越多。以上所有的知识产权产出都是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

其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强化其创新能力。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越强,意味着其创新产出越多,代表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知识产权创造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创造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当制造产业的企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如并购)提高其市场力量时,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可以将产出的知识产权在企业内部跨组织运用,如将设计专利、研发专利、技术专利、服务专利、品牌商标等应用于不同组织(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改进其设计、生产运营、营销过程,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

三、结论与启示

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资源,对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分析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来实现。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有利于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反过来,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也有利于巩固自身的市场力量。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强化其创新能力。

在推动制造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应以知识产权为抓手,从知识产权获取、运用、保护和管理着手,鼓励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以企业的市场力量形成对知识产权的市场保护,引导企业对知识产权进行科学管理,使制造产业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

管理的全过程中获取高额利润,并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其创新能力。而对于制造产业企业来说,应打破自主创造知识产权的狭隘思维,在开放式创新的战略导向下,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从外部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以自身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垄断获得来自知识产权保护的垄断利润和来自知识产权交易管理的产权利润。此外,制造产业企业还应正确认识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创造间的关系,以创新能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以知识产权创造保障创新收益。

参考文献:

- [1] 欧结敏. 横向一体化、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的关系[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
- [2] 张伟,于良春. 企业产权结构、纵向一体化与创新绩效[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9):53.
- [3] 肖延高. 基于竞争优势的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研究[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9.
- [4] 王重鸣,薛元昊. 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基于高技术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8.
- [5] 向征,张晓辛,顾晓燕. 企业知识产权动态能力提升模式选择[J]. 经济问题,2015(12):68.
- [6] 池仁勇,潘李鹏. 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路径——基于战略导向视角[J]. 科研管理,2017(8):119.
- [7] 朱清平. 知识产权管理学科初探[J]. 发明与创新,2003(4):36.
- [8] 李伟,谢雪凯. 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内涵和外延[J]. 科技管理研究,2010(21):156.
- [9] 池仁勇,潘李鹏. 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内外影响因素与企业成长——内力驱动,还是外部推进? [J]. 科学学研究,2016(1):81.
- [10] 刘婧,占绍文,李治. 知识产权能力、外部知识产权保护与动漫企业创新效率[J]. 软科学,2017(9):41.
- [11] WILLIAMSON O. 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5(1):70.
- [12] 周霄雪. 纵向一体化对下游产品质量创新激励的影响研究[D]. 沈阳:东北大学,2012.
- [13] 王东杰. 近年来国内钢铁行业横向并购的态势评析[J]. 学术论坛,2008(10):117.
- [14]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5] 周任重. 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横向一体化、技术溢出与创新[J]. 产经评论,2018(3):89.
- [16] GRANT,ROBERT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S2):109.
- [17] DENG P.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9(1):74.
- [18] 徐明霞. 知识产权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驱动:基于政治经济学属性特征的诠释[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6):58.
- [19] SCHERER F M. Size of firm, oligopoly, a research;a comment[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65(2):256.

引用格式:杨位留,杨金磊. 产权性质、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成本黏性的调节效应检验[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49-57.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49-09



产权性质、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基于成本黏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ownership, agency costs and firm performance

—Adjustment effect test based on cost stickiness

杨位留, 杨金磊

YANG Weiliu, YANG Jinlei

枣庄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基于沪深两市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代理成本、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按照产权性质,进一步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民营企业中,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相对薄弱,而治理机制的健全能够减少代理问题,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可弱化成本黏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以最终提升企业绩效。

关键词:

产权性质;
代理成本;
企业绩效;
成本黏性

[收稿日期]2018-12-12

[基金项目]枣庄市社科联应用研究课题(LX2018021)

[作者简介]杨位留(1981—),男,山东省枣庄市人,枣庄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杨金磊(1985—),男,山东省枣庄市人,枣庄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

M. C. Jensen 等^[1]提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会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订立契约,而在执行契约、监督和约束经营者行为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加大管理成本,学术界称之为代理成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是现代公司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代理问题的负面效应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双方追求的效用函数不同,代理问题的根源始终存在,代理成本难以消除。而代理问题常常伴随着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机会主义和高管超额消费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代理问题往往是管理者通过支配企业的资源而产生的,管理者普遍具有“帝国构建”的倾向,其自利行为主要通过掌控企业资源来实现。当企业的销售量上升时,管理者抱有乐观心态,会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管理费用,提升自身的薪酬水平,使企业成本费用迅速上升;而当销售量下降时,管理者会尽量维持既有的薪酬水平和掌控资源的水平,减少业务量下降对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成本费用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M. C. Anderson 等^[2]将这种在销售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销售量下降时成本下降的幅度的现象称为“成本黏性”,而成本黏性的存在对企业业绩会产生一定影响。代理问题和成本黏性都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产权属性会影响到代理成本。例如,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代理成本相对较高;国有企业资源获取受到政府的干预,影响成本调整的速度,对成本黏性产生影响。因此,以产权性质进一步分析代理成本、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可行且必要的。

鉴于此,本文拟以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具有成本黏性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代理成本、成本黏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

关系,揭示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并区分产权性质,以揭示成本黏性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效用,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成本黏性的经济后果和代理问题的分类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通过其拥有的控制权,利用对资产的占用、在职消费、非最优投资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等方式谋取私利,这些行为与股东的目标相背离,所产生的成本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以成本和费用的形式出现,最后也会转嫁给股东,使股东的财富遭到损失,对企业的整体绩效带来伤害,给企业的价值带来不利影响。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可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3-5]。管理费用率可以用于衡量管理者索取超额薪酬、不当在职消费等自利行为的程度,管理费用率越高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总资产周转率可用于衡量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有效利用资产的程度,反映其经营效率和勤勉程度,总资产周转率越高,代理成本越低。据此,我们可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1a:管理费用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1b:总资产周转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

M. C. Anderson 等^[2]将成本黏性定义为企业在销售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销售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的现象。由于管理者往往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掌控企业资源,企业出现成本黏性时并不一定是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真实反映,有时甚至会出现逆向选择。

成本黏性的存在无论是在销售量上升时成本的大幅上升,还是在销售量下降时成本的小幅度减少,都会对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孙铮等^[6]研究发现,成本黏性短期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则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朱乃平等^[7]认为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成本黏性太小或太大都会造成长期绩效的降低。王贝^[8]研究发现,成本黏性与企业业绩是倒U型的关系,成本黏性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绩效的降低。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成本黏性越大,企业绩效越低。

3. 代理成本、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

代理理论认为,所有者和管理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管理者往往会有意调整成本,利益的追逐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成本费用增加,而成本费用增加会在企业销售量增加时变本加厉。当销售量下降时管理者为了保留自己掌控的资源,成本费用削减得相对较少,甚至会保留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由此产生成本黏性,进而导致企业绩效变差。因此,代理成本、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代理成本越大,成本黏性越高,企业绩效就越差。谢获宝等^[9]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和企业特征等因素后,发现代理成本会加重成本黏性的程度。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代理问题普遍存在,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而成本黏性的存在会加深其影响程度。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具有调节作用。

4. 产权性质与代理成本、成本黏性

不同的产权性质对代理成本和成本黏性的影响不同。罗必良^[10]认为,公有产权的代理层

次多、代理成本大,产权不同衍生出的经济组织不同,进而采取的经济行为不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的差异。李寿喜^[11]认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最大,代理成本最高,国有产权企业的代理成本普遍高于混和产权企业。万寿义等^[12]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存在着成本黏性,且国有上市公司的成本黏性更大。龚启辉等^[13]认为,产权性质是企业营运的基本外部环境,会对成本黏性产生重大影响:非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其成本黏性的影响较小;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严重,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其成本黏性有显著影响。王棣华等^[14]认为,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成本黏性有差异,产权性质对成本黏性有显著影响。段然等^[15]认为,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成本黏性会更加严重。综上所述,产权性质不同,代理成本的表现不同,成本黏性的程度也不相同,区分不同的产权性质,对代理成本、成本黏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具有成本黏性(不包含反黏性)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据初步选定后进行了如下筛选:一是删除了金融保险类的公司;二是删除了被特殊处理的ST、PT、*ST公司;三是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公司;四是剔除了异常值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获取3231个样本,其中国有企业1295家,民营企业1936家。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RESSET)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利用SPSS 24.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2. 变量释义

(1) 被解释变量

当前,国内外文献中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主要有基于市场价值的托宾 Q 值和基于账面价值的资产净利率 (ROA)、权益净利率 (ROE)、每股收益 (EPS) 等。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比较成熟,国外学者多采用托宾 Q 值。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使用托宾 Q 值的条件尚不充分,权益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可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收益,加之成本黏性很大程度上与管理者对资产利用程度有关,并影响资产的收益,因此,本文选取资产净利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

(2) 解释变量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代理成本的计量方式,参考 J. S. Ang 等^[3-4]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 (EXPENSE) 和总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管理费用率的高低能够衡量管理者索取超额薪酬、不当开支、在职消费等自利行为的程度,总资产周转率能够揭示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有效利用资产的程度,反映其经营效率和勤勉程度。管理费用率与代理成本是正相关,是正向指标;而总资产周转率与代理成本是负相关,是反向指标。

(3) 调节变量

成本黏性的度量目前主要有 ABJ 模型^[2]和 WEISS 模型^[16],前者主要用于证实成本黏

性的存在性,无法当作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而后者可以通过数据计算出企业成本黏性的数值。故本文采用 WEISS 模型计算成本黏性,具体如下:

$$STICKY_{i,t} = \log\left(\frac{\Delta COST}{\Delta SALE}\right)_{i,\tau} - \log\left(\frac{\Delta COST}{\Delta SALE}\right)_{i,\bar{\tau}},$$

$$\bar{\tau} \in \{t \cdots t - 3\}$$

其中,STICKY 表示成本黏性程度,ΔCOST 表示季度的营业成本变动额,ΔSALE 表示季度的营业收入变动额,i 表示第 i 家公司,t 表示第 t 年,τ 表示某年连续 4 个季度中业务量下降的最近一个季度,τ̄ 表示某年连续 4 个季度中业务量上升的最近一个季度。公式计算结果若为负数,说明企业具有成本黏性,数值越小,黏性越大;若为正数,说明具有反黏性,若为 0 表示成本模型是传统成本习性模型。本文选取计算结果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剔除具有反黏性的公司,并将具有成本黏性公司的成本黏性取绝对值,绝对值越大,其成本黏性越大。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公司规模、杠杆水平等影响企业绩效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借鉴 ABJ^[2]对于成本黏性的研究模型,引入资本密集度、员工密集度和经济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年度和行业的影响。变量名称与变量定义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名称与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	ROA	净利润/[(期初总资产额 + 期末总资产额)/2]
解释变量	管理费用率	EXP	管理费用/销售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	TURN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调节变量	成本黏性	STICKY	WEISS 模型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杠杆水平	LEV	资产负债率
	资本密集度	EMP	企业总资产/销售收入
	员工密集度	CAP	企业员工总数/销售收入
	经济增长率	GDP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年度控制变量	YEAR	控制年度的影响
	行业控制变量	IND	控制行业的影响

3. 研究模型

根据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5个模型,具体如下:

$$ROA_{i,t} = \beta_0 + \beta_1 EXP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MP_{i,t} + \beta_5 CAP_{i,t} + \beta_6 GDP_{i,t} + \Sigma YEAR + \Sigma IND + \varepsilon \quad (1)$$

$$ROA_{i,t} = \beta_0 + \beta_1 TURN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MP_{i,t} + \beta_5 CAP_{i,t} + \beta_6 GDP_{i,t} + \Sigma YEAR + \Sigma IND + \varepsilon \quad (2)$$

模型①和模型②主要是验证假设1:代理成本(不同的替代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ROA_{i,t} = \beta_0 + \beta_1 STICKY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LEV_{i,t} + \beta_4 EMP_{i,t} + \beta_5 CAP_{i,t} + \beta_6 GDP_{i,t} + \Sigma YEAR + \Sigma IND + \varepsilon \quad (3)$$

模型③主要是验证假设2: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ROA_{i,t} = \beta_0 + \beta_1 EXP_{i,t} + \beta_2 STICKY_{i,t} + \beta_3 TXP \times STICKY_{i,t} + \beta_4 SIZE_{i,t} + \beta_5 LEV_{i,t} + \beta_6 EMP_{i,t} + \beta_7 GAP_{i,t} + \beta_8 GDP_{i,t} + \Sigma YEAR + \Sigma IND + \varepsilon \quad (4)$$

$$ROA_{i,t} = \beta_0 + \beta_1 TURN_{i,t} + \beta_2 STICKY_{i,t} + \beta_3 TURN \times STICKY_{i,t} + \beta_4 SIZE_{i,t} + \beta_5 LEV_{i,t} + \beta_6 EMP_{i,t} + \beta_7 CAP_{i,t} + \beta_8 GDP_{i,t} + \Sigma YEAR + \Sigma IND + \varepsilon \quad (5)$$

模型④和模型⑤引入成本黏性与管理费用率交乘项和成本黏性与总资产周转率交乘项,主要是验证假设3: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和企

业绩效具有调节作用。

三、数据处理与假设检验

1. 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选定的3231个观测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样本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的统计性结果见表2。

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资产净利率(RO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与均值之间的差距较大,但均值都为正,表明样本公司的整体资产收益能力较好。从代理成本的两个替代变量看,管理费用率平均在10%左右,总资产周转率平均在0.6次,但极值之间的差异较大,表明不同公司的代理成本有较大差异。成本黏性(取绝对值后)平均值为0.57,中位数为0.325,表明样本公司的成本黏性普遍较高。

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以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资产净利率与管理费用率呈显著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正相关,假设1初步被证实;资产净利率与成本黏性呈显著负相关,假设2初步被证实;其余变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小于0.5,初步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ROA	3231	-9.397	0.598	0.033	0.033	0.179
EXP	3231	0.003	1.309	0.105	0.086	0.090
TURN	3231	0.051	2.823	0.610	0.506	0.417
STICKY	3231	0.002	4.246	0.570	0.325	0.690
SIZE	3231	17.813	27.321	22.049	21.899	1.300
LEV	3231	0.020	0.998	0.445	0.443	0.216
EMP	3231	0.327	29.781	2.726	2.132	2.282
CAP	3231	0.013	11.421	1.534	1.237	1.275
GDP	3231	0.067	0.095	0.076	0.073	0.009

3. 回归分析

(1)代理成本、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归分析

基于模型①②③,分别对管理费用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①)、总资产周转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②)与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③)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从模型①的回归结果看,企业绩效与管理费用率显著负相关,假设 H1a 得到验证:管理费用率越高,管理者索取超额薪酬、不当开支、在职消费等的机会越大,代理成本就越高,对企

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从模型②的回归结果看,总资产周转率在 10% 的水平上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总资产周转率越大,周转的次数越多,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管理者经营过程中勤勉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小,对企业的正向影响会越大,假设 H1b 得到支持。模型③验证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成本黏性在 1% 水平上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成本黏性越高,管理者自由调控的资源越多,其谋取私利和发生机会主义的概率就会越大,就会损害股东财富、减少企业绩效、降低企业价值,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3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ROA	EXP	TRUN	STICKY	SIZE	LEV	EMP	CAP	GDP
ROA	1								
EXP	-0.130***	1							
TURN	0.072***	-0.382***	1						
STICKY	-0.056***	0.135***	-0.120***	1					
SIZE	0.047***	-0.406***	0.051***	-0.040**	1				
LEV	-0.161***	-0.272***	0.106***	-0.056***	0.441***	1			
EMP	-0.080***	0.398***	-0.591***	0.135***	0.046***	-0.016	1		
CAP	-0.114***	0.468***	-0.239***	0.094***	-0.392***	-0.184***	0.136***	1	
GDP	0.026	-0.070***	0.105***	0.032*	-0.120***	0.012	-0.056***	0.034**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4 代理成本、成本黏性与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①ROA 值		模型②ROA 值		模型③ROA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EXP	-0.118	-5.236***				
TURN			0.043	1.83*		
STICKY					-0.048	-2.758***
SIZE	0.084	3.846***	0.117	5.546***	0.117	5.565***
LEV	-0.255	-12.88***	-0.247	-12.451***	-0.246	-12.448***
EMP	-0.048	-2.385**	-0.069	-3.135***	-0.084	-4.535***
CAP	-0.06	-2.949***	-0.09	-4.605***	-0.092	-4.805***
GDP	0.026	1.346	0.032	1.646*	0.036	1.897*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231		3231		3231
ADJ-R ²		0.068		0.062		0.063
F		14.19		12.759		13.013
D-W		2.011		2.000		2.006

(2) 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基于模型④,检验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并进一步以产权性质分类,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知,在全样本中,交乘项 $EXP \times STICKY$ 在1%的水平上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成本黏性在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为替代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以验证。以产权性质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进行进一步检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交乘项 $EXP \times STICKY$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中交乘项 $EXP \times STICKY$ 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从总体上来说,管理费用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不当开支、超额报酬等自利行为的程度,管理者拥有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大的权力,由于自利目标的存在,管理者利用权力扩大资源占有的可能性就越高,而成本费用存在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管理

者操纵起来易如反掌,成本费用的调整会因其自利行为产生黏性,黏性的出现会加重代理成本,产生了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管理层成本调整的机会不同。在国有企业中,法律法规、制度层面、管理流程、媒体的外部监督等相对严格,管理者成本调整、利益寻租的机会相对较小,这可能是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而民营企业中由于上述管制较为放松,成本调整相对容易,所以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

(3) 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基于模型⑤,验证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并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将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替换为总资产周转率,就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样本中,交乘项

表5 基于模型④的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与企业绩效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i>EXP</i>	-0.043	-1.837 *	-0.072	-2.156 **	-0.029	-0.93
<i>STICKY</i>	-0.022	-1.29	0.01	0.395	-0.033	-1.497
<i>EXP</i> × <i>STICKY</i>	-0.167	-9.178 ***	0.005	0.214	-0.183	-7.673 ***
<i>SIZE</i>	0.093	4.299 ***	0.253	8.679 ***	0.092	3.244 ***
<i>LEV</i>	-0.246	-12.526 ***	-0.523	-19.866 ***	-0.222	-8.769 ***
<i>EMP</i>	-0.054	-2.741 ***	-0.101	-3.432 ***	-0.067	-2.591 ***
<i>CAP</i>	-0.07	-3.5 ***	-0.047	-1.532	-0.072	-2.844 ***
<i>GDP</i>	0.027	1.413	0.087	3.228 ***	0.025	1.003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3231		1295		1936	
<i>ADJ-R</i> ²	0.093		0.277		0.094	
<i>F</i>	17.630		25.747		11.027	
<i>D-W</i>	2.091		1.905		2.114	

表6 基于模型⑤的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标准化系数	t 值
<i>TURN</i>	0.062	2.619***	0.095	2.947***	0.086	2.687***
<i>STICKY</i>	-0.035	-1.993**	0.01	0.408	-0.041	-1.781*
<i>TURN</i> × <i>STICKY</i>	0.075	4.204***	0	-0.007	0.117	4.944***
<i>SIZE</i>	0.116	5.547***	0.27	9.642***	0.113	4.168***
<i>LEV</i>	-0.248	-12.551***	-0.518	-19.88***	-0.23	-9***
<i>EMP</i>	-0.048	-2.171**	-0.083	-2.678***	-0.049	-1.686*
<i>CAP</i>	-0.084	-4.313***	-0.058	-2.079**	-0.082	-3.304***
<i>GDP</i>	0.033	1.716*	0.084	3.114***	0.035	1.398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3231		1295		1936	
<i>ADJ-R</i> ²	0.068		0.279		0.072	
<i>F</i>	12.819		26.038		8.529	
<i>D-W</i>	2.011		1.903		2.024	

TURN × *STICKY* 在 1% 的水平上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成本黏性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3 得以验证。按照产权性质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样本中交乘项 *TURN* × *STICKY* 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中交乘项 *EXP* × *STICKY* 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上来说,总资产周转率高意味着企业资源利用率高,企业为了实现生产能力的提升,需要重新获取新的资源,或者提升现有资产的运行时间,生产效率提升,代理成本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企业的绩效水平会提升。但是新资源的获取和运营成本的增加会导致成本的较快上升、成本黏性的出现,管理者掌控这些资源的空间增大,管理者谋取私利的机会增加,代理成本又会上升,进而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因此,成本黏性的存在调节了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资源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其成本黏性问题会更为严重^[17]。具体来说,成本黏性在国有企业中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之所以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多,设备等生产要素的获取相对繁琐,国有

企业的资源调整速度较慢,资源调整的成本较高,成本黏性弱化。非国有企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管理者能够迅速地调整资源,资源调整成本较小,成本黏性出现的几率会大大增强,因此对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也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管理者背离股东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无疑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这与本文研究结论得出的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一致的。成本黏性的产生与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密切相关,代理问题亦是成本黏性产生的重要因素。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找到成本黏性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成本黏性的经济后果,探究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成本黏性的存在对企业绩效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成本黏性在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调

节效应,成本黏性的存在加大了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和程度有所不同,成本黏性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表现不同,这可为不同产权性质下的企业强化公司治理、减少代理问题、提升企业绩效提供参考。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相对薄弱,而治理机制的健全能够减少代理问题,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可弱化成本黏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以最终提升企业绩效。

参考文献:

- [1]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4): 305.
- [2] ANDERSON M C, BANKER R D, JANAKIRAMAN S N. 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1): 47.
- [3] ANG J S, COLE R A, LIN J W.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1): 81.
- [4] 姜付秀, 黄磊, 张敏.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 [J]. *世界经济*, 2009(10): 46.
- [5] 安灵, 赵婷. 代理成本、高管薪酬粘性与预算松弛 [J]. *财会月刊*, 2018(20): 85.
- [6] 孙铮, 刘浩. 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4(12): 26.
- [7] 朱乃平, 刘志梧. 成本黏性及应对策略 [J]. *财务与会计*, 2009(6): 65.
- [8] 王贝. 成本黏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 [D].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15.
- [9] 谢获宝, 惠丽丽. 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成本黏性——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J]. *管理评论*, 2014(12): 142.
- [10] 罗必良. 公有产权: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 [J]. *经济体制改革*, 1996(5): 62.
- [11] 李寿喜. 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 [J]. *经济研究*, 2007(1): 102.
- [12] 万寿义, 徐圣男. 中国上市公司费用黏性行为的经验证据——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性质不同的视角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4): 79.
- [13] 龚启辉, 刘慧龙, 申慧慧. 地区要素市场发育、国有控股与成本和费用粘性 [J]. *中国会计评论*, 2010(4): 431.
- [14] 王棣华, 赵娜娜. 不同产权性质下成本黏性差异性分析与控制对策研究 [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5(11): 31.
- [15] 段然, 韦宇飞. 战略差异、产权性质与成本黏性 [J]. *财会通讯*, 2017(3): 26.
- [16] DAN W. Cost behavior and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4): 1441.
- [17] BALAKRISHNAN R, PETERSEN M J, SODERSTROM N S. Does capacity utilization affect the stickiness of cos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004(3): 283.



引用格式:黄天弘,栗想,何聪.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58-63,7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58-06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探析

Analysis of the repeated crossing of the textbook contents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the New Era

黄天弘¹, 栗想², 何聪¹

HUANG Tianhong, LI Xiang, HE Cong

-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于2005年实施以来,教育部在指导和组织教材编写上始终以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作为基本遵循,保证了教材的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学科不同、每门课程的特点不同,教材内容在不断更新增补中出现几门课程在相关问题上不同程度的重复交叉,甚至修订文字也一模一样。这一问题并不是教材编写者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因为它不仅涉及教材编写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教学目标的定位,还涉及教学方法。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教材编写各部门、各组织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二是科学分解与定位课程设置目标和教学目标;三是制定与实施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内容;
重复交叉

[收稿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5JDSZK098)

[作者简介]黄天弘(1968—),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教材俗称课本,它是教学的基础,即“一课之本”。编写一部好的教材是讲好该课程的关键。2005年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实施以来,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开展的课程建设和改革卓有成效,尤其是实现了教材统一编写和使用这一重大突破。中共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在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长期存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之间重复交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种教材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需求和期待。”^[1]这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努力方向,为课程改革拓展了空间。当前,教师和学生对现行使用的2018年修订版教材存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教材内容的重复交叉上。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八个统一”^[2],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提升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的影响力改革确定了基本原则与方法。本文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思想为理论指导,以高校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2015年和2018年两个修订版教材为考察对象,对比分析各课程2015年以来修订版教材内容重复交叉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期从理论上为教材修订提供对策建议。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高校本科生所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分别简称《基础》《原理》《纲要》《概论》)。该组教材编写严格根据“05方案”的明确规定来执行,确保了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思想性、政治性与政策性等特点,因此自2006年“05方案”实施以来所出版的教材,已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4年、2015年进行过多次修订,在坚持教材的科学性、规范性的基础上,保证了教材内容的与时俱进,适应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2018年,为充分体现中共十九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吸收一线师生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教材文风,对《基础》《原理》《纲要》《概论》等教材的章节结构、主要内容、思想观点、文字表达等进行了集中修订。

教材作为教育内容的载体,明确规定了高校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目的和要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为社会主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课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原因,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共同目的与要求。因此,从教材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大体经历了从自编教材到编写供不同类型院校使用的教材,再到教育部推荐示范教材并评选优秀教材,再到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教材几个阶段^[3]。统编教材的编写受中共中央统一领导。这是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不仅避免了教材编写低水平重复和错误解读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现象,重要的是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为教育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在教材内容编写方面,中共中央从社会主义国家办大学的本质特征出发,明确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必须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发挥教材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课之本的重要作用。同时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为原则,保证教材内容的实效性、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编写出“学生爱读,教师好用”的优质教材。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的原因与表现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学科是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二级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等内容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而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与主要经验的研究。由于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历史时期基本一致,又有相互一致的研究内容,这样一来,反映在课程教材的编写上其内容也是基本一致的^[4]。在课程特点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针对在校本科生进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教育课,围绕相同的教育目的,各门课程教材编写也围绕一个核心内容来展开基本观点,相同内容的重复出现也就在所难免^[3]。

下面以201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为例,通过对四门课程教材各章节条目的对比,来揭示其内容重复交叉的具体表现。

《概论》与《原理》的重复内容涉及《概论》第一、四、五章和《原理》绪论、第六、七章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方面。《纲要》第十章与《原理》第七章的内容相通,都是围绕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讨。《基础》与《纲要》的重复内容包括《基础》的绪论、第四章和《纲要》的第十章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全面”问题,但认识角度不同:前者是从道德建设的要求出发,后者是从历史和社会变迁出发。《概论》第八章中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基础》绪论中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七章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内容重复。

《概论》和《纲要》的重复内容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包括的章节和问题最多。如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内容,《纲要》在第十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二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的第二个大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五节“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第一个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了历史叙述,第二、三个大问题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实践”都包含有“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容。

在同一门课程中也存在着内容重复交叉的现象。例如,《概论》的第六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第三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中的三个问题,即“‘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第二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的第一、第二个大问题“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第十一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的第四节“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以及第十二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的第三节“全面从严治党”等,内容上都有重复。

从上述四门课程之间部分内容重复交叉的对比来看,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教材的横向贯通来看均存在许多内容重复的现象。例如,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各教材中都有充分体现。

其二,重复内容的涉及面较广,涵盖了四门课程的多个章节。例如,《概论》和《纲要》有七章重复,《原理》与《概论》有六章重复,《基础》与《纲要》、《概论》与《基础》也都各有三章重复,《纲要》与《原理》有一章内容重复。除《基础》与《原理》在内容上没有重复外,《概论》和《纲要》每一门课程教材增补的内容同样出现或重复在其他课程教材内容中,《原理》和《基础》又分别与《概论》和《纲要》的部分内容重复。

其三,相关内容的同层次重复,即相同问题在内容阐述的深度上属于同一层次。依据课程设置,四门课程分两年或三年修完,但相同内容

在不同学习阶段出现时,内容的阐述深度并未随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而递增,相反它们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并不大,这样,当学生再次读到语言表述水平不变的教材时,学习兴趣或探索意愿会大打折扣^[5]。

作为统编教材,四门课程内容之间不同程度的重复,给教学带来了不便。师生们有的认为教材枯燥乏味,有的抱怨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有的指出缺乏学理性,更有不少教师质疑教材编写组专家们的能力。不过,这也为师生追求教材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提供了探讨的空间。

对比2018年修订版教材,四门课程之间部分内容重复交叉的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通观四门课程教材章节条目的变化,如《纲要》2015年修订版原来第十章的内容独立成2018年修订版新增加的第十一章内容中的一部分,《概论》2018年修订版按时间顺序排列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内容上与《纲要》2015年修订版相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部分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充。2015年修订版的《概论》第一章内容在2018年修订版中被删除,减少了与《原理》2018年修订版导论部分的相通内容。2015年修订版《纲要》《原理》《基础》各课程间重复相通的内容因章节条目的调整重复交叉的频率明显降低,教材内容在可读性方面呈现出的课程教学特点,提升了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力,遵循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应该说,中宣部、教育部2018年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教材进行的修订,在改进教材重复内容的涉及面、相通内容的同层次重复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与探索。

三、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来说,“把教材编写好”应在提升

教材内容的解释力或影响力上下功夫。但是,上述问题不是教材编写者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因为,一方面,它涉及教材编写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教学目标的定位;另一方面,它涉及教学方法。因此,解决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立教材编写各部门、各组织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

其一,应坚持中宣部与教育部对教材编写工作的组织与领导。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历来隶属中宣部与教育部领导,由教育部社科司与基教司负责具体实施。为保证教材质量,中宣部、教育部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门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负责教材编写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又组建了由多方面专家组成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组,负责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统一编写。为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200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出版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未经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组织编写、出版发行各种名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使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有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其二,应建立师生双向互动的交流沟通机制。教师与学生对教材的评价最直接、最有发言权。长期以来,中宣部和教育部向一线教师与学生征求意见和建议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制度和机构,致使基层教师和学生的建议意见难以及时在教材修订中得到反映,上下沟通不畅。因此,有必要建立双向互动的交流沟通机制,组织专人和机构定期听取

和整理一线教师和学生在使用教材过程中的看法与建议。相关部门应及时对教师和学生的看法和建议进行研究,并下达反馈整改意见。建立听取、整理、研究、反馈、整改整套机制,畅通上下双向的交流,在保证教材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提升思政教材的亲合力和针对性,最终提升教学质量。

2. 科学分解与定位课程设置目标和教学目标

从教材的使用上来看,2018年修订版教材在编写上存在着课程设置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纲要》和《概论》在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前者是大二的课程,后者是大三的课程,但这两门课程的理论内容重复、时间跨度相同,课程内容和语言表述的层次性不分明,影响了教与学的开展。同样,《基础》与《原理》也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根据课程设置理论,科学分解四门课的课程内容,并以此来明确定位教学目标,可以作为解决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交叉问题的一种选择。

依据课程设置理论,课程设置应规定课程的类型与门类,及在不同学习时段课程门类的先后顺序和学时分配,并规定各门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与要求。合理的课程设置包括合理的课程结构和合理的课程内容两方面。前者是指课程开设合理与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合理;后者是指遵循知识论规律的要求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并且能够反映学科的主要知识、主要方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前沿。

从四门课程教材内容的重复交叉与表达方式这两个薄弱环节看,科学分解课程内容是关键,而区分课程内容的层次性是当务之急。应按照合理的课程开设先后顺序,将各门课程相互重复的内容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分层次地进行合理设置,也就是说,应根据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不断增加前沿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应以更多的学术

性语言替代文件性语言,从提高学术性的角度去改进教材内容。只有当各门课程内容之间衔接有序、语言表达符合不同学习阶段教学要求时,学生才能通过课程的学习与训练,在获取新知的同时其政治认知能力也得到增强。

3. 制定与实施科学的思想政理论课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在无法选用非统编教材的情况下,教师应以统编教材为蓝本,增强课程资源占有意识,加强对教材的研究与拓展,主动实现从“教学生教材”向“用教材教学生”转变,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6]。制定与实施科学的教学方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课前集体研讨教材。讲授上述四门课程的教师在授课前应认真研讨教材间相互重复的内容,做到各门课程间的有效沟通。首先,各门课程授课教师应汇总相关的重复内容,召集专兼职教师,开展集体备课,使承担课程教师把握好各课程教材重复内容;其次,应按照重复内容的侧重点,分别进行归类划分,由不同教研室承担相应内容的讲解,其他教研室教师在教学中如遇到这类问题时可略讲、少讲甚至不讲,如果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应作解答或通过回顾与梳理的方法对相关重复内容进行解释。

其二,明确四门课程讲授的不同角度与方法。从课程内容来看,《原理》的理论性较强,《概论》有史有论,《纲要》以史为鉴,《基础》是知识普及,各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在讲授时应采取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地依从各门课程的特点开展课堂教学,要么理论概念枯燥乏味,无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要么历史故事虽有趣学生也喜爱,却达不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深度。为避免重复,教师在实际授课时大多采用夹叙夹

议的方法进行教学,但结果是相互重复难以避免。所以,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应就这些课程内容的具体讲授角度、讲授方法形成大致统一的意见,这样,一方面可使自己对所授课程的讲授方法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另一方面又可使其他教师对与自己所授内容重复的地方如何取舍、如何突出了然于心^[7]。这样,既可体现出所教课程的内容特点,又可兼顾相同内容的统一性。

其三,探索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的研究性教学方法。当前,对现有课程教材内容进行改革,应脱离单纯的知识体系展现的拘囿,根据教材内容存在的薄弱点,将知识内容转化为有利于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愿望。研究性教学是目前我国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运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改变传统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重构,即实现教学活动由原来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向学生和教师一起发现知识的教学过程转变,教师利用场景、团队合作、信息交流等学习要素,引导学生进入课堂或课后基于研究的独立学习活动,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达到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目的。研究性教学能够弥补教材编写在体例上问题意识不突出的弱点,在内容上凸显学科前沿所取得的新成果,不仅可在形态上加大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研究的成分,也可使教材内容重复交叉的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引用格式:赵志伟. 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64-70.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64-07

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 perform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赵志伟^{1,2}

ZHAO Zhiwei

- 1.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 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思政工作绩效与人才培养质量。研究发现:(1)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具有较大的直接促进作用;(2)乐观可通过直接作用于坚韧性和自我效能而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作用;(3)坚韧性对工作绩效可能产生直接与间接的正向作用。因此,以心理资本改善为突破口,通过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和坚韧性品质,加强心理资本诸要素间的联结度,可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关键词:
心理资本;
工作绩效;
结构方程模型

[收稿日期]2019-03-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XW03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资助计划项目(2017-ZZJH-028)

[作者简介]赵志伟(1984—),男,南阳市方城县人,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and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既可被视为个体在工作、学习、生活等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也可被视为一种可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的动态个体资源,其有利于组织和个体保持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并会对组织和个体绩效产生影响。^[1]心理资本与高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高校思政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予以关注的重点议题。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角度出发,探析心理资本对高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效应,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有不少教育界学者十分认可心理资本的价值意义,并尝试对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进行研究。梳理这些学者对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可被视为高校教师在其职业成长过程中持有和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教师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其自身发展离不开心理资本的支撑。高校思政教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引领者和基层党建的坚定推动者,其心理资本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思政工作绩效与人才培养质量。鉴于此,本文拟以高校思政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改善心理资本的角度探究工作绩效的提升路径,以期为提高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提供思路。

一、研究假设

1. 心理资本

自“心理资本”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心理资本的含义、内容结构和影响因素作了许多分析与阐述。有学者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特质;也有学者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心理状态。关于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有学者指出,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包括控制点和自尊两个维度(简称“二维度说”);也有学者

认为,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维度(简称“四维度说”)。笔者认为,“二维度说”与“四维度说”并无对错之分,只是理论视角不同。“自我效能”属于拥有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任务的自信,其与乐观、坚韧性均属于心理态度这一范畴,而“希望”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心理愿景。对于高校思政教师来说,自我效能、乐观与坚韧性属于常见的心理资本。基于此,本文将自我效能、乐观、坚韧性这三个方面视为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的主要内容。自我效能一般是指个体有信心通过努力来实现目标与获得成功。“乐观”一般与事件的归因有关,具体表现为将积极事件归因于自身的普遍原因,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情境因素。“坚韧性”一般与对挫折和问题的应对存在一定的关系,是个体在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努力坚持,通过采取相应的方法或方式使好的局面很快恢复,或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2]

2. 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始终是组织及其成员实现工作目标之程度的核心体现,组织管理者是围绕工作绩效的提升这一核心目标来进行决策与管理的。工作绩效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有着不同的含义,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会有所变化。由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工作绩效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有关工作绩效的理解,目前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将工作绩效看作一种结果,一般将其视为相关工作目标的达成程度;二是将工作绩效视为一种与组织目标实现有关的行为^[3];三是将工作绩效分为任务绩效与关系绩效两个方面,将前者界定为工作结果,将后者看作是促进这种结果的行为。

学者们对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内涵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与研究。例如,胡伶^[4]认为,要把握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内涵,需要综合考虑高校

教师工作的结果、行为和未来潜力三方面因素。潘孝富等^[5]认为,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是指高校教师所体现出来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为表现及其结果。由此可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主要围绕“工作目标完成度”这一核心。有关绩效的研究表明,绩效是结果与行为的统一。从本质上来说,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不仅仅涉及工作目标完成度这一方面,其行为表现也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工作目标的完成度、行为表现等来衡量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3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对高校教师心理资本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多,其主要涉及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心理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两个方面。

先说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K. W. Luthans 等^[6]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与满意度、组织承诺与绩效正相关。李力等^[7]的研究表明,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对其工作投入水平有正向的预测效果。概而言之,提升心理资本,有利于促使高校教师保持积极的教学心态,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工作绩效。

再说心理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李越恒^[8]认为,自我效能、乐观和坚韧性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对高校教师实现其工作绩效目标具有重要作用。A. D. Stajkovic 等^[9]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正相关。郝玉梅等^[10]的研究表明,增强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可以提升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目标。赵富强等^[11]通过对全国 29 所高校 784 名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韧性对其科研绩效的影响最大。

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作为重要的积极心理因素,因其构成要素不同会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程度不能简单归结为其总体影响水平,更

要考虑到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对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程度。尽管心理资本构成要素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尚未明晰。作为高校教师的一部分,高校思政教师有其特殊性,其心理资本研究需在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更科学地提出研究假设,本文尝试对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诸要素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予以讨论与分析。从实践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高校思政教师越乐观,其坚韧性和自我效能就会越强;高校思政教师的坚韧性越强,其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就会越强。鉴于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正相关,本文据此提出以下五个研究假设。

H1:乐观对坚韧性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H2:乐观对自我效能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H3:坚韧性对自我效能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H4:坚韧性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H5: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二、数据收集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来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教师的基本信息;二是观测指标题项,共有 38 项,分别测量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乐观、坚韧性与工作绩效,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量。依据目的抽样原则分层选取高校思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30 份、回收问卷 321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0 份。利用 SPSS23.0 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经检验,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三、模型建立与分析

为了验证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利用 AMOS 软件对研究假设进行传统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模型的拟合度较差。根据相关参数的统计学要求与题项的具体含义,引入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存在关联性的 12 个观测变量(见表 2),利用 AMOS22.0 软件生成带有路径系数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2。

为了较为清晰地展示自我效能、坚韧性、乐观与工作绩效之间的路径关系,根据统计数据,

借助 Amos 分析软件,本文列出了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心理资本对思政教师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主要如下。

其一,乐观、坚韧性和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的直接相关系数为 0.000、0.155、0.477,说明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有直接作用,其次是坚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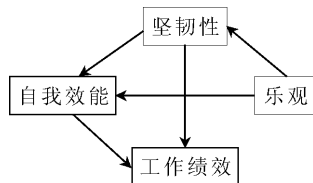


图 1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传统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 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	NFI Deltal	RFI Rho1	IFI Delta2	TLI Rho2	CFI	RMSEA
Default model	0.930	0.904	0.963	0.948	0.962	0.062
拟合标准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表 2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关联机制的观测变量表

自我效能(SE)	乐观(OP)	坚韧性(RE)	工作绩效(PM)
SE3:您自己适应所在岗位的劳动负荷	OP1:您当前的工作所处环境符合您的期望	RE3:您沉浸于您的工作当中	PM4:您的工作效率很高
SE4:您自己的性格特征适应目前的岗位	OP2:您所在岗位对所需资源供应充足	RE4:您可以一次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PM5:您能够在上级、客户安排的时间内完成各项工作
SE5:您的气质类型适应目前的岗位	OP4:您满意当前的薪酬和福利	RE5:发生在您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来自于您的工作	PM6:您总能达到既定的工作目标

表 3 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作用关系表

作用方向	乐观	坚韧性	自我效能
全部作用	坚韧性	0.840	0.000
	自我效能	0.526	0.196
	工作绩效	0.381	0.249
直接作用	坚韧性	0.840	0.000
	自我效能	0.361	0.196
	工作绩效	0.000	0.155
间接作用	坚韧性	0.000	0.000
	自我效能	0.165	0.000
	工作绩效	0.381	0.094

其二,乐观对工作绩效的间接相关系数为 0.381,而对坚韧性和自我效能的直接相关系数为 0.840、0.361,说明乐观可通过坚韧性和

自我效能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作用。

其三,坚韧性对工作绩效的间接相关系数为 0.094,而对自我效能的直接相关系数为 0.196,说明坚韧性还能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作用。

其四,结合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可得出心理资本中的乐观、坚韧性、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之间作用关系的总表达式:工作绩效 = 0.381 乐观 + 0.249 坚韧性 + 0.477 自我效能。

四、相关建议与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立足于心理资本与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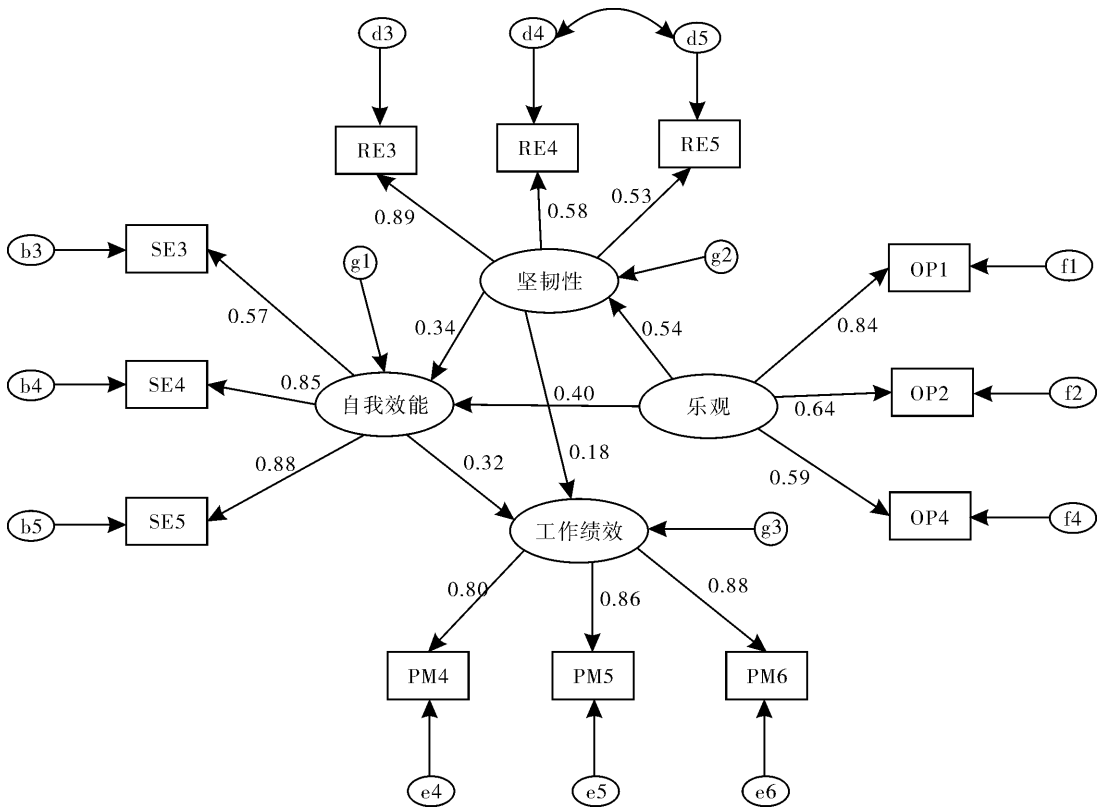


图2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修正结构方程模型图

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建议以心理资本改善为突破口,选择如下路径来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1. 着重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

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对教师工作绩效具有较大的直接促进作用。因此,应着重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以提升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当前,高校思政教师的地位已受到重视,但由于工作环境条件不理想、归属感有待提高等,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并不高。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具体可从学校支持、模范示范、教师归属感三个方面着手。在学校支持方面,高校应为思政教师的工作与成长提供更多的支持,着重关怀教师的心理需求与生活需求,以促进教师逐渐养成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在模范示范方面,高校应以模范教师的宣传为突破口,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引导思政教师学习优秀同行的榜样行为,引导思政教师

对自身未来目标实现积极预期,提升其自信水平。在教师归属感方面,高校应坚持以教师为本,为思政教师提供更多互动机会,提升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与认可度,增强思政教师的归属感。

2. 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

研究表明,乐观对坚韧性、自我效能均可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从而对思政教师工作绩效产生间接作用。乐观是一种归因风格,也代表一种预期模式。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可从个人目标、个人评价与个人学习三个方面着手。在个人目标方面,高效应引导思政教师个人设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合理目标,关注思政教师在实现个人目标方面的自信提升这一关键问题,引导思政教师在努力与进步的过程中增加其乐观预期。在个人评价方面,高校应引导教师正确评价客观事实,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忽视眼前实际和客观条件,更不是推卸责

任,不是将工作中所遭遇的失败都归于外部因素。因此高校还应引导思政教师针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败与成功予以合理的积极归因。在个人学习方面,高校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个人学习机会。在信息化时代,知识老化和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高校思政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最新思政知识和理论,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与期待。

3. 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坚韧性品质

研究表明,坚韧性对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可能产生直接与间接的正向作用。坚韧性在心理资本中强调的是复原与超越,也是指个人能从逆境或失败中迅速恢复工作状态的能力。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坚韧性品质,可从心理辅导、心理培训、社会支持三个方面着手。在心理辅导方面,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着重关怀思政教师的心理健康发展,增强其在面临挫折与失败时的应对能力,针对心理状态不良的思政教师,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引导其快速摆脱不良状态,争取做到超越自我。在心理培训方面,高校应通过定期的组织与培训,让教师掌握心理资本与心理坚韧性的相关理论知识,使其充分地认清目前工作状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养成坚韧性的个人品质。在社会支持方面,高校应为思政教师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为思政教师个人的坚韧性品质培育奠定情境基础,尝试利用环境的变化为思政教师坚韧性品质的养成提供路径支持,引导思政教师能够积极面对不同类型的工作情境,增强其心理坚韧性。

4. 加强心理资本诸要素间的联结度

由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不同的心理资本要素对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有不同的作用。同时,心理资本各要素的角色与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应的联结关系。基于自我效能在三个要素中对教师工作绩效具有较

大的直接促进作用,应将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作为增加其心理资本的首要因素。这不仅有利于其能更好面对和处理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有助于其更为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工作绩效。乐观和坚韧性通过作用于其他因素对工作绩效可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在教学实践中,高校思政教师是否具有乐观心态与坚韧的性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行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间接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些因素对结果可产生调节与缓冲的作用。同时,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重视心理资本各要素的协调与联结,有利于促使心理资本整体功效的最大化。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心理因素,同其他个人资本一样,与诸多外部因素(包括经济地位、社会资源、组织环境等)存在普遍联系,并受其影响。因此,利用相关外部因素可促进个体心理资本诸要素的联结,有助于高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的提升。

随着工作环境与工作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的内涵与结构可能会发生相应的转变。目前,尚未被关注和研究的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因素可能还有很多,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相应的影响作用,这些因素尚需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 FRED L, CAROLYN M Y, BRUCE J A. 心理资本[M]. 李超平,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8.
- [2] MASTEN A S, REED M J.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 [M].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2:176.
- [3] CAMPBELL J P. Modeling the performance prediction problem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J].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0:12.

- [4] 胡伶. 何谓高校教师绩效——兼论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2): 51.
- [5] 潘孝富, 秦启文, 谭小宏. 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绩效的关系分析[J]. 心理科学, 2006(6): 1489.
- [6] LUTHANS K W, JENSEN S M. The linkag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al mission: a study of nurses [J]. Journal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 2005(6): 304.
- [7] 李力, 廖晓明.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基于高校积极组织管理的视角[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12): 204.
- [8] 李越恒. 心理资本视阈下的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改进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15(8): 19.
- [9] STAJKOVIE A D, LUTHANS 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self-efficacy: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motivational and behavior approaches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98(26): 62.
- [10] 郝玉梅, 徐全忠. 心理资本开发与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J]. 未来与发展, 2013(4): 79.
- [11] 赵富强, 陈耘, 张光磊. 心理资本视角下高校学术氛围对教师科研绩效的影响——基于全国29所高校784名教师的调查[J]. 高等教育研究, 2015(4): 50.

(上接第63页)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01).
- [3] 陈占安.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10): 4.
- [4] 赵娜. 中共党史学科归属争议及其历史考察[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8.
- [5] 陈锡喜. 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新空间[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12): 181.
- [6] 赵勇. 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教学的反思与解决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5(4): 70.
- [7] 程美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研究[J]. 天中学刊, 2008(1): 126.



引用格式:吕晓洁. 河南当代文学审视[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71-78.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71-08

河南当代文学审视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He'nan province

吕晓洁

LV Xiaojie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中原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深厚的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中原乡土世界。与此同时,一些地域因素对于河南作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单向度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渐成风景的河南女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南男作家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原风貌,但因在历史积淀与生活磨砺方面存在某些欠缺,使得这些作品少了些厚重感。继续着力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是河南文学在新时代实现突破与超越的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

河南文学;
地域视阈;
传统经验;
反思;
超越

[收稿日期] 2018-05-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82400410259)

[作者简介] 吕晓洁(1972—),女,河南省泌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南文学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河南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与中原地区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明有密切关系。从20世纪初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等对中原农民苦难生活的书写,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对中原农村现状的描绘,到70年代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对中原农村新生活的书写,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对新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乡土文学都居于重心。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河南作家以空前的阵容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分别获得矛盾文学奖,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后,在全国反响很大,代表了河南当代文学创作的高水准。但近年来,河南文学中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渐少,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更少。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加速,激起社会巨变,“文变染乎世情”,河南文学如何应对这个特殊时代,再度创造辉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以反思精神审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的影响因素,探寻新时期河南文学实现超越、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路径,以为推动河南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河南文学与地域资源

地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空间,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已被大批优秀作品证实和众多学者认可。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1]认为,风土与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不同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这说明,一个地方的风土对作家创作、对文学特色与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潜在影响。严家

炎也指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作家的性格、思维、艺术特征,而且对于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了特殊的中原民风民情,也形成了特殊的中原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必然会影响河南作家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旨趣。20世纪河南新文学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裂变中生成的,从早期的尚钺、徐玉诺、冯沅君等,到三四十年代的师陀、姚雪垠,70年代的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再到新时期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痕迹,无论是作品中的地理风貌,还是对于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以及作品中的精神内涵,都浸透了中原文化的汁液。

中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自然地理、物质元素、精神维度等。从地理上看,中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四周环山,中部是广阔的平原,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生存。因此,中原大地很早就有了人类,发展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农耕文明发达。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稻谷遗迹,30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农事活动的记载,并有稷、黍、麦、稻等农作物名字。中原因其位置优越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定都之所。《史记·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3]《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4]这里所说的伊、洛、河、济、伊阙等地就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从夏商到北宋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原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对中原人文化性格的养成有深深的影响,他们有自

信、乐观的一面,也有自大、保守的一面。此外,中原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给中原人带来了无数灾难,因此,中原人也养成了善于在夹缝中求生的韧性与斗争精神,这些在河南文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从思想传统上看,老子、庄子皆为中原人士,孔子虽然生于山东,但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地方在河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相互交融构架起了儒道相济的中原文化主干。中原人深受儒道文化熏陶,既能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张一弓《远去的驿站》中的那群知识分子,满怀报国之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拍案而起,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运动之中,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仅凭自身力量无力回天的大挫折、大厄运面前,能以老子的无为而有为、顺应自然而自释,如张宇《活鬼》中的侯七。再者,中原深厚的思想文化养成了中原人尊礼守法、坚韧顽强、勇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例如,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南阳人的纯朴仁爱、坚守信念。其长篇小说《第十二幕》中的尚家几代人百折不挠,历经战乱、匪祸、运动、腐败等重重磨难,每一次虽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尚家人坚守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并不断为之奋斗,为中国民族丝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準在其《黄河东流去》中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国民党炸开黄河大堤使他们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之际,不是消极认命,而是自强自立,顽强求生,并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再难不失人格,再苦不忘国耻,这正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原传统思想深厚的另一面是受封建思想钳制的时间太久,在中原人的性格特征上留下了唯上、保守、好斗等不好的烙印。新时期以

来,河南作家表现出集体反思的精神,面向新的历史时代进行了深度思考,他们反思中原发展的历史、中原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这些文化根源对中原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等,表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与拯救情怀。其中,乔典运的系列作品《冷惊》《满票》《村魂》《乡醉》《问天》等对中原人的顽固、好斗等文化性格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对中原农民凡事唯上、盲目跟风等性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作品对南阳人的保守与落后进行了真实的描绘。此外,李佩甫、阎连科等作家在作品中对河南人的性格也都进行了集中的观察与思考。

二、乡土构建与视域局限

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得天独厚的文化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的乡土世界。然而一些地域因素给河南作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与制约。

1. 创作视野的限制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灾难重重,给河南作家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河南作家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乡土世界。例如,姚雪垠《长夜》里的中原是一个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世界;李準《黄河东流去》里的中原大地横遭黄水灾害,黄河两岸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状目不忍睹;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中原大地饿殍遍地;阎连科《丁庄梦》中的丁庄村艾兹病蔓延,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刘庆邦的煤矿系列作品中处处是悲苦与无助,农村系列作品中处处是凄凉与沧桑。

河南作家的写作是真诚的,他们具有最深的忧患意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爱其厚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盼其振兴。刘震云在

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阎连科的《丁庄梦》是根据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而写成的,作者曾在三年里六次到该村了解疫情,收集资料,小说虽然有文学上的虚构成分,但大量细节近于写实,其小说集《情感狱》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对于中原乡村的权力与宗族纠葛、乡村权力带给农民的苦难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刘庆邦曾在煤矿工作多年,其煤矿系列小说多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国内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涉及的原因有物质资源匮乏的自然因素,有极左路线、权力压迫等政治因素,有封建思想残留的文化根源,也有源自人性深处的一些缺陷,反思较为全面、深入。河南作家对故乡的苦难、故乡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能进行深刻的剖析,归根结底是源于一种担当精神,一种怀有殷切希望的拯救精神,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美好的中原乡土世界和曾一度失去的中原人的健康人性。

多数河南作家由于过于执著于苦难世界的描写,从而囿于一个封闭的“苦难世界”而无法自拔,影响了其描绘生活的广度,导致了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创作主题的单一,影响了其对中原乡土精神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比如,几乎每个河南作家都集中描写了权力与苦难问题,尤其以阎连科的作品最为突出,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一部苦难史。如果说其早期的《情感狱》等作品对人类苦难的描写是真实而令人震撼的话,那么到了中后期的《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年月日》等作品,其对苦难的描写则成了魔幻故事的点缀与装饰。这样一来,作品中的苦难很有可能沦为可供观瞻的艺术品,从而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人文情怀。

苦难是古今中外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早已开始了对于苦难

的书写。此后,苦难书写一直贯穿于中西文学作品。就西方文学作品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几乎所有的古典大师的作品都直接而深刻地书写了苦难。就中国文学来说,从《伐檀》到《史记》《窦娥冤》《红楼梦》,直到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深深的苦难意识,这些经典作品也因具有人类的苦难意识而震撼人心。

中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比别的区域有更多的苦难,如20世纪初的兵祸、匪乱,1930年代的黄河决堤,1940年代的水灾与蝗灾,1950年代末的“信阳事件”等。这些灾难记忆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反映到其作品中去,从而使其作品有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品质。但过分执着于这些描写,囿于其中而无法超越,容易使作品变成一种精致的艺术雕刻,难免沦为展览式的文本,从而削弱乃至失去了作品的思想批判力度。着力表现苦难的村庄、苦难的人民、苦难的乡土没错,但如果一味沉溺于这些表现,就会造成题材与主题上的自我复制。

对于乡村政治的集中描写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文化十分发达,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沉淀在中原人的心灵深处,对中原人影响极大。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因此也成为了河南当代作家描写的一个中心。作家过多地对于权力经营的精细描写,如《情感狱》《故乡天下黄花》《羊的门》等,对权力的角逐倾轧、复杂的权谋之术、深谋的心计、高超的手腕等的描写,反而遮蔽了其对于权力的批判。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于目前乡村文化的复杂面目揭示得比较真实深刻,颇具时代气息。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候选人在竞争中如何勾心斗角,如何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如何利用小利诱惑农民,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票,

这些成了小说的核心情节,这种过分投入的戏谑态度容易把读者引入“看热闹”的迷途。又如,李佩甫《羊的门》中对于权力的描写,作者对呼天成权力运作的描写表现出沉迷的一面,作品中一旦涉及呼天成如何驾驭人心、利用他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与呼市市长如何斗法等方面,作者的笔触就显得特别活跃,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作者设置的权力执掌者的智谋经营之中,其结果是权力成了一门可供玩赏的艺术,很有可能落入文化消费的圈套,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精神境界。

2. 创作模式的限制

河南作家就单独个体来说,在创作题材或艺术表现上存在着模式化问题。例如,乔典运叙述一件生活小事,常常是制造出人意料结局,从中揭示中原农民的奴性,缺少自我创新;阎连科小说始终未能跳出乡村苦难这一主题;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一度沉迷于狂欢化叙事,造成语言的自我膨胀,其《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等作品使很多读者不忍卒读,且引来颇多质疑;刘庆邦的小说存在苦难复制现象,对物质性的苦难描写较多,对精神性的苦难描写较少,使作品停留于表层的历史记录,忽略了对苦难背后的深层东西的考量。

古今中外,凡属经典文学作品,必然凝铸着一些令人为之震撼、刻骨铭心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而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需要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乡土经验融入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去,扎根生活深处,把握时代精神,关照人类生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18世纪的启蒙精神、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至今仍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慷慨悲壮的秦汉文学精神,狂放洒脱的魏晋文学精神,丰富激昂、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求变求新的近代文学精神,以及启蒙、激进的

“五四”文学精神等,至今仍使这些作品闪耀于文坛之上,成为文学作品的典范。河南作家应该从中受到启发。

三、乡土风景与代际差异、性别差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当代作家尤其是像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有在中原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于那个时代的乡村记忆比较深刻,他们的乡土经验建立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之上,而对于当下的乡村生活则有些隔膜。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新时期以前的乡村世界。目前,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下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矛盾与困惑,等等,他们关注得较少。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现代化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如何回到乡村中去表达新时期的乡土精神,这是目前包括河南文学在内的我国乡土小说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邵丽、乔叶、傅爱毛、蓝蓝、梁鸿等河南一些女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并逐渐引起文坛注意。例如,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指甲花开》《锈锄头》《最慢的是活着》,傅爱毛的《嫁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描写的更多是当下的中原、正在发生着剧变的中原,表达了对历史转型中的乡土中原的深切关注,填补了河南乡土文学的一段空白。

河南女作家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与上一代作家相比有着不同的乡村经验和文学理念,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她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以往作家笔下的乡村世界,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融

合问题、农村人进城问题、农村女性出路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与中国乡村共时性同步发生着的一切。这些女作家以敏锐的乡土感知、独具的艺术手法、细腻的情感叙事,拓宽了河南文学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河南文学的叙事内涵,为河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们打破了以往河南男性作家常用的小说叙事方式,不再把革命、历史、家族等宏大叙事作为主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乡村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描绘城乡正在发生着的变革,重在展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深处发生的变化;书写对象由过去乡村生活扩展到了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村发展问题;书写空间由乡村扩展到城乡结合地带、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居民等;叙事时间由“过去时”转到了“现在进行时”。施战军曾指出,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5]河南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面对发生了变化了的新乡土社会做出的探索。比如,邵丽的著名中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基于城乡文化的差异及其带给人们的精神上的限制,而对城乡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的集中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城乡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问题;其另一篇小说《明惠的圣诞》,是基于近年来农村女青年不断涌向城市后在城市的境遇问题而写成的,通过对“明惠”这个女孩的城市梦想的追逐与破灭的描写,从理论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追问。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锈锄头》等作品对乡下土地日益缩减、农村人进城问题进行了书写;《盖楼记》揭示了乡村土地征用拆迁问题。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对于目前乡村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如乡村文化的颓败、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留守妇女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等,都进行了真实的描写。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精神面貌。

但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生活积淀,以及对于历史、文化、人性更为深刻而宽广的认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厚重感、历史感的长篇作品不多。她们对于目前年轻的乡村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值得重视。一些很早辍学回家和一些虽坚持读到高中而在高考落榜后的乡村女孩外出打工是其必然选择,但她们进入城市之后的路在何方,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和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对此进行了深思。但由于作者视野的局限、对于问题本质把握不够,这种探讨尚欠深入。乡村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关口,面对日益全球化、都市化、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乡土小说如何更好地面对现实而深入写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新时代河南文学实现超越的路径

河南文学史上不乏有突出影响的作家,如近代的师陀、姚雪垠、李準等,1990年代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成绩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颇具影响力。新世纪以来,河南文学前进步伐不大,虽时有新作出现,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远不如前。河南文学要实现超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反思自身,在现实中扎根,在传统中超越

刘增杰^[6]曾指出,中原文化要进步,当务之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放宽眼界,借鉴吸收世界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有益经验,首先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才能实现整体超越,换一种视角会挣脱权力文化与苦难乡村的苑囿,发现更多不同的表现领域。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说过:“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

到的人类情感。”^[7]这种人类情感可打破个人生活的狭隘视野,超越窄小、肤浅,通往博大、深刻。当作家清醒而自觉地表现人类情感时,他的痛苦与欢乐就会超越一己之欲,变成时代、社会、人类情感的代表,因为他的情感已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土壤之中。

其实一些作家也有过自省与警觉,试图自我脱变。比如阎连科,其“耙耧山系列”早期作品大多打上了政治苦难与贫困的物质条件所造成的苦难的印记,如《情感狱》《受活》《丁庄梦》等涉及的苦难,多源自乡村政治未脱尽的封建色彩或物质匮乏造成的苦难。其后来创作的作品如《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则把目光转向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等,表现出了强烈的哲理意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其对人生、历史努力探索之后取得的实绩。该作品不再执迷于“故乡系列”作品那种戏谑与解构的态度,不再玩味文字游戏,而是返身于纯朴的故乡大地,写出了一曲东方农民的“百年孤独”之歌。作者语言朴拙,叙述极富耐心,甚至有点“絮絮叨叨”,像一个岁月老人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村庄所发生的一切。无疑,像莫言向民间的大撤退一样,作者也在返回民间,返回中国小说的传统,这是一次成功的“返乡”。与其“故乡系列”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更具精神内涵,更具人类意识,也因此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部作品如果能从具体的人或物中发现某种生存普遍性,如一个特殊时代的生存普遍性、一个地域的生存普遍性、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生存的普遍性,那么该作品就容易显出超越意义。南非作家戈迪默曾说:“对经验的改造仍是作家首要的基本的姿态。作家的想象力大大拓宽、扩展了有限的经验范畴,有如此的经验才能得到提炼升华,充分展露其意义和重要性。”^[8]

作家仅有感受与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想象熔化改造具体事实、个人经验、个体感受,加以重组再建,用想象拓宽经验、扩展感受,升华事件的深层意蕴,走出狭隘的经验圈子,超越一己感受,向更宏大、更深邃的世界进发。李锐在谈到创作时曾说:“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再说:这是写的农村题材,是写农民的小说。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渴盼辉煌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所谓‘天地广大美而不言’——这高山无语的境界是一种大境界,令人心向往之!”^[9]

与新时代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同步,深入城乡内部,体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的新的渴求,进入他们面前的新困境,这是一条可取之路。学界有中国文学存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之说,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河南文学。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者深入乡村,了解乡村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写出时代巨变中的真实的乡村,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共时性发生着的真实的乡土世界。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作家只有沉入社会底层,进行敏锐观察与感知,怀着对人类的无限热爱、对生命的深情眷顾,对这个时代里的自我灵魂进行剖析与自省,展现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担当,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2. 深厚的中原传统文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其渊源之深远、思想之

博大,只有深入体会才能掌握其精髓,而一旦掌握了其精髓,就会激发更多的灵感,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从而达到更高的写作境界。比如道家文化,并不是一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就能包括了的,而是包含了无尽的奥妙。道家文化在几千年前就具有了人类眼光和人类的生存意识。道家知识分子经由体验进入本质,参悟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洞见了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互生互动、相通相融,看破了“一”“道”“虚”“静”等宇宙生存的至博至高境界。道家发现生命个体只有生存其中、体验于其中,又能巍巍然超乎其上(不是凌驾于其上),才能达到自然与人的真正相知相荣。正是因为他们把这样的超越境界随时融通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才实现了道家心目中的人、物、过往、未来、自然、天地、机体、精神的浑然一体。这是一种至高的生态伦理,它既不以自我或人类为中心,又不以自然神性为崇拜对象,而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和合”关系。在目前商业文化充斥一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双重恶化的情况下,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河南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态文学是目前文坛较为活跃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很多生态文学作品浅尝辄止。由于缺乏深刻的生态思想,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与科技的发展缺乏成熟的思考,难以提出可行的见解,因此出现创作上的审美追求取向游移不定,导致一些作品的情节僵化或一些拯救方式的悬幻化。目前河南还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可以由此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五、结语

中原文化既是一个关乎地理的概念,也是

一个关乎时间的概念,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自我更新的过程。新时代,中原文化应该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内涵。1990年代始,文学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化浪潮给文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荡。进入新时代,以网络、影视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浪潮,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外部环境因素也给近年来的河南文学带来一定困扰。河南文学应重新启用和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如此方有望实现突破与超越。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65.
- [2] 严家炎.“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总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
- [3] 司马迁.史记(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474.
- [4] 左丘明.国语[M].黄建国,张玖青,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10.
- [5] 施战军.生活与心灵:困难的探索——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J].人民文学,2006(1):125.
- [6] 刘增杰.路上——我的学术经历[J].东方论坛,2005(6):47.
- [7] 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5.
- [8] 毛信德,李孝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272.
- [9] 李锐.拒绝合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3.



引用格式:孙艳娜. 再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构建问题——与柳士军和张荣光商榷[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79-83.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79-05

再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构建问题

——与柳士军和张荣兴商榷

Discussing agai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f Shakespeare's sinicization

—Discussion with Liu Shijun and Zhang Rongxing

孙艳娜

SUN Yanna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柳士军和张荣兴在其论文《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学理基础,提倡在未来中国文学创作中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从内容到形式上使莎士比亚“中国化”。然其对“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概念界定不清,存在着自相矛盾、逻辑推理错误,学理基础不存在因果关联,以及现实意义不大等问题。从文化传播和文学鉴赏来看,将莎士比亚“中国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归纳、总结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士比亚戏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士比亚研究特色。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和张荣光所提出的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

关键词:

莎士比亚;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 2018-1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WW048)

[作者简介] 孙艳娜(1971—),女,河南省鲁山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莎士比亚。

柳士军和张荣兴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论断,欲对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归纳,从而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莎学研究话语体系。两位学者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勇气确实可嘉,然在细读之后,发现其论断存在诸多欠妥之处。鉴于此,本文拟针对文中的不足,以“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分析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所存在的问题,以厘清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内涵,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一、概念界定问题

柳士军等在《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一文中首先指出,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但究竟什么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纵观全文,作者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笼统地认为,莎士比亚中国化,首先是内容的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实践,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其次是形式的中国化,即构建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思维习惯的中国话语。^[1]依此论断推论,莎士比亚译介至中国之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从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主义二者被介绍至中国的时间上来看,莎士比亚第一次以“沙士比阿”之名出现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时间是1839年,远远早于1848年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更早于又半个世纪后陈望道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面世。故其以上表述违背事实,是不正确的。

对于所谓“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说法实难让人苟同。难道中国人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就等同于莎士比亚中国化吗?众所周知,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文化浸染过程,不是一时一刹就能完成的。若认同此说,所有被译介至中国的外来作品从其被翻译的第一天开始就都是其中国化的开端了?中国的歌德研究、雨果研究是否都可以被称为歌德中国化、雨果中国化?同理相推,其他国度的莎士比亚研究是否也可被称为莎士比亚德国化、法国化、日本化……?该论断明显缺乏推论的科学性和学术的严谨性。

其次,在该文中,作者以“莎士比亚化”为出发点,认为既然国内外莎士比亚化研究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应运而生了。但“莎士比亚化”与“莎士比亚中国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

“莎士比亚化”最早是马克思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在该信中,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大加赞赏,呼吁不要“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或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2]。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莎士比亚化”,实质上是指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就是要求剧作家在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历史细节进行描写时,“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3],而柳士军等所说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则归属于文艺创作导向的范畴。所以,二者在字面表述上虽似乎有某种相似,但二者之间确无实质性关联,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但是,柳士军等演绎出的从“莎士比亚化”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逻辑关系易使读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产生疑问。虽同为

“化”的体现,但马克思主义归属意识形态,莎剧是文化遗产,二者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了,就可以提倡莎士比亚中国化。故其以上推断无据可依。

此外,若按照柳士军等提出的“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的逻辑推理,未来的中国文学将会出现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文坛上亦会涌现出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文学创作手法都要销声匿迹了。显然,这有悖于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指导方针,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柳士军等把“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既定命题与“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莎士比亚中国化’在中国是否成为可能?”的新问题相提并论也实属不妥。当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考量时,不难发现其前后论断的自相矛盾:既然莎士比亚中国化在译介的第一天就已经“形成”了,今日还有再论莎士比亚中国化可能性的必要吗?如此一来,其推论的不合理性和结论的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内容中国化”的提法也易让人生疑。柳士军等是要提倡在中国舞台上演出莎剧之时,必须把莎士比亚故事完全移植到中国某朝某代吗?如此一来,“内容中国化”之后的莎剧是莎士比亚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其目的与意义何在?是用来学习莎士比亚对人性永恒主题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单纯为读者讲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中国故事?其答案让人费解。

二、学理基础问题

柳士军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第一个学理基础。他

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而言之,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离不开中国的具体语境;第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味道。^[1]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文艺创作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该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4]这一时期的莎剧演出多以大众化、平民化为宗旨,李健吾把莎氏《麦克白》与中国元曲《赵氏孤儿》糅合而创作的六幕悲剧《王德明》是典型代表。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传播到我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的产物。现如今的中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情形完全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5]。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好地阐释了开放、多元文化时代对待西方经典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吸纳莎剧中的精华部分为我所用,借用莎氏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此法只能算是一种选择,不可武断地、全面地对莎剧进行强制性的中国式替代,因为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尊重他国的思想

文化,而不可随意改编,仅着眼于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作者阐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学理基础。把此学理基础与第一个学理基础进行简单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说辞。作者一方面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方面的指导,莎剧在中国的改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已经为国内所喜闻乐道^[6],以此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莎剧融合之后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已经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笔者重点描叙的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也会在吸收新养分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等,都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进一步丰富它们的内涵^[1]。那么,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时是应该张扬传统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后再进行莎士比亚中国化?对此,作者并未明确作出回答,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即使不深究两个学理基础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本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跟莎士比亚中国化如何进程合并?答案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

三、现实意义问题

莎剧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林则徐等改良主义者引进至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改变社会。初次引进莎剧时,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国民对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艺理解不足,只有借助中国文化元素方可使其走进普通大众视野。可见,莎剧初入中国时,只是一种文化介绍,符合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使然。即便如此,赋予外来文化过多本土化的做法,必定会对原著带来或多或少的误读、误解、误传,从而遮蔽其本真面貌,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易招

致西方学界的批评。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美国莎学家 J. L. Murray,他曾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国人通常对莎剧进行随意的挪用和改编,旨在为各自的目的服务^[6]。西方人虽然只看中国莎剧演绎的结果而不去深究其成因,不排除其存有偏颇,但也道出了我国早期莎剧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当初译介莎剧进行本土化改编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这些理由就不能再是理由了。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英语普及程度之高非 19 世纪之初可比,去西方国家旅游如同在国内走走那么简单方便,大众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已不再陌生,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度也相当高,即使阅读全英文的莎氏剧本或欣赏英语演出亦无太大障碍。既然没有了语言、文化认知障碍,借助中国文化元素阐释莎剧的早期理由也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互联网高度发达,距离被无限度拉近,文化差异性更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汁原味的莎剧也许更受追捧。所以,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必要性不大。但必须承认,若确有合理需要,适当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中国化阐释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可。

四、关于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思考

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会存在本土化问题,这是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莎剧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易直接交流,本土化程度逐渐式微。此种背景下若再一味地强调本土化即存在着功利性的目的,是对莎剧进行改头换面还是借用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文化传播的正常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然的、因时而变的,任何借外力干预改变其走向的做法都是有悖于文化发展规律的。在莎士比亚被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相

信其被本土化或中国化还会继续,因为有需要就有市场,这在中国开放、多元的文化体制下文化传播的一种角度、一种途径,无可厚非,但极力提倡中国化是不可取的,亦是不合时宜的。在文学鉴赏上,社会进步的表现应是保持其原样,而非强制性地去改变它。对于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莎剧,我们应将其作为文艺本体来欣赏,汲取其舞台艺术手法与对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等人性深刻剖析方面的养分,而不应是出于功利性的需求。总之,文明进步的标准是让文化自然发展,如果强行改变其发展轨迹,必有其一定的目的可图,强调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将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不合时宜的。

“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被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剧研究特色,具体阐释现象背后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独特的中国风画卷。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等提出的莎

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

参考文献:

- [1] 柳士军,张荣兴.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6(3):8.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5.
-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17.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55.
- [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2014-09-24)[2018-10-1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 [6] MURRAY J L. The paradox of Shakespeare in China [J]. The Shakespeare Newsletter, 1998 (48):37.



引用格式:刘靖宇. 战乱背景下胡塞尼对社会伦理诸形态的书写与家国重建构想[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84-92.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84-09

战乱背景下胡塞尼对社会伦理诸形态的书写与家国重建构想

Khaled Hosseini's writing on different social ethics and his reconstructive conception of family and nation under the chaotic background of war

刘靖宇

LIU Jingyu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展示了阿富汗因战乱而导致的各种社会伦理关系的失序,成功地将读者带进了那个残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世界,表达了其对阿富汗战争伦理、民族伦理、宗教伦理等社会伦理失序的深刻批判。暴露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更好地重塑。有着高度人文主义情怀、对故国满怀深情的胡塞尼,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借助作品中的叙事,指出了故国阿富汗重建的必由之路: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与邪恶,用宽容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阿富汗的重建与复兴不仅需要阿富汗国内实现真正的民族、宗教的相互宽恕和融合,也需要流散在外的所有阿富汗游子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无私帮助。

关键词:
卡勒德·胡塞尼;
社会伦理;
阿富汗;
家国重建

[收稿日期]2019-03-2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7D034)

[作者简介]刘靖宇(1970—),男,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族裔作家作品、ESP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W. C. Booth 在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影响时曾说:“一旦一个新的文本被公开,我们带着对生活的事实对文本进行伦理性的阅读时,这一过程将导致两面性。伦理读者不仅要对文本和作者负责,而且还要对她或者他阅读的伦理品质负责。”^[1]刘小枫^[2]认为,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让人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Booth 和刘小枫从文本对读者的影响方面对读者提出的要求,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指明了路径,即文学伦理批评既要对本体和作者负责,也要进入文本当时的时空,分析其造成各种伦理症结的历史与社会因素。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三部作品《灿烂千阳》《群山回唱》《追风筝的人》全部是以故国阿富汗为背景,时间跨越了阿富汗最为苦难的 60 年。他深切感受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故国充满了血泪,每一个布满灰尘的面孔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灵魂,他所经历与目睹的一切促使他“以正义和公平的原则负责任地描写阿富汗”,“将背后的灵魂悸动展示给世人”^[3]。胡塞尼的作品记录了阿富汗 30 年来的揪心历史,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伦理内涵,把读者带进了那个残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世界。目前国内对这三部作品的伦理阐释,主要集中在个体叙事与家庭伦理层面。笔者认为,胡塞尼的作品尽管采用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方法,但其目的并非仅局限于对家庭关系的书写,而是通过个体叙事来全方位地展示失序的战争伦理、偏狭的民族伦理、极端的宗教伦理等对阿富汗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在书写与反思这些失序的伦理关系基础上,表达了其对故国阿富汗民族和家国重建的构想。

一、胡塞尼对失序的战争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文学伦理批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品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且在于通过伦理上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4]众所周知,战时往往“法律无言”,因为战时生命悬于一线,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共同体,人们有时不得不违背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可以超越一切限制,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战争的权利、性质、根源与责任而言,它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5]但历经几十年战乱的阿富汗完全失去了伦理的约束,造成了阿富汗国家和人民的血泪苦难。胡塞尼在其三部作品中,通过对逃亡者、留守者、经历者和见证者的叙述,从多个视角将阿富汗因战火而改变的面容以及人民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全面真实地还原在读者的眼前,对战争发起者的虚伪与残忍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从战争伦理来看,当今国际社会比较认可的正义战争包括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 25 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者炮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 27 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馆、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6]。这些规定是对战争伦理的基本要求,然而在胡塞尼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发生在那里的战乱没有哪一方受到战争伦理的约束。战乱中的阿富汗一切都是残暴的、失序的,没有任何人性,而且没有任何一方来为此承担责任。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都成为炮火袭击的对象,甚至连有千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也难逃劫难。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通过外视角借助留守者

拉辛汗与纳比的叙述,描述了阿富汗战乱的血腥与残忍:“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与杀戮。噢,够了!”^{[7]121}当阿米尔随司机法里德返回阿富汗拯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时,胡塞尼又通过外视角让他目睹了战争给阿富汗带来的毁灭,进一步确认了拉辛汗等不确定叙述者的叙述。“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7]236}儿时记忆中的喀布尔变成了一片废墟,繁闹的集市失去了踪迹,映入眼帘的只有饥饿,肮脏的乞丐。当他面对塔利班政府的军队与办事人员时,他也深刻认识到了塔利班这个极端组织是如何把人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恶魔。在《灿烂千阳》中,胡塞尼以内视角直接通过主人公莱拉的生活毁灭来揭示阿富汗战乱的无序与残忍。从第2部分开始,读者可以看到到处充斥着军阀混战与塔利班的残暴的阿富汗,哭喊声、枪炮声、挣扎着从废墟中爬起的人们,在废墟中挖掘亲人的人们,这一幕幕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在莱拉一家准备逃离喀布尔的前一天晚上,导弹终于摧毁了她的家,夺走了她父母双亲,她在废墟里被拉希德和玛丽雅姆救出,从此陷入了家暴和极端主义的魔窟。

战争一方面给贫民的生活与社会秩序带来了残酷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恶劣品性充分地暴露出来。阿富汗各种派别的战士端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了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8]12}。同时在那些年军阀们的眼里,他们进行圣战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公正与民众的安享太平,只是为了获得特权,这种特权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在《群山回唱》里,那个以“民族英雄”自居的军阀,在大街上看中了民女,第二天就带着士兵将其强行抢走。他还抢占民田民宅,以行贿的方式让法院的法官

烧毁原所属居民的地契,并用黑社会手段“处理掉了”上诉的原居民。欲壑难填,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他在赫尔曼地区种植大片罂粟,以毒品麻醉、摧毁同胞原已剩下不多的良知和健康的躯体。这些“民族英雄”为了自己的私欲,以荣誉和正义为幌子鼓动民众参加“圣战”,用无秩序无约束的方式放纵士兵的行为,这正是阿富汗战乱与民族悲剧的根源。他们在战乱中获得了特权,攫取了大量带血的不义之财,又通过施舍的手段来伪装他们的贪婪,妄想取得真主的宽恕。在他们眼里,战争没有正义原则,他们更没有正义之心。他们不仅丧失了应有的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也丧失了最起码的个人伦理道德。但是正义是永恒的,不会为战争的迷茫而模糊。那个所谓的“民族英雄”内心极度虚弱,出门身边不离保镖,家里豢养着打手,禁止儿子看电视新闻和上网,甚至不允许家里有报纸,试图用一切手段来隐瞒、来伪装,但是儿子最终还是了解了真相,并打算从这个魔鬼般的父亲身边逃离。在这里,胡塞尼对战乱的始作俑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无声的鞭挞,表达了对这场失序的罪恶战争的批判,展示了他对故国家园的深切情怀。

二、胡塞尼对偏狭的民族伦理和极端的宗教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民族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and 国家的兴衰。融洽的民族关系不仅依靠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给予有效协调,也需要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之间互相遵守潜在的或者约定的族群伦理关系。民族关系往往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紧张的宗教关系势必导致紧张的族群关系。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绝大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内部由于对原教义的理解不同又产生了多种教派。而且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就颇为偏激,这就使得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矛盾一直以

来就极为紧张。胡塞尼在其作品中对这种紧张的宗教、民族矛盾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

1. 对偏狭的民族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族际伦理关系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地方性文化相遇时,调整以交往和认同为核心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9]。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种族构成极为复杂,在封闭的地域内互相混合形成的种族、部落和家族构成了阿富汗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和遥远的概念。阿富汗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民族都跨国界,像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等民族都在邻国有自己的同民族人口,这就进一步弱化了阿富汗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而且在历史上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欺压与迫害一直没有间断,因此国内的民族对立与冲突相当严重。民族伦理的原则、规范和行为规则,首先强调的是以国家的认同为核心,而后要求民族间和平共处、相互包容,即族群之间首先要承认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认同,也就是说要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再把这种异同统一于国家这个共同体之中。其次,在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要求族群之间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宗教与习俗,这是族际伦理的关键。如果用强势民族的文化、宗教、习俗去统治、压迫弱势民族的文化、宗教、习俗,甚至取而代之,势必造成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与仇恨,甚至会直接导致民族之间的战争。其三,对于族际伦理的遵守不仅要靠民族自觉,还要靠民族精英们的伦理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更需要各民族伦理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协调与管理。^[9]由于阿富汗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作为伦理主体的国家政权一直更迭不断,这就使得阿富汗国内民族矛盾始终非常紧张,民族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和统治与反统治的斗争一直存在。作为从小深受阿富汗文化熏陶、血液里流淌着阿富汗文化的胡塞尼,对这一切不可能视而不见。

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通过对哈桑悲剧命运的叙述,深刻揭示了民族间伦理关系的荒芜对民众的伤害,表达了其对民族歧视的愤怒与批判。由于普什图民族长期在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在他们眼里,他们就是高贵民族,就是社会的上层,而哈扎克族等其他民族就是低等民族,其民众当然也就属于下等人。阿瑟夫就是这种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在他的眼里,普什图人才是纯种的阿富汗人,其他民族则是异族。他对作为哈扎克人的哈桑极度蔑视与敌视,欲灭之而后快。在他看来,“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们弄脏了我们的血脉”。他还宣称,“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克人”^{[7]4}。阿米尔对哈桑的背叛不仅在于他对父爱的追寻,也在于民族歧视思想的存在。尽管哈桑对阿米尔无限忠诚,但是阿米尔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朋友,在阿米尔眼里哈桑只是个“哈扎拉文盲”,“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7]36},是任他宰割的羔羊。长时间的欺压与歧视已经使哈扎克民族处于失语状态,他们已经习惯了忍受与被欺凌,而不知去反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面对阿瑟夫的暴力与侮辱,哈桑还是一口一个的“少爷”相称,面对阿米尔的背叛与栽赃陷害,哈桑选择了毫无怨言的忍受。在阿米尔随父亲逃亡到美国后,哈桑又返回喀布尔替他们照看家院,最终被塔利班武装人员枪杀。出身哈扎克民族的哈桑,在这种民族歧视的语境下,其悲剧命运无法避免,他是整个阿富汗哈扎克人的缩影,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而这一切均源自作为最大群体的普什图人没有遵守相应的族际伦理,没有在异中求同、存同,而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更没有承担起协调各民族关系、使

其相互包容、接纳、和平相处的伦理责任。

2. 对极端的宗教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复杂、紧张的族群关系使其原本复杂的宗教问题雪上加霜。塔利班上台后所推行的极端宗教主义,对民众与社会文化更是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阿富汗官方正式认可的宗教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的教义经典是《古兰经》和后期经过纳·阿·曼苏尔注释与补充的《圣训》。这两部经典所包含的内容几乎涉及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其宗教教义而言,《古兰经》与《圣训》在其基本面上是比较温和的。在政治上,它们主张君的理念性与主的神圣性的统一,即哈里发是主的代言人;在政治事务中,它们主张通过公议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在社会生活方面,它们主张人道主义的“真、善、美、利”的和谐统一,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爱、互助互爱。^[9]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在其与当地民族结合的过程中会受到当地风俗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发生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对基本教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就出现了在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上的偏差。处于统治地位的普什图族信仰的是逊尼派,他们自称是正统的伊斯兰教派,而哈扎克族则信仰的是什叶派。这种宗教信仰的差别势必对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尽管《古兰经》也明确规定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应相互尊重,以友善和仁慈为原则友好相处^{[10]30-36},但教规、教义、仪式方面的分歧使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尖锐对立,而且民族歧视加剧了宗教信仰差异所带来的歧视。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有关普什图与哈扎克民族关系的书籍,书中记录了普什图人对哈扎克人的欺压。当阿米尔上课把这本书拿给老师看时,“他翻了几页,嗤之以鼻地把书还给我。……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7]9-20}。老师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对哈扎克族充满了唾弃

与蔑视倾向。教师是智者的象征,也是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担负着传承文化、引导学生拓展文化视野、帮助学生培养容纳差异胸怀的责任。但该老师的言论表明,普什图民族和宗教优劣论思想在每一个普什图人的内心已经根深蒂固。而这种文化与思想的代代相传只能进一步恶化民族关系,正如阿米尔后来的自我安慰一样,“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逊尼派、什叶派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7]25}。这种偏狭的宗教伦理思想犹如沉重的锁链,紧紧束缚着像哈扎克这样的少数民族,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哈桑们的悲剧已经提前预定了。

塔利班崛起后,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古兰经》中的极端教义进一步强化。《古兰经》对已婚夫妇与他人的通奸行为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可处死刑。“淫妇和奸夫,应各打一百鞭。如果你们信仰安拉和后世,就不要因同情而妨碍对其执行安拉之法,要让一部分信士见证其受刑。”^[11]阿米尔的父亲虽并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他仍然逃脱不了教规的束缚。他与哈桑的母亲莎芭娜通奸后生下哈桑,但是在如此严苛的教规下,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宗教的禁忌,因此在哈桑出生后不久其母亲莎芭娜便选择了逃离,而其父亲为了普什图男人的荣誉,为了逃避违反这种宗教禁忌的惩罚,只能选择牺牲哈桑来保全自己。《灿烂千阳》中扎里勒与佣人娜娜私通生下玛丽雅姆后被迫把她送到乡下的泥屋,这不仅自私和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也表明了他对违背宗教禁忌的恐惧。这两位父亲以牺牲私生子来保全自己而导致孩子的悲剧,也表明了伊斯兰文化中隐匿的道德困境。塔利班当权后,不仅对宗教仪式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还规定男人必须留长须,女人必须戴布卡,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和从事任何工作,禁止女性在没有男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外出,一旦违背了如上禁忌都将遭受严厉的毒打。另外,还

对非穆斯林规定了更加严苛的刑罚,“如果你们被人发现正在拉拢一个穆斯林改信你的宗教,你们将会被处决”^{[12]283}。《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在体育馆就亲眼目睹了一对通奸男女被塔利班用石头砸死。《灿烂千阳》中莱拉带领阿兹莎与玛丽雅姆逃跑时遭遇塔利班,差点被处决,就是塔利班时期宗教极端化的真实反映。胡塞尼以其独到的眼光洞察了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阿富汗民众的苦难,并用负责任的态度书写了现实,暴露了阿富汗现实中的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极端教义对民众的道德束缚与禁锢,表现了作者对阿富汗传统中极端固陋的厌恶与批判,以及对民族矛盾和种族歧视的关注与反思。

三、胡塞尼对家国重建的构想

余华在《活着》自序中曾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13]胡塞尼的书写正是如此,其控诉与揭露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展示人类精神中的高尚的东西,是为了表达他对故国阿富汗重建的构想。

1. 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与邪恶,用宽容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

爱是博大的,它无处不在;爱也是全能的,它可以化解各种仇恨与绝望。在《追风筝的人》中,索拉博是哈桑的儿子,也是阿米尔的亲侄儿;是哈扎克人的小孩,也是普什图人的孙子。阿米尔以舍弃一切的精神在索拉博的帮助下战胜了塔利班分子阿瑟夫,这象征着两种民族融合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种族精神力量。阿米尔历经艰难把自杀的索拉博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又费尽周折把他带回美国并完成所有的收养手续,在他与妻子索拉雅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索拉博最终从自闭症中康复,这也是亲情慰藉和民族融合释放出的强大力量。笔者认为,索拉博实际上是阿富汗的隐喻,当索拉博被收养

后他也因此获得多种混杂糅合的身份,他既是哈扎克人也是普什图人,既是阿富汗人也是美国人,这就使得他具有了多民族多国籍的世界公民身份。在胡塞尼看来,病入膏肓的故国阿富汗要想康复,必须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并融入到大世界主义的大潮中。

在民族歧视、性别歧视与宗教歧视的三重压迫下,苦难深重的阿富汗女性呈集体失语状态,她们不敢反抗更不知如何抗争。《灿烂千阳》中的莱拉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有思想、有理想,也深爱祖国阿富汗,她是阿富汗新女性的代表,也是阿富汗的希望。在被迫嫁给拉希德后,莱拉开始与玛利亚姆不睦,后来在她的努力与宽容下,与玛利亚姆冰释前嫌。随后在她的策划与带领下,她们开始一次次地逃离恶魔般的拉希德,以及魔窟般的家庭与阿富汗。但是她们的逃离一次次失败,表明阿富汗女性的力量在那个特殊语境中是脆弱的,很难实现自我解救。莱拉幼时爱人塔里克的出现给了她强大的精神支撑,她又一次策划带领孩子逃离喀布尔去追寻塔里克,但是不幸泄密,拉希德欲置莱拉于死地,玛利亚姆最终做出了一生中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情,拿起铁锹劈死了拉希德,从死神那里拉回了莱拉,成功地帮助莱拉实现了逃离,而她独自承担了杀夫的罪名,无怨无悔地走上刑场,成为了一个付出过爱也得到过爱的女人。在那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玛丽雅姆与莱拉的融合,象征着阿富汗善良、隐忍的女性自发地团结与融合,她们演绎出的大爱无疆的温情,也为阿富汗女性指明了一条出路。但是,这不是这部小说的全部,小说结尾的时候,莱拉与塔里克在巴基斯坦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难能可贵的是塔里克视拉希德与莱拉的儿子察尔迈伊为己出,而正是这个小孩向父亲出卖了莱拉与塔里克的约会,以及莱拉与玛利亚姆的逃跑计划,由此才导致了玛利亚姆后来的悲剧。这看似淡淡的不经意的叙述,却蕴藏着胡塞尼的深

刻寄托与人文诉求——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与邪恶,用宽容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在巴基斯坦生活一年多后,故国之情难舍,幼时父亲的教导时时在莱拉耳边回响,“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需要你”^{[12]92}。“阿富汗需要你”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阿富汗知识分子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苦难的阿富汗需要她的子女为了拯救她而付出。因此,当战事稍微平静、莱拉身体也逐渐康复、察尔迈伊也与塔里克建立了父子情感后,莱拉决定放弃他在异国他乡的幸福生活,她要回国。在塔里克的支持下,他们回到了当初收养他们女儿的察曼孤儿院,夫妻俩共同努力重建了孤儿院,莱拉当教师,用知识与爱去感化与教导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们。

2. 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融合和宽容是阿富汗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

如上所述,偏狭的宗教伦理与复杂的民族关系是阿富汗陷入混乱和苦难的基本根源。胡塞尼不仅感受到了阿富汗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也在其作品中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灿烂千阳》^{[12]418}中的莱拉曾在教室里张贴阿富汗著名诗人哈菲茨的诗句——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心中风暴中心的指引,请别悲哀

“诺亚方舟”是《圣经》和《古兰经》中均有记载的故事。《圣经·创世纪》记载,造物主耶和华看到地上充满败坏和邪恶行为后计划用洪水消灭人间的罪恶。但他发现诺亚是他的忠实信徒,就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在洪水来临时把他的妻儿以及世间生物雌雄各一对带上方舟。在洪水消退后,诺亚一家人及各类生物回

归陆地,开始了人类和所有生物物种新的繁衍与生存。^[14]《古兰经》与《圣经》的记载大同小异:真主看到人间的罪恶以及对他的不尊,就打算毁灭人类重造生灵,而真主也看到了他的忠实信徒努哈是如何努力把民众引回到崇拜真主的道路上,并告诫他们要戒除各种恶习。当真主打算用洪水洗涤人间罪恶的时候,同样指示努哈建了方舟,在洪水来临时努哈和他的追随者们上了船并在船上安然度过了5个月,那些不信教的都被打碎、毁灭,包括努哈的子孙。“约瑟回返迦南”也是《圣经·创世纪》的故事。约瑟是雅各和拉结的儿子,他从小就敬畏上帝,然而他的哥哥们对上帝却不敬虔,什么坏事都做,连信仰异教的人对他们的恶行都不屑一谈。约瑟不得不把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并因此得罪了他们,后者设计把约瑟卖到了信仰异教的埃及。约瑟在埃及经历了十三年的痛苦熬炼,最后成为统治埃及的宰相。随后,迦南地区爆发饥荒,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就派那些曾陷害过约瑟的哥哥们去购粮,尽管约瑟很愤恨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故地之情与兄弟父子亲情使他放弃了报复,他卖粮给他们并把他们带来的银子偷偷塞在他们行李里,从而拯救了迦南人。雅各死后,约瑟回到迦南参加父亲的丧事,并宽恕了恐惧不安的哥哥们。

胡塞尼在《灿烂千阳》中引用哈菲慈的诗句,借用“诺亚方舟”和“约瑟重返迦南”的故事,不仅表达了宽恕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与和解之后的美好未来,寄托了他对阿富汗的美好祝愿,还从深层意义上将“诺亚方舟”这个故事看作在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中的复叙事,从而使“诺亚方舟”在《圣经》与《古兰经》中都占据重要位置。胡塞尼在此借用这个故事表达的是他对阿富汗重建的寄托,即阿富汗的重建首先要实现宗教上的相互尊重与融合。“约瑟重返迦南”寓意更加深刻,那时的埃及与迦南不仅分属不同的种族,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

约瑟是在家国变乱中被卖,然后经过炼狱般的重塑,约瑟回到迦南送别父亲,是为了寻根也是在确认自己的身份。约瑟出于骨肉亲情宽恕了哥哥们,实现了家庭亲情的融合,但是约瑟还是那时埃及的宰相,代表着埃及这个种族。因此,在胡塞尼看来,只有实现民族、种族的互助、宽恕与融合,才能构建安定和平的社会,这也是他对故国种族矛盾导致国家混乱的思考。

3.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阿富汗重建与复兴的重要推手

封闭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不仅是阿富汗内乱不断的根源,也使其成为各种国际势力利用的工具,再加上境外同族力量的介入,使本来复杂、紧张的阿富汗国内的族群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仅靠自身的力量与努力是不够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胡塞尼,从当今时代的高度为阿富汗的重建与复兴提出了更为现实而全面的解决思路。

《群山回唱》中的希腊外科医生马科斯一直为评论者所忽略。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为苦难的阿富汗人民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机缘巧合,他租住了帕丽养父母的住宅,与帕丽的舅舅纳比结成了跨越国域、民族、宗教的忘年交。正是由于马科斯的不懈努力,帕丽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是在马科斯的帮助下,帕丽才找到了曾经流亡到巴基斯坦而后又逃亡到美国的哥哥阿卜杜拉,实现了身份与亲情的确证。胡塞尼把这样的人物引入叙事中,除基于情节的需要外,还有更深的意图。有一段看似与主题毫无关联也是诸多评论者认为是《群山回唱》故事情节松散的证据的叙事,恰恰隐射了胡塞尼的深刻用心。马科斯在希腊的幼时好友萨莉亚,小时候因为意外被狗咬掉了半张脸,她的一生都是在别人的躲闪与厌恶中度过的,开始她还戴上面纱后来就干脆去掉面纱以一张丑陋的脸面世。马科斯多次劝萨莉亚由他亲自给她做整形手术,但都被萨莉亚决绝地拒绝了。

在阿富汗工作近十年,见证了那么多被毁了的面孔,马科斯对此事进行了反思,也终于理解了萨莉亚的选择,“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莉亚一张脸,她却要花费终身,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8] 347}。胡塞尼在这里表面上讨论的是关于毁伤的脸,而实际上是在讨论苦难的故国阿富汗。故国家园正如那张曾经因为意外被狗啃过的脸一样已经丑陋不堪,充满着战乱、贫困与暴政,但是那里也曾有希望、有温情,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我们不必去刻意粉饰,只有实实在在地展示才能让世界认知阿富汗并逐渐接受阿富汗。《群山回唱》还有一个也被评论者忽略的叙述:阿富汗女孩罗诗因为家族内乱,伯父用斧头劈死了她的全部家人,罗诗侥幸逃生但头颅被却利斧削去了一半。在医院,罗诗命悬一线,毫无经济来源来进行下一步的整颅手术。与马科斯一样来阿富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荷兰女护士阿拉姆,不仅一直陪伴着、保护着罗诗,不让那些无聊好奇的“观光者”像参观动物园一样来观赏罗诗的苦难与苦痛,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与当地的军阀、政客周旋,为罗诗争取手术费用,“我要为她战斗。阿拉姆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8]165}。正在阿拉姆为罗诗殚精竭虑而陷入困境时,帕丽养父母原来的邻居巴希里的儿子伊德里斯与侄儿铁木耳从美国回到阿富汗。他们正如《追风筝的人》里的阿米尔回到故国一样,本以为他们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感受到故国的苦难,然而在故国,人们对他们除了卑劣的崇敬就是冷眼相看甚至冷言相对,完全没有把他们看成阿富汗人,哪怕是与阿富汗有联系的美国人。“故事由人家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8]148}这不仅使他们感到恼火与无助,也使他们感觉到对阿富汗的愧疚,更促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反思:在美国,他们这些逃离者得到了太多,而祖国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须为血脉相连的故国人民、故国的重建尽力。

罗诗后来在铁木尔与阿拉姆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到达了美国并顺利完成了手术而得以康复,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苦难的阿富汗。回到美国后,阿米尔与妻子一起倾其所有并利用一切关系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儿童医院,莱拉与塔里克重建儿童福利院,伊德里斯与铁木尔对罗诗慷慨相助。这样的结局,胡塞尼的用意不言自明:阿富汗的重建与复兴不单是某一个阿富汗人的事情,也不单是阿富汗民族本身的事情,不仅需要阿富汗国内人民的努力,也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帮助。正如帕丽的回归离不开马科斯的帮助一样,他同样需要阿米尔、莱拉、铁木尔这些流散在外的所有阿富汗游子的努力,也需要像马科斯、阿拉姆这样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无私帮助。

四、结语

“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的灵魂叙事者。”^[15]胡塞尼自2003年凭借处女作《追风筝的人》横空出世以来,其作品连续多年处于亚马孙畅销书前列,其魅力固然有其阿富汗主体与悲情叙事的原因在内,但是其作品中丰富的伦理内涵与高度的人文主义情怀、对故国的一往情深,更增加了其作品的厚重与深度。幼时生活在阿富汗,少年随父去欧洲,随后因祖国战乱被迫随家人移民美国并在美国接受了高中、大学教育,这种流亡经历使胡塞尼具有了东、西文化的视野,进而也具有了国际主义的胸怀。几十年战乱已经使阿富汗千疮百孔,胡塞尼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在其作品中从战争伦理、族际关系伦理、宗教伦理多维度地进行展示,从而揭示了阿富汗苦难的根源。国际主义的视野与高度的爱国情怀也促使胡塞尼能深刻地思考阿富汗重建的方式与途径。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深入研究胡塞尼的作品,可以让

民众与当权者审慎地思考如何处理国内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这应该是胡塞尼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BOOTH W C.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27.
- [2]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7.
- [3] 金蓓蕾, 石剑凯. 《群山回唱》的作者胡塞尼: 我不是阿富汗的代言人[EB/OL]. (2015-05-13) [2019-01-03]. <http://cul.qq.com/a/30130527/008929>.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12.
- [5] 何怀宏. 对战争的伦理约束[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5.
- [6] 王铁崖, 朱荔荪, 田如萱, 等. 战争法文献集[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140.
- [7] 胡塞尼. 追风筝的人[M]. 李继宏,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胡塞尼. 群山回唱[M]. 康慨,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9] 蒋颖荣. 族际伦理: 民族关系研究的伦理学视野[J]. 思想战线, 2010(3): 25.
- [10] 曼苏尔. 圣训经[M]. 陈克礼,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11] 古兰经[M]. 马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1.
- [12] 胡塞尼. 灿烂千阳[M]. 李继宏,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余华. 活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3.
- [14] 王人敏. 圣经故事(上)[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36-42.
- [15] 谢有顺. 小说叙事的伦理问题[J]. 小说评论, 2012(5): 24.



引用格式:赵平垣,张秀娟.市场细分理论视角下红色经典油画的创作与收藏[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93-99.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93-07

市场细分理论视角下 红色经典油画的创作与收藏

Creation and collection of red classic oil pai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egmentation

赵平垣, 张秀娟

ZHAO Pingyuan, ZHANG Xiujuan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红色经典油画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强化,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无形的象征意义。目前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对其关注度不够及其市场导向不够精细,导致市场认可和收藏的潮涨潮落。市场细分有助于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的坐标,有助于建立红色经典油画的收藏朋友圈,有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红色油画经典市场信息体系,从而促进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在全球范围内的媒介传播力。

关键词:

红色经典油画;
市场细分;
红色文化;
国家形象

[收稿日期]2019-04-19

[作者简介]赵平垣(1970—),男,甘肃省泾川县人,集美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设计批评与设计理论;张秀娟(1977—),女,安徽省蚌埠市人,集美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与艺术管理。

红色是一种鲜艳的颜色,从物理属性上来说,它是光的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常常与情绪、直觉、感情、生命力紧密相连。在我国,红色更是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百年来中国革命与发展洪流的精神底色。近年来,在建党、建军、建国等重大纪念活动的推动下,红色文化、红色记忆、红色经典等词频频见诸于各种媒体,全国红色产业的创收已过万亿规模,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1]在此背景下,关注红色文化的内涵发展与未来拓展意义重大。目前学界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研究红色文化的价值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体来说,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红色文化价值的深层次内涵、运行机理、客观规律、时代转化等重要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整体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空白地带。此外,由于研究视角单一,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显得不够深刻,理论挖掘更是乏力,学术共识和学术争鸣的现象也尚未形成。^[2]文化传播离不开具体的媒介,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市场领域,我们不难发现:红色经典油画可运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传播方式参与红色文化体系的建构。2009年北京保利推出“红色经典及当代艺术”专场拍卖,总成交额达到3237.36万元;2015年嘉德拍卖中,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以1.84亿元被新疆广汇集团买走,成为当年内地秋拍首件突破亿元大关的拍品。以上诸种现象引发了海内外藏家对于红色文化的关注,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鉴于此,本文拟从市场细分视角,对红色经典油画进行深入挖掘,以拓展红色文化的深层内蕴和发展空间。

一、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形成有助于中国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经典油画是艺术家们利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宏伟画卷的绘画作品的

统称。这类作品基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具有鲜明的红色年代特征。作为红色经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油画在当前艺术品市场中的出色表现,带动了红色收藏文化产业的勃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对中国红色经典油画的关注。红色经典油画具有审美价值、历史资料价值,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强化,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无形的象征意义,具有联通政治的稳定性与不可撼动性。诞生于“文革”期间的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1976年展出后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单品印刷就高达9亿之多,创下了世界油画复制数量之最,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影响力,铸就了统领时代的精神信仰。红色经典油画在更大层面上承接传统,开创时代价值,承载着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公共价值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3]这为红色经典油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红色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是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4],它具有一般意义上文化所具有的普适价值,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产生影响。凭借艺术语言的优势,红色经典油画在西方文化体系中传播红色文化更为便利,这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文化共同体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我国红色经典油画集中创作的历史回顾与收藏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随着国家各项事业步入正轨,美术界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探索也逐步展开。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1951年3月筹备“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为缘起,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筹备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初步展开雕塑、绘画、照相等工作,绘画以油画为主,在开馆以前,应有油画一百件,雕塑一百件”的构想。^[5]此后,还于1958年、1965年、1970年三次组织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组织有规模地持续开展工作,这一延续近20年的专题性创作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产生和保存了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促成了中国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形成。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过程,使得这些美术作品必然担负着鲜明的政治功能,清晰地带有红色年代的艺术特征。可以说,红色题材油画作品的大规模出现,是国家意志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风貌的集中展现,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谈及具体的创作过程,“马训班”的作用不容小觑。1949年之后,中国的艺术领域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展览、派出留学生、举办训练班的形式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具体内容可以阐述为:学习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艺术家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6]451}这种创作宗旨包含着建设崭新社会的热情和积极、健康的乐观精神,使得那个特殊时代的艺术彰显了鲜明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阵营艺术家作品特有的审美特性,其构图原则、人物性格刻画、情节的合理安排,尤其思想主题的健康和崇高性,构成了红色油画创作遵循的普遍原则。苏联艺术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油画进修班,为红色经典油画创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有侯一名、靳尚谊、任梦璋、王流秋、俞云阶、秦征、王德威、高虹等。

1957年进修班结束后,马克西莫夫给中国画家留下了契斯恰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总结文献,该文献对中国油画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画家学习苏联油画艺术——无论他们是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还是接受马克西莫夫的指导——成为1950—1970年代中国艺术历史中的重要部分,并在中国主要美术学院的教学建设中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苏式教育体系。^{[6]459}这个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有王流秋的《转移》、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们》、秦征的《家》、侯一民的《青年地下工作者》、冯法祀的《刘胡兰》等,这些作品构成了中国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早期阵容。与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油画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的油画作品塑造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紧密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理性的创作中宣扬了爱国主义激情和社会道德典范,收到了直接的政治宣传和艺术感化效果。

1949年之后,我国画家受“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影响,普遍采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表现现实,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1950年1月17日,南京成立革命历史创作委员会,同年就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主要作品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参军》、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艾中信的《1920年毛主席组织的马克思小组》、夏同光的《南昌起义》、周令钊的《鸦片战争》等。1951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组织了历史画的创作。时代呼唤歌颂新政权、新历史的艺术作品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作品有1951年罗工柳的《地道战》、1953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9年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61年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1961年艾中信的《夜渡黄河》等。

1957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参加展览的是由400多位画家在18个月

内完成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绘画,其中有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这些作品在“现实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并据此对作品内容 and 表现手法进行了取舍,展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双重光辉。这一时期的红色油画作品共同构成了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绘画文献。

1951年7月至1958年8月,“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历经多次内部试展和修改,相应地,美术作品的创作和征集也一直在延续,博物馆的美术收藏得到了扩充。值得关注的是,在作品征集过程中,同一或同类作品题材邀请不同人员进行创作,最后最能表现中国共产党30年奋斗历史进程、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并适合展览要求的作品被选中。1951年6月完成作品112件,经审查评选,其中的40件作品选用展览,另有48件作品需继续修改。到1956年12月,征集的美术作品已达290件。

我国红色经典油画创作的集中性和定向性,使得大部分作品被博物馆永久收藏,因此进入市场流通的作品数量十分有限。如何利用市场的作用,充分挖掘红色经典油画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的文化影响力,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市场细分理论的引入,可为红色经典油画更好地发展另辟蹊径。

三、市场细分对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作用分析

市场细分理论隶属营销领域,由细分市场、产品定位、选择目标市场三个部分组成。1956年,美国学者温德尔·史密斯首次提出“市场细分”概念,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不断完善。市场细分的本质是将趋同消费

者在市场环境中进行聚合,明确目标消费人群。该理论提出的目的在于:根据市场细分的结果,构建现代营销体系,以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未来的艺术品市场,细分与差别是大势所趋。拍卖行不断开发新的品种作为专场即是最好的证明。例如,2004年,中国嘉德“中国西画及雕塑”专场的推出,开启了中国红色经典艺术品市场的序幕。2005年,北京华辰秋拍中“1938—1991:历史的主题”专场,成交额达2313.3万元,带来了红色经典的旋风效应。2015年嘉德、保利重点推出汇集早期油画精英的作品专场;苏富比北京春拍首推“二十世纪大师精品”专场,总成交额达4048万元,成交率达到90%以上。个人或产品的成功并非取决于机遇或运气,而是取决于正确的定位。这不仅意味着物理定位和同国际当代艺术的地理中心保持联系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价格的定位,这关系到市场细分的成功与否。^{[7]54}市场细分对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市场细分有助于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的坐标

在商品经济的个案史上,艺术品拥有诸多特质,红色经典油画也不例外。其一,艺术品可以多次使用且可长年存放。其二,作为一种价值贮藏方式,艺术品适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在通货膨胀中可充当保值品。这是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为自身的价值,更由于其具有不可复制性、稀缺性,在市场中具有垄断商品地位,从而使自身具有保值或升值的功能。其三,艺术品作为一种奢侈品,能够体现购买其他商品无法表达的高雅品位与文化精英归属,是社会声望的来源之一。红色经典油画在兼具以上特质的同时,更多地凸显出烙上时代印记的无形价值。红色经典油画具有无可比拟的图像记载功能,它能以其逼真的艺术表现方式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风情,成为

记载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媒介,能让欣赏者在红色文化氛围中汲取曾经滋养过几代人的精神食粮。如果将红色经典油画提升至中华民族特殊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的高度,那么红色经典油画所蕴含的无形价值不可估量。置身于艺术品市场中的红色经典油画源于商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共融,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满足某种特殊需求的价值,这些事关艺术品的无形价值,是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坐标的前提。

从水平市场角度看,艺术品市场可细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以画廊为主,艺术品一般为初次进入市场。当已面世的艺术品再次进行交换时,以拍卖为主的二级市场便开始形成,而红色经典油画市场交易以二级市场为主。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建立依托于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平台搭建。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当属一、二级市场的不平衡与位置的倒错。健康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其交易规律往往是一级市场中收藏者或经销商直接向艺术家购买艺术品,二级市场中个体通过拍卖行的中介进行艺术品交易,在从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跨越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声誉和艺术品的价值往往会随之提升。如果忽视了这样的交易规律,会生出各种隐患。从宏观层面来说,拍卖行作为二级市场的主力难以承担一人独大的角色,消化不良会随时影响整个艺术品的生态系统;从微观层面来说,拍卖行作为艺术品供给市场的核心主力,无法满足整个市场庞大身躯运动所需的能量,常常导致艺术品市场中其他成员的营养不良,从而影响整体前行的节奏。从垂直市场角度看,根据提供产品的性质、市场的地理范围和价格幅度等,艺术品市场可细分为当代经典市场、先锋市场、另类市场和旧货市场。在以瓷器和书画为主导的我国艺术品市场中,红色经典油画往往以小众面目出现,但由于其具有无形价值的特质,我们将红色经典油画置于当代经典市场和另类市

场的双重分类之中。这种分类一方面兼顾艺术品市场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试图表现国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结构失衡问题。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在其论著《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8]。对红色经典油画进行市场细分,是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坐标的重要前提。

2. 市场细分有助于建立红色经典油画的收藏朋友圈

红色经典油画目前的收藏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藏者自身纯粹出于对艺术品本身的热爱。这类藏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鉴赏水平,喜好购买和收藏,但不愿出售。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红色经典油画作品自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在于特殊年代诞生的艺术品承载着特有的成长记忆和情感皈依。加之大部分作品被国内博物馆收藏,流入市场的数量不多,因此这类收藏家一旦拥有作品,都不愿再次出售。另一类是出于彰显身份或追求升值回报的收藏者,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藏品获得投资利润。出于对升值空间和利益回报的追求,在市场价格攀升的诱惑下,转入红色经典油画收藏行列的藏家对藏品回报率的期待较高。目前全球当代艺术品市场中油画作品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油画市场的持续性与活跃性可以根据拍卖总收益来衡量。近年来,伴随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异军突起,全球实力雄厚的收藏者,开始将兴趣从欧洲艺术品转向美国或中国的写实油画,对中国红色经典油画更是情有独钟。尽管有学者^[9]撰文指出,中国艺术品市场进入红色狂欢时代,但总体而言,我国红色经典油画的上拍量和成交额都不高,这与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并不相称。

目前,我国艺术品的消费潜力主要集中在高净值人群中。高净值人群是当代艺术品市场的潜在客户。从数量和整体财富上分析高净值人群的演变,对于评估艺术品市场的消费潜能至关重要。从招商银行联手贝恩公司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可以看出,虽然“创富一代”仍是高净值人群的主要来源,但比例已经从2009年的70%降为41%;而职业金领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来源,比例从2009年的12%提升到2017年的29%。《诺亚2017高端财富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高净值人士已占到8%,45岁以下的高净值人士占比超过50%。因此,提升高净值人群对红色经典油画的认知和审美需求,是确立红色经典油画目标定位的内在诉求。以中国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为例,她是高净值人群的代表,同时也是国内红色经典油画收藏的重量级人物。2003年,她拍下了吴冠中1970年代的作品《爱晚亭》和张洪祥的作品《艰苦岁月》。2009年,在北京保利的尤伦斯夫妇收藏专场,王薇以4043万元争得陈逸飞的作品《踱步》,创造了陈逸飞作品当年的成交纪录,成为她个人收藏中最贵重的一幅红色经典油画。另外,她以795万元在中国嘉德拍卖购入沈嘉蔚的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亦属红色经典油画精品。同年年底,王薇将她的近100件红色经典收藏拿出,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目前,上海浦东馆的第二、第三展厅的“红色经典”、“1949—2019: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馆藏展”均为常设展。2019年伊始,中国上海龙美术馆对外免费开放。王薇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观众能走进美术馆看展,将艺术融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目前,中国上海龙美术馆在精准定位的前提下,协同社会各方力量已形成了立体的收藏体系,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不断扩大红色经典油画收藏的朋友圈。

3. 市场细分有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红色油画经典市场信息体系

考察一般艺术家进入市场的途径,通常是经过艺术品经销商、代理商、拍卖行,市场的供给从区域市场到国内市场再到国际市场这样一个不断拓展的层级递增轨迹,收藏的层次从小型收藏到国家博物馆再到拍卖行与知名博物馆不断提升。而与国际当代艺术地理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会使得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得到较大提升。在Artprice(2011—2012)公布的拍卖成交额位居前十位的当代油画家中,有5名中国画家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陈逸飞、曾梵志、周春芽、何家英、张晓刚。以陈逸飞为例,他被美国艺术品市场选中,作为国际当代艺术品市场推崇和支持的对象,被重要的文化机构赏识并获得认同,其作品《黄河颂》2007年在中国嘉德的拍卖会上以4032万元的天价成交,而在199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仅为128万港元,两相对比,价格上涨30多倍,这让多数藏家热血沸腾。而陈逸飞红色经典绘画价格的狂飙,也带来了国内艺术品市场出现以价格作为品质风向标的收藏导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潜在买家不具备或是缺乏相关知识的认知,对相关信息储备呈匮乏状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收藏者往往会以价格作为替代信息来完成对艺术品品质的合理估算。这样一来,收藏者的行为从起点上就违背了经济学理论中的需求定律,也即是说当买家以价格来判断艺术品的品质时,其所得出的供求情况并不可靠。如果艺术品的价格下降,那么他就会决定减少需求量,因为预期品质的损失无法用强烈的购买动机来弥补。因此,收藏者的反常行为给中国红色油画市场带来的影响,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正像有学者^{[7]76}所指出的,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反常的需求行为可能会完全排除稳定均衡和稳定失衡的可能性。而市场细分对于红色经

典油画的市场发展可起到精微而有效的导引作用。

以市场有效调节为前提,建立红色油画经典的市场信息体系,我们需要关注艺术工作的地理区域与艺术研究的历史时期两个因素。红色经典油画创作的地理区域以前主要集中在中央美院、现在主要集中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红色经典油画创作的时间跨度很大,其中部分创作主力在作品集中出现之后的创作亦未停止,如用一生画长征的沈尧伊。诸如此类情况也需考虑在内。例如,鲁迅艺术学院自1980年代进行的同类题材的创作扩充了红色经典系列的阵容。基于扩大外延的需要,艺术家要做的是坚持创作的可持续性、艺术品管理的正规性、工作室报价的合理性,坚持出席国内外展览。

艺术品保真是定义这一细分市场的另一重保证。只有当经销商从审美的角度评介一件艺术品时,才能获得符合相应阶层需求的艺术品价格。在这一细分市场中,艺术品经销商拥有获取信息的能力,在购买艺术品时会首先考虑产品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会受到潜在买家的评估与鉴定,这是艺术品自身价值的一部分,对市场风向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建立市场信息体系,对信息分布与整体结构进行及时调整和准确把握,对艺术品交易梯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艺术品数量的扩大与个人收藏能力的提升,是社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拥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和市场目标后,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便可在微观和宏观共同作用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资源配置,并以专业化、职业化的价值追求作为最终目标,从而避免过多人为因素对其发展状态的

干涉。

综上所述,对红色经典油画进行市场细分,对于促进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将对艺术市场起到精细化的规范和导向作用,为从深层次探索红色文化的运行机制、客观规律与时代意义提供一种可资考察的经济范本;其二,借助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能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全面升级,从而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在全球范围内的媒介传播力,助力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李光. 解密大陆红色文化产业链[J]. 凤凰周刊,2013(6):20.
- [2] 欧阳秀敏. 红色文化价值的研究综述及展望[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7(6):72.
- [3]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5-10-14)[2019-04- -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7.
- [4] 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记录[D]. 档案号195003600804000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5] 吕澎. 20世纪中国艺术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 左罗妮. 当代艺术经济学:市场、策略与参与[M]. 管理,译.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 [7]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19.
- [8] 杨育谋. 中国油画的红色狂欢[J]. 民族论坛,2011(5):66



引用格式:杨俊峰. 基于 TRIZ 的钧瓷器型和釉的演化趋势分析与案例解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100 - 108.

中图分类号:TQ1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100-09

基于 TRIZ 的钧瓷器型和釉的演化趋势分析与案例解析

Evolutionary trend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of shape and glaze of Jun porcelain based on TRIZ

杨俊峰

YANG Junfeng

禹州市金丰钧窑, 河南 禹州 461670

关键词:

钧瓷;
器型;
分相釉;
呈色机理;
TRIZ

摘要:将 TRIZ 理论引入传统的钧窑领域,用于钧瓷技术、艺术的创新,研究发现:钧瓷在器型方面遵循着曲面化、协调化、多样化、人性化、精细化、高效化等演化趋势;在钧瓷釉色及其机理方面呈现出釉料由高集成转向简约、窑变从不可控到可控、降低成本与循环利用等发展趋势。实例分析表明:“不足”或“超额”行动是最有价值的发明原理,其次是“分割”。

[收稿日期] 2018 - 11 - 22

[作者简介] 杨俊峰(1952—),男,河南省禹州市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主要研究方向:钧瓷艺术发展。

钧瓷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瓷之一,以铜化合物做着色剂,其外观色彩斑斓,湖光山色、云霞雾霭、花鸟虫鱼等变化丰富多彩,釉色莹润,五彩缤纷,可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在中国陶瓷界占据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钧瓷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窑口星罗棋布,新品叠出,多次入选国礼,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

钧瓷以型为体、以釉色为魂;型为釉的形成和釉色的充分展现提供了载体和基础;釉因型而生,并为形进行美化与包装。两者不可分割、相得益彰,堪称佳偶天成。但长期以来,钧瓷的创新发展依赖于传统的形象思维的创造,这在钧瓷器型的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目前钧瓷行业在产品创作与生产经营等方面不容乐观。由于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产品造型虽然从品种、类别的数量上已经颇为可观,但创新器型主要集中在行业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大部分企业因为规模小,无力负担昂贵的开发费用,以致传统器型泛滥,仿制现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价格战造成钧瓷市场的混乱,也影响了钧瓷的形象及其未来发展。钧瓷釉的创新发展依然是基于传统的“试错法”,对烧制过程中钧瓷釉的呈色规律探讨不够、研究不透,也限制了钧瓷釉的发展。由此可见,钧瓷的创新发展亟待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来引领。TRIZ(萃思,俄文 Teorijz Rezhenija Izobretatel' skich Zadach 的缩写)是研究发明创新规律的理论与方法,被誉为“科技界的圣经”,成功揭示了创造发明的内在规律和原理,有助于快速确认和解决系统存在的矛盾,从而助推发明创新。TRIZ 已在机械、管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正在向微电子和广告设计^[1-2]等领域扩展,但其与钧瓷相关领域的结合研究尚属空白。鉴于此,本文拟

将 TRIZ 引入钧瓷的创新研究之中,用 TRIZ 理论去分析解决钧瓷行业面临的创新问题,以期对钧瓷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一、TRIZ 理论与方法简介

TRIZ 传统的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在工程设计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TRIZ 理论的运用不断扩展。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正在挖掘其应用潜力。与传统靠形象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相比,TRIZ 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基于工程技术的发展规律来探讨解决创新问题的。TRIZ 理论认为,技术系统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模式,是可以预测的。这种以逻辑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采用系统化方法,通过给定问题解的约束边界,继而开展定向搜索,不断缩小搜索空间,直到寻找到创新问题的最优解的求解过程,叫“技术预测”。传统创造性思维方法与 TRIZ 的求解模式的对比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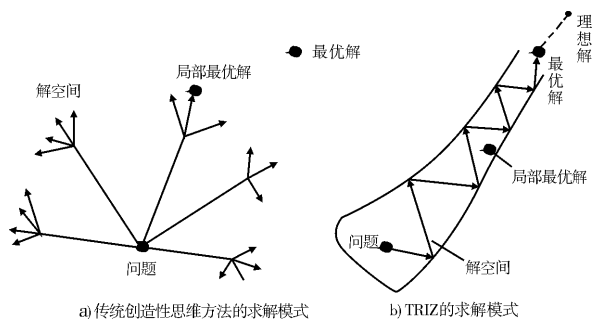


图 1 传统创造性思维方法与 TRIZ 的求解模式对比

技术进化理论是 TRIZ 的核心理论之一,其主要观点是发现并确认了技术系统在结构上的进化趋势,即技术系统进化模式与技术进化路线。该理论不仅能预测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能展现用预测技术实现产品的可能状态,对于产品创新具有指导作用。TRIZ 的技术进化理论的研究结果有多个版本,本文只列出 A.

Zusman 等的直接进化理论(DE, Directed Evaluation 的缩写),该理论有如下 8 种进化模式^[3]:

模式一:技术系统的 S 曲线进化法则。技术系统的成长一般经历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

模式二:提高理想度法则。

模式三:子系统的不均衡进化法则。

模式四:动态性和可控性进化法则。

模式五:增加集成度再进行化简的法则。

模式六:子系统协调进化法则。

模式七:向微观级和增加场应用的进化法则。

模式八:减少人工介入的进化法则。

冲突就是辩证法中所指的矛盾,TRIZ 获得创新解的过程就是解决设计中工程冲突的过程。工程冲突分为技术冲突、物理冲突和管理冲突三类,传统 TRIZ 主要解决前两种冲突,对于管理冲突目前才逐渐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探讨。

技术冲突是指系统在一个方面得到改进时却削弱了另一方面的期望。一般表现为两个子系统的冲突,即在一个子系统中引入或增大有益功能或者减小有害功能的影响,均会导致另一子系统或整个系统的恶化。

TRIZ 解决技术冲突的工具是冲突矩阵,而构成冲突矩阵的主要内容是 TRIZ 的两大理论成果:发明原理和通用工程参数^[3]。其中,发明原理是 Altshuller 通过对大量的专利进行深入研究而总结出的 40 个发明原理(见表 1)。通过运用发明原理,可大幅提高发明效率,使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获得突破性解决。TRIZ 总结的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见表 2)是一些物理、几何和技术性能参数。在问题的定义、分析过程中,常选择 39 个工程参数中合适的参数来表

表 1 40 个发明原理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分割	21	紧急行动
2	抽取	22	变害为利
3	局部质量	23	反馈
4	非对称	24	中介勿
5	合并	25	自服务
6	普遍性	26	复制
7	嵌套	27	一次性用品
8	配重	28	机械系统的替代
9	预先反作用	29	气体与液压结构
10	预先作用	30	柔性外壳或薄膜
11	预先应急措施	31	多孔材料
12	等势原则	32	改变颜色
13	逆向思维	33	同质性
14	曲面化	34	抛弃与再生
15	动态化	35	物理/化学状态转变
16	不足或超额行动	36	相变
17	一维变多维	37	热膨胀
18	机械振动	38	加速氧化
19	周期性动作	39	惰性环境
20	有效作用的连续性	40	复合材料

表 2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运动物体的重量	21	功率
2	静止物体的重量	22	能量损失
3	运动物体的长度	23	物质损失
4	静止物体的长度	24	信息损失
5	运动物体的面积	25	时间损失
6	静止物体的面积	26	物质或事物的数量
7	运动物体的体积	27	可靠性
8	静止物体的体积	28	测试精度
9	速度	29	制造精度
10	力	30	物体外部有害因素的敏感性
11	应力或压力	31	物体产生的有害因素
12	形状	32	可制造性
13	结构的稳定性	33	可操作性
14	强度	34	可维护性
15	运动物体作用时间	35	适应性性与多用途性
16	静止物体作用时间	36	装置的复杂性
17	温度	37	监控与测试的困难程度
18	光照强度	38	自动化程度
19	运动物体的能量	39	生产率
20	静止物体的能量		

述系统的性能,将一个普通、具体的问题用 TRIZ 的通用语言表述出来,其目的是将技术系统的性能用参数的形式来表述,用参数的变化来度量技术系统性能的改变,为构建冲突矩阵做好铺垫。冲突矩阵中的第一行和第一列分别代表需要改进的 39 个技术参数和日益恶化的 39 个技术参数,而在行与列的交叉处表面构成的是技术冲突和推荐的发明原理序列号。

物理冲突是产品设计中某一部分同时表现出的两种相反状态。例如,在机械设计中,如果想增加一个零件的强度就会增加该零件的尺寸或质量,而尺寸与质量的增加往往又是设计者不希望出现的,这就是设计中的物理冲突。分离原理是解决物理冲突的发明原理,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空间分离、时间分离、基于条件的分离、整体与部分分离四个部分。

钧瓷作为商品,需要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来吸引新顾客、留住老顾客。因此,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快速实现产品的创新设计,已成为钧瓷企业成功乃至生存的关键。产品设计是从市场需求开始到求得产品详细理解的求解过程。对于产品设计过程来说,从设计任务角度出发,可以把它分为需求获取、产品规划、概念设计、技术设计和详细设计五个环节。在这五个环节中,产品的概念设计是最重要、最复杂,同时又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环节。因此,产品的概念设计环节是产品创新性的关键环节。概念设计中传统的创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头脑风暴法。头脑风暴法分为两步,即想法的产生和想法的过滤。二是试错法。作为现今应用最广泛的问题解决方法,试错法是设计人员根据已有的产品与以往的设计经验提出新的设计方案,并通过不断尝试、修改获得最终的满意解。这两种传统的靠形象思维解决问题

的设计方法的共同缺点是效率低下,所以将 TRIZ 理论引入钧瓷的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钧瓷器型和釉色的 TRIZ 演化分析

钧瓷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经朝代更迭与审美变换,各个时期的钧瓷均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从 TRIZ 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过程可视为钧瓷的演化过程。

1. 钧瓷器型的演化分析

产品外形的美学功能是产品外部形态通过人们视觉感受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人们对于美学功能越来越高的追求与个性化需求导致产品设计形态的逐渐多样化。产品形态美已经成为产品风格和形式的核心,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 and 市场表现。设计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提高产品内部的各种技术性能,还必须设计出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产品形态。因此,研究人们审美过程中的心理特征与产品形态美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在审美过程中,由产品形态设计所显示出来的心理特征包括力感、通感、个性、联想等^[4]。其中,力感是指在产品的形态设计中注重力的表现,使形态生动、有力,给人一种扩张的气势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从而达到吸引消费者视线并激发其购买欲望的目的。形态的美学规律主要包括:①统一与变化;②对比与调和;③均齐与平衡;④节奏与韵律;⑤过渡与呼应;⑥主从与重点;⑦比例与尺度。^[4]这 7 个方面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产品形态美的具体内容。

传统钧瓷器型以瓶、炉、尊、洗、盆、钵、壶等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钧瓷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钧瓷造型艺术在传承经典中兼收并蓄、开拓创新,既广泛吸取国内其他瓷种的表现手法,又融合西方美学理念,使得这一时期的钧瓷造型既有在传统器型上增加饰物的改良,又有人物、动物等异形件、壁挂、摆件等创新造型,大大拓宽了钧瓷器型的范围。钧瓷的器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①日用器件及其变形,包括瓶、炉、尊、洗、盆、钵、壶及在其基础上的再创造;②人物和动物,包括拟物类、抽象夸张类造型(以韩美林大师钧瓷作品为代表);③平面类器物,如壁挂、挂盘和瓷板画。由于第一类器型占钧瓷器型中的绝大多数,因此,下面就以第一类器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日用器件及其变形又可以分为主体和饰物两部分,如经典造型双龙瓶(见图2),两条作为饰物的龙口咬瓶嘴,纤细的龙身搭配作为主体的瓶身,显得张力十足,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由此可见,饰物在造型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

钧瓷日用器件的主体部分可以认为是各种



图2 钧窑双龙瓶

体——长方体、圆球、圆柱、圆锥等——的变形与组合。主体部分轮廓多为曲线,柔和圆润、富于变化,体现了美感,同时也是客观制作条件的反映,比如历史上坯体的制作以手拉坯为主。当然,也有部分钧瓷创作为追求个性采用了棱角分明的造型,但烧制时候的热应力会给烧成质量带来严峻挑战。总体上说,钧瓷主体的造型多以曲面化为规则。

相比于主体,饰物的选择范围更大,也显得更为活跃。例如,钧瓷口沿部作为辅首装饰常用的龙、凤、鱼、虫等物品,旋纹瓶与某些茶具上用到的旋纹装饰、汉风尊、龙纹尊等,在器物局部不施釉处采取的是浅浮雕方法,在釉面浅色处采用的是图画与不施釉处浮雕相结合的方法。

综合钧瓷器型的分析,以人的审美与产品形态的美学规律为边界条件,并结合TRIZ的进化模式和产品外形的进化模式^[5],可总结得到钧瓷器型未来的演化趋势如下:

趋势一:曲面化。指外形设计中多采用曲线和曲面,而避免出现棱角分明的直线和平面。

趋势二:协调化。这里的“协调”既指主体与饰物尺寸上的协调,也指饰物在主体上的位置、风格和数量的协调。比如在风格上,虎头瓶的瓶身上粗下细,显得威武端庄,如果模仿双龙瓶,配以虎的轮廓造型在两边就显得太纤细,无法体现不怒自威的气势。此外,在饰物之间也要注意协调。比如,不同的饰物之间要注意风格一致,摆放位置合理,避免因为饰物的乱用或滥用而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趋势三:多样化。这既包括产品设计时融入不同的风格,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风格或者如服装、汽车等其他领域的外形风格和理念,进行的多样化设计,也包括考虑性别、年龄、职

业、性格爱好等方面因素而进行的多样化设计。

趋势四:人性化。以人为中心来设计作品,全面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钧瓷绝大部分的功能集中在观赏性上,形体的线条配合华丽的釉色能给人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感。但随着钧瓷中如茶具、酒具这些功能化产品的走俏,设计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和人—机关系的产品显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考虑左撇子的使用习惯去设计作品,考虑个人饮茶与快节奏生活而设计的快客杯(见图3)等。

趋势五:精细化。作为北方瓷的代表,钧瓷具有浑厚古朴的特点,胎质较厚。但考虑人们携带时的方便以及南方窑变釉产品带来的冲击,提高工艺水平、凝练器型已成为钧瓷势不可挡的发展方向。

趋势六:高效化。器型的设计和制作,在经历了手工设计与制造的漫长、低效率过程之后,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的广泛应用,为钧瓷造型数字化和效率提升提供了一条途径。然而,应用层面提高效率是有限的。将钧瓷器型完全数字化,并建成标准化数据库以方便设计时随时调用生成概念解,将会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如果能解决面临的若干难题,快速成型技术也将大大提升坯体的生产效率。



图3 钧窑快客杯

2. 钧瓷釉色及其机理的演化趋势

釉是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釉层的厚度一般为 $200 \sim 800 \mu\text{m}$ 。釉层是由矿物原料(长石、石英、滑石、高岭土等)粉和特定化工原料按一定比例配制(部分原料可先制成熔块),经过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通过煅烧而成^[6]。釉的组成及其性质,与硅酸盐玻璃类似,由近程有序、远程无序的微粒状非晶态结构组成。釉只能依附于陶瓷坯体表面而存在。在釉层中, SiO_2 和 B_2O_3 等氧化物一般被称为玻璃相的“网络形成体”。长石、方解石、滑石等低熔点矿物原料中的金属氧化物如 K_2O 、 Na_2O 、 CaO 、 MgO 等称为“网络修饰体”。此外,还要用 Al_2O_3 这种性质稳定的“网络形成剂”来控制玻璃相的形成。

钧釉属于分相釉,即在烧制时会分离成两种不同成分而又互补混溶的共存液相,其中一相以孤立液滴形式分散于另一连续相中。这种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该组成中的磷含量较高,硅铝比也比其他透明釉高。宋元时期的钧釉,其连续相成分为富 SiO_2 ,孤立相成分为富 CaO 和富 MgO 。

“乳光”效果和“窑变”现象通常被认为是钧瓷釉色异彩纷呈的主要原因。乳光是指釉面具有柔和的光泽和优雅的玉质感,同时又具有不透明的乳浊状态。钧釉之所以会有乳光效果,是因为钧釉属液—液分相釉的缘故。窑变现象是指钧釉在高温下熔融流动,通过烧制过程使釉色偏离其本色而变得绚丽多彩,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美感。

颜色是由光照而引起的人类眼睛的一种生理感觉。显色分为化学色和物理色。化学色是由色剂(色素、颜料)产生的颜色,其显色的原理是:当其原子或离子被激发后,原子核外的电

子因为能级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跃迁,如果该电子跃迁所需的能量正好是可见光区域内的光子所具有的能量,就能选择性地吸收各种可见光,从而产生不同的颜色。自然界中大部分的颜色为化学色。物理色又称结构色,是由物质内部的微观结构对可见光进行选择反射、透射、散射或衍射而呈现出的颜色,不含任何着色化学元素。与化学色相比,结构色对光线的作用更为敏感,多具随角异色性或虹彩性。常见的结构色有鸟类羽翅、蛋白石、甲虫体壁表面等的色彩。一般认为,自然界的结构色来源于几种光学效应中的一种或其组合产生的结果,这些光学效应包括单层或多层薄膜的干涉效应、表面衍射光栅效应、光子晶体或体衍射光栅(具有光子带隙的材料)效应、光线的散射效应。

钧釉的呈色是结构呈色与化学呈色共同作用的结果^[7]。钧瓷釉中的微小粒子有发生瑞利散射产生蓝色的可能,较大粒子也有发生米散射形成乳浊效果的可能。钧釉中也发现了孤立液滴形成的类蛋白石结构^[8-10]和连通状液滴形成的类反金刚石结构。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结构色本身是微弱的。瓷釉中的结构色类型基本上可用分相结构色来概括,主要源于釉中的分相结构(包括液—液分相与气—液分相)。在分相结构中,气—液两相的结构色甚至比液—液两相更明显。此外,由钧釉中多层膜的干涉作用而引起的结构色也可能存在。

钧釉分相结构是由釉中对分相起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的两类氧化物之间的正确比率决定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 P_2O_5/Al_2O_3 (或 $(P_2O_5 + TiO_2)/Al_2O_3$), 低的 Al_2O_3 含量 ($< 10\%$) 和高的 SiO_2/Al_2O_3 含量 (> 12) 是获得良好窑变效果的关键因素^[11]。

以铁呈色的蓝釉和以铜呈色的红釉是钧釉

的两大代表性系列,由于这两种颜色都偏紫,称为紫蓝与紫红更合适。在这两种釉色的基础上可以变幻出许多釉色来,如月白、天青、鹦鸽绿都是从天蓝釉中变幻出来的;海棠红、茄皮紫、玫瑰紫、丁香紫都是从铜红釉衍化而来的。此外,钧瓷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施釉方式或组合来创造绚丽多彩的变化。钧瓷施釉,有浸、涮、涂、喷等方式。浸就是将素坯全部置于釉浆之中,然后提出来;涮,就是把釉浆倒进素坯的容器内,在内部涮匀后再倒出来;涂,就是用毛刷等蘸上釉浆,在素坯上涂抹。

以铁呈色的蓝釉色泽的深浅与铁含量多少、骨灰量、温度高低、胎色深浅、还原气氛强弱、釉层厚薄和施釉方法等因素有关,而以铜呈色的红釉色泽的深浅则与铁、骨灰、石膏含量和温度高低等因素有关^[12]。由此可见,影响钧瓷釉色的因素是复杂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钧瓷釉色呈色机理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单因素到多因素、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作为千年传承的古老工艺,钧瓷既面临着创新与发展,也要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钧瓷釉的演化趋势或发展方向。

趋势一:釉料由高集成转向简约。古代钧窑工匠在釉中引入铜元素,创造了铜红色,相当于是增加了传统釉色的集成度,而引入更多的金属元素创造更多彩的釉色相当于进一步增加了钧釉这个系统的集成度。然而物极必反,过分引入其他元素势必会加剧钧釉的复杂程度,也将增加釉料的成本。因此,引入其他元素之后寻找相应的替代呈色,将成为钧瓷釉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趋势二:窑变从不可控到可控。窑变作为钧瓷生产的一大特点,使得釉色千变万化、美不

胜收。但过多地变化也限制了其应用范围,长期使其使用主要集中于观赏瓷(花盆、花瓶、摆件、寺内陈设等)之列。较高的生产成本和过于绚烂的釉色将会使其远离日用瓷(餐具、茶具等)这个广阔的市场。窑变本是一种不可控现象。但研究钧瓷釉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其变化的科学规律,并加以利用。如果将这种规律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且用到需要窑变的地方,将会收到物尽其用的效果。

趋势三:降低成本。钧瓷的烧制温度在 1300°C 左右。高的烧制温度背后是高的制造成本,如何降低成本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如果采用某种物质替代钧瓷釉中熔点高的物质,将会有效降低烧成温度,如采用 $\text{Ca}_3(\text{PO}_4)_2$ 替代骨灰。此外,研发快速烧成釉也会大大提高钧瓷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趋势四:循环利用。陶瓷釉用原料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众多尾矿和矿渣的堆积排放对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如何变废为宝、用在传统陶瓷行业,将会有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利用铁矿渣替代传统着色剂,可制备出分相花釉和黑釉^[13-14],这为钧瓷釉料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有益思路。

三、用 TRIZ 方法解决钧瓷造型设计中的冲突实例与结论

1. 钧瓷造型设计中的冲突解决实例

如前所述,在产品设计中,力感强的作品显得更加生动。例如,垂直的形体会产生一种向上的动感,更适合男性使用者。但垂直且有棱角的形体在烧制过程中容易出现变形,这一缺陷严重影响烧制钧瓷的成品率。下面我们尝试用 TRIZ 的冲突矩阵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照 39 个工程参数来描述问题,欲改善的

参数是 35——适应性与多用性,恶化的参数是 32——可制造性。查找冲突矩阵,得到方格中推荐的发明原理序号共有 4 个,分别为 1、15、16、34。与发明原理对照,可得到详细内容,依次是:(1) 1——分割;(2) 15——动态化;(3) 16——不足或超额行动;(4) 34——抛弃与再生。

发明原理分析:(1) 1——分割,将形体进行分割,可以做成组合结构,从而减小单件烧制时的变形;(2) 15——动态化,提前进行烧制时的应力分析,动态调整烧制时的位置,防止变形过大;(3) 16——不足或超额行动,对于垂直平面,可将一边直线适度曲线化,对棱角部分可进行倒圆角处理,尽量减少烧制时的应力;(4) 34——抛弃与再生,此方案对解决问题无贡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不足”或“超额”行动是最有价值的发明原理,其次是“分割”。

2. 结论

将 TRIZ 中的进化理论和冲突解决方法引入钧瓷的器型和釉的创新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在对钧瓷器型的演化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得到了曲面化、协调化、多样化、人性化、精细化、高效化 6 种演化趋势;

(2) 在对钧瓷釉色及其机理的演化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得到了釉料由高集成转向简约、窑变从不可控到可控、降低成本、循环利用 4 种演化趋势;

(3) 利用 TRIZ 的冲突矩阵,实例给出了钧瓷造型设计中冲突的解决方法,得出了“不足”或“超额”行动是最有价值的解决方法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张东生,徐曼,袁媛. 基于 TRIZ 的管理创新方

- 法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5(S1):264.
- [2] 李曠. TRIZ 与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人才培养[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3(4):23.
- [3] 杨清亮. 发明是这样诞生的:TRIZ 理论全接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63-115.
- [4] 刘国余. 产品设计[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23-45.
- [5] 赵瑾. 基于 TRIZ 进化理论的外形创新设计系统研究[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006.
- [6] 李家驹. 陶瓷工艺学[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151-165.
- [7] 王芬, 杨长安, 苗建民, 等. 钧瓷釉与乳光、窑变及结构色[J]. 中国陶瓷, 2015(5):1.
- [8] 陈显求, 黄瑞福, 陈士萍, 等. 河南钧窑古瓷的结构特征及其两类物相分离的确证[J]. 硅酸盐学报, 1981(3):245.
- [9] 温昶. 钧官瓷断代和不同时期刘家门窑钧瓷的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 2010.
- [10] KINGERY W D, VANDIVER P B. Glaze structur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ight: An example of Song Dynasty Jun ware [J]. The Studio Potter, 1986(2):23.
- [11] 刘凯民. 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M]//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中国古陶瓷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239-241.
- [12] 郭强. 钧瓷釉的仿制实验[J]. 中国陶瓷, 2001(4):10.
- [13] 吴建文, 汪涛, 施佩, 等. 利用铁矿渣为着色剂制备分相花釉的研究[J]. 硅酸盐通报, 2016(5):1612.
- [14] 林莹, 王芬, 杨海波, 等. 利用铁矿渣制备黑釉的探讨[J]. 中国陶瓷, 2014(9):71.